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杜烈凝

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July 13, 2021

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杜烈凝

复旦教师姜文华手刃党委书记事件，卡车司机金德强服毒自尽事件，突出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状况的急剧恶化。在左翼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不应把他们归入小资产阶级，而应将之看作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分歧，对于当前的迫切任务，即通过阅读《列宁全集》从泛左翼中把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创建起来，为出版全国秘密政治报纸做准备，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由于造成这一分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定会对政治报计划之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作用，所以我们应对之表示比较完整的看法。我们先说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再讲界限划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最后讨论分歧背后的思想方法原因。

将姜文华看作无产阶级成员的主要依据，是他没有生产资料，受雇于复旦大学并领取工资，而且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和富士康工厂的工人似乎没有明显的形式区别，但实质的差别仍然存在：高校的学者是服务与收入相交换的非生产劳动者，工厂工人是劳动力与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前者（学者）以后者（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生。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更谈不上理解如何理葬资本主义。可是不理解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不能理解生产资本的劳动是剩余价值唯一的来源。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以简单再生产为前提来分析，即假设资本家把自己获得的剩余价值消费掉。这名资本家预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v)，生产结束后收回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外，还获得剩余价值(c+v+m)。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不仅再生产出自己的工资，而且还以工作日中的无酬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m)。这就是资本主义利润的秘密，而提供剩余价值的的工人因此是生产劳动者。按照我们的前提，全部剩余价值都构成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而不进入积累。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个资本家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雇了一个保姆，从而让自己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是资本家的角色，而且在生产过程之外也过上资本家的生活。这个保姆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形式上看起来是一样的：都没有生产资料，都从雇主那里领取工资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都可以随时被解雇。可是二者在剩余价值的创造方面，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资本家把工资付给保姆，当保姆的服务结束时，资本家不能收回自己付出的等价物了；这是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和资本家为自己买一辆豪车从而以另外一种方式消费剩余价值没有区别；工厂工人既生产出自己的工资，又生产出提供给资本家（在较大程度上）和保姆（在较小程度上）消费掉的剩余价值。劳动与收入相交换的保姆是非生产劳动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因此亚当·斯密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样

的劳动者越少越好。劳动力与可变资本相交换的工厂工人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仅养活了他们自己，不仅养活了全社会，而且提供了资本得以积累，生产得以发展的价值源泉。

产业资本家不能独享剩余价值，必须按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与商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分割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家的雇员们，例如蚂蚁金服里的职员，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因为整个金融业都不创造价值，更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参与掠夺的不只有资本家，还有地主和官僚。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要求获得地租，这是剩余价值的又一表现形式。官僚们提供秩序（实际上是强加），要求收税作为财政收入，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财政拨款是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资金来源，因而也是这个手刃党委书记的教师姜文华的收入来源。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与收入相交换的非生产劳动者，不是劳动力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就其消费而非生产剩余价值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和资本家的保姆没有区别。

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商品与可变资本相交换，使货币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资本的同时，也使劳动者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非生产劳动者即使在形式上也是货币与商品交换，但由于这里的商品不是劳动力，而是服务，因此不能产生剩余价值，于是既不能让货币转化成资本，也不能让劳动者成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无产者。无产只是成为无产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占有生产资料之外，还要进行雇佣劳动并且创造剩余价值才能称为工人阶级。要不然依靠国家救济的流浪汉就比工业无产阶级更像工人阶级了。实际上依靠国家救济的流浪汉，和达官显贵们一样，都寄生在工人阶级创造的那个价值余额上。工人阶级的范围需要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缩小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则需要相应地扩大，即从占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集团，扩大到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占有自己劳动的生产资料只是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必须把非生产劳动者包括进来。工人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资产者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劳动但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对家仆的阶级属性有明确的看法，指出其为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最为卑贱的分子（《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分册第198页）。马克思还指出学者、学士、教士等在经济学上与仆从地位一样（同上第314页）。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是其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结论。如果推翻这些论断，那么就必须设法模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必须在承认学者劳动的生产性之后，也承认贵族和妓女是生产者，并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庸俗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辩护企图，马克思给予了公正的揭露，指出为非生产劳动者中寄生部分恢复地位的意识形态企图，本身就宣告了这些学者是依附于资本家的。我们还可以看看马克思有哪些进一步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在现实中如何表现。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将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绝对增加并相对减少生产劳动者。资本家掌握较大的剩余价值之后，生产过剩一方面减少了投资机会，另一方面营造出奢侈的消费风气，这都导致了非生产劳动类型的雇佣化小资产阶级的增加。用较少的生产者养活较多的非生产者，这是生产发展的另一种表述。马克思引用材料说明，1860年代英国工厂工人数量就大幅少于女仆的数量（同上第197页）。这类雇佣化小资产阶级的工资，也由类似决定劳动力商品价格的规律来调节，即由其再生产所需的商品价值总和来决定，并受竞争的影响。其人数的增加，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激化其竞争，使其报酬下降。今日中国的现实，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些结论的科学性。

卡车司机属于经典意义上占有自己劳动资料的小私有者，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鉴于读者一般较为了

解，就简略一些，只是指出几个要点。首先，其发展的趋向是分化为拥有多辆卡车，雇佣别人开的少数资产阶级，以及失去自己卡车，专为别人开车的多数雇佣劳动者。在有大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情况下，这种分化会更快，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比重会更高。其次，小资产者受到大资本的压榨，卡车司机往往资金不足，需向货币所有者借贷，因此受到借贷资本的盘剥。卡车司机日益依赖于掌握销售运输服务渠道的互联网资本，需要支付服务费，因此又被互联网公司剥下一层皮。来自大资本的压榨，会加速其分化。再次，小资产者会极力抗拒自己跌落到无产阶级的命运，拼命多干活少休息，其生活水准甚至低于工厂工人。这一点和列宁描绘的俄国小农并无区别，都不会因为其贫困而应划入工人阶级的范围。最后，拥有卡车的司机的阶级属性不同于拥有电动车的快递员。快递行业和运输行业一样，不提供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物质产品，但其产生的位置移动是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属于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快递员的劳动力与这一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至于是计件工资，电动车是自己的，并不影响这一实质。快递员不会因为拥有几辆电动车而成为资产者剥削其他快递员，而卡车司机就可以因为拥有几辆卡车而上升为资产阶级。

严格的阶级划分不仅具有经济科学上的理论意义，它还是推翻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唯一道路，即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各个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我们观察各个政治派别（目前是舆论派别，即政治派别的萌芽形式）的出发点。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根据马克思主义，即唯一的社会科学，确信只有领导推翻专制政府的民主统一战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代表一小撮权贵和大资本的专制政府则拒绝在没有群众运动威胁的情况下进行任何重大的改良。资产阶级自由派希望与专制政府分享政权，又担心革命方式走向冲击私有制的结果，要求自由主义式的改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其要求也是如此：往往有比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但又达不到社会主义，即要求对小资产阶级比较友好的资本主义；争取民主主义要求的方式也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目前专制政府的政治面貌最为清晰，对自身的利益最了解，也组织得最好。其余三个主要社会集团的政治面貌还很模糊，尚无重大的危机去让他们充分表现自己。但只要阶级斗争明朗化，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就会发现各社会集团的政治力量与其经济基础的一致性。无产阶级必须同时开展三个方面的斗争，才能赢得社会主义：清理队伍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自由派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向专制政府发动进攻。清理队伍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争取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一致，将是这条道路的起点。

是不是自始至终都坚持阶级界限的严格性，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重要原则。放松这种严格性，在想像中扩大了阶级基础和阶级队伍，但却不再能保持思想理论上的彻底科学性，不再能用原则坚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真正的工人阶级有力地走向政治斗争。唯一实际的路线就是原则坚定的路线。将小资产阶级拉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路线，既放弃了原则，也不实际，因为小资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由其经济社会地位决定，并非宣布一下就能消除。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阶段领导小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才是既有原则，又符合实际的科学道路。

列宁和毛泽东，都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坚持界限严格性的模范。列宁在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尚是一种左冀中的非主流思潮时（和今天中国非常相似）即坚持这种理论的严格性。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即小资产阶级政党——引者注）‘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列

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一卷第257页）。在列宁写下这句话的1895年，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党，都还处在思潮传播的萌芽状态。这种界限是否需要坚持，是1903年俄国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深层原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火星报》为主要阵地战胜了经济派修正主义者，在对工人进行全面政治教育而非领导单纯经济斗争这个原则问题上有了一致意见。但全面政治教育需要组织上集中的党。孟什维克为了让自由散漫成性、不能接受严格纪律性的知识分子入党，提出了党员不必加入支部即可自称党员的党章第1条。列宁与之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没有这一斗争，就没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难以想象。

毛泽东在坚持阶级界限严格性这一点上同样坚定不移。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41页）。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02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小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正如他们在革命中时常由于两面本性倒向资产阶级一边一样。因此毛泽东有时也将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周恩来、聂荣臻、陶铸等人则希望把知识分子划入无产阶级的范围。据薄一波回忆，在周恩来当面要求毛泽东就知识分子问题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另一个场合谈及此问题时，毛泽东公开表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些阳魂也没有过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3年版第1006页）可见是否坚持阶级界限构成了建国后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1978年3月，邓小平声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67页）这也成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明确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界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道路，反对庸俗经济学家、孟什维克和走资派因袭往复的企图。我们注意到了像周恩来这样彻底的革命者却不能彻底科学思考的历史，也注意到了今天很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却用非马克思主义思考的现象，认为有必要分析造成这一困难的思想方法原因。列宁曾在1913年致信高尔基，批评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进派”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严整、更深刻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四十六卷第230页）。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各个命题和结论之间，早已经过了系统的逻辑加工和多次历史检验，对之的发展和运用需要考虑与这个严整体系中各个环节的关系，因此以掌握这门科学为前提。如果不了解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联系，不了解学者劳动的非生产性，不了解这一区分对纯洁无产阶级队伍和有意识争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意义，不了解历史上就此问题展开的长期斗争，就贸然宣布学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将不会促进工人基于科学世界观才能成功的事业，而是成为这个事业不自觉的障碍。有一些同志有较好的自然科学修养，能理解自然科学的严整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却比较随意，我们也想举一个自然科学的例子。伯努利方程是流体力学的基础方程之一，一方面它是能量守恒定律在流体力学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它是一系列工业设计，比如飞机设计的著础。承认能量守恒定律，就必须承认伯努利方程，而否定伯努利方程，就必须反过来推翻能量守恒定律。没有人会这样去做。同样地，承认剩余价值理论，也必须承认非生产劳动者的小资产阶级性及其动摇性。因为不了解这种严整性而去否定这一界限的严格性，表现了一种缺乏修养的自发状态。

这种自发状态需要自觉去克服。精读《列宁全集》，则是用一两年时间去自觉克服这种缺陷的最佳办法。

最近一位青年同志开始阅读《列宁全集》，我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原则性变强了。”这正是修养提高的明显表现。我们不仅应当在阶级界限问题上具备原则性，也应当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具有原则性。目前因为缺乏修养而不理解这种原则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情形下的自然现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种障碍，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六卷第31页）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毛头鹰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November 23, 2021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毛头鹰

在革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认为自复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需要革命而不是改良，需要重建社会主义，这是初步的共识。但是对于如何具体达到社会主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其所依据的革命理论的直接来源是列宁主义。但是这一原理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进一步阐释，还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所谓“俄国化”，“中国化”？有的同志认为，当代中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存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划分；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没有革命动力，即使需要民主革命，也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认为，以上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依然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完成得如何，将直接影响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能否顺利实现。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理由，是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都生活在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年代。德国的军事专制制度，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以及中国的国民党专制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俄国，有农奴制的残余，在中国，有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当代中国的情况不同，它的资本主义直接来源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彼时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因此中国不存在封建制度的残余，资产阶级没有历史上那个革命的对象。当前的专制制度正是官僚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统治工具。无产阶级推翻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建立新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怎么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这是缘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理解上的偏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这个革命是否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是否有动力参加，是专门反对“封建”专制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专制以达到政治自由。这些是具体的历史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民主程度也各不相同的国家内会有极其多样的形式和路径。它的本质在于，民主革命是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制度，也就是民主革命的要求在理论上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矛盾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从而也就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专制的一般特点是官吏和警察专权，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没有民主监督。反对专制制度，是因为只有消灭专制制度，获得政治自由（当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才能使资本主义更充分更快速地发展，才能使广大居民从不

开化状态中解脱出来，为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提供广阔的空间，才能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致因为专制制度的存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是走向公开的自由的大道，从而有条件争取社会主义。“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70页）

民主革命虽然在理论上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现实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彻底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能允许的一切民主条件，从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潜在可能性。“我根本不想否认存在着无数历史的和实际的条件（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这些条件正在并且必定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不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卷74页）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也存在着诸如种族歧视、性别压迫、警察滥杀无辜等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本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中小私人资本与掌握政权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而存在着美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华尔街政府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在不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得到解决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把共和国变成君主国。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必要性丝毫没有被削弱。“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指社会主义的革命——笔者注）。”（《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11页）“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67-168页）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广大居民争取一般民主，即“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8卷111页）在当代中国，除了自由派的斗争，还存在着诸如性别平权运动，反对官僚封校、要求扩大学生权利的学生运动，少数民族维护其文化传统、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用暴力剥夺其学习本民族语言的运动等一般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及其政党不应该对民主主义斗争视而不见，因为在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只有在群众斗争的高潮到来时号召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用革命的手段实现上述诉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才不致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政治自由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才不致将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困难。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即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有着民主诉求，但是随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全方位打压，自由派运动日渐式微，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革命的动力，与官僚资产阶级共享专制制度保证的“稳定”。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去革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从而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即使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称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首先，没有理由认为自由派运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仅仅以随着专制政府的镇压，尤其是2018年以来，我们看不到公开的自由派运动为依据，那么从自由派的视角出发，同样可以

说，随着专制政府的镇压，左翼运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秘密状态的小组大量存在，电报上的反政府刊物层出不穷，境外一些自由派媒体一刻也没有停止号召中国人民打倒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在反革命的时代，革命者被迫流亡海外或者保持秘密状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只不过表明反动派的力量暂时还很强大，人民的组织性与战斗力量还很弱小。

其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动力大小，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必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9-440页）没有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主革命便有其必要性。当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的革命力量，其本性总是倾向于妥协与背叛，往往不希望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即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宁可让它流产，以改良的形式收割人民的斗争果实。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什么行动，无产阶级都会充当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资产阶级愿意革命，我们就热烈欢迎；资产阶级动摇妥协，我们就揭露其行径，促使它革命，像监视敌人一样监视这个暂时的同盟者。但无论如何，这个革命的性质归根到底是不超出一般民主范畴的，从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还要指出，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是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工人，资本家。但是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在小生产数量占优势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待阶级分化和已经开始阶级分化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会有所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条件脱离直接生产过程去从事非生产劳动，而受到大资产阶级排挤的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的政治代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小资产阶级具体由哪些阶层组成，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5-436页）如果可以用一般性的原则来概括与区分两种革命，那就是：“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1卷63页）因此“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说法是不严谨的，会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界限。

反对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三个理由，是认为提出民主革命的口号会模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在群众看来，这与自由派的口号相同。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得现在依然保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要比当年多得多，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会吸引这些“先进”群众，减轻革命的阻力。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只有政治文盲才会混淆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与无产阶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会旗帜鲜明地阐明其民主革命的内容与实质。因为群众的政治理解力不够，无法区分各派色彩，就拒绝提出民主革命口号，实际上等同于放弃对工人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的觉悟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始终必要的任务。至于所谓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很

多，难道是在说黑帮专制政府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欺骗工作白做了吗？中国左翼群体的思想之混乱有目共睹，其中不乏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回归社会主义的，不乏以超阶级的视角看待国家，拥护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只反对资本家不反对黑帮专制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历史早已成为自复辟以来罪恶统治的遮羞布，不彻底打碎特色的假社会主义招牌，粉碎群众头脑中的自动回归社会主义的幻想，就不能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群众头脑。其次，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无产阶级不争得政治自由就无法使阶级斗争充分展开，就谈不到走向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普遍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自由等民主权利的条件下，要求无产阶级跳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民主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无非是在人民革命运动高涨，普遍要求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的时候，要求无产阶级抛开可能的同盟者，独自夺取政权，忽视与小资产阶级一同建立革命民主专政的可能，忽视全体居民争取实现管理国家事务的一般民主，忽视无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可以受到的教育，跳过这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去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反动派对革命力量内部的分化与矛盾是喜闻乐见的。同盟者之间的内部斗争会极大削弱革命力量，从而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或者资产阶级窃取革命果实，与反动派分享政权。无产阶级期望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却使资产阶级赢得了它们所希望的民主“革命”。比起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失败导致的革命流产，这种流产方式更加令人惋惜。推翻专制政府不必然等同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权，更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为有着较广泛经济基础从而较广泛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派别，在推翻专制政府的高涨时期不可能不通过进行派别活动和组建政党的方式参与，以便革命成功后能够建立符合其利益的政权。不论革命成功后是否共同组建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都必须牢牢把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将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将列宁主义看成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将民主革命的理论看成特定历史和国别条件下的特殊情况，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宣传。共性只能通过个性表现出来，马克思用英国作为例子和材料来源阐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列宁用俄国作为例子阐明被马克思所发现但并未系统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注重逻辑过程而不是注重结论地精读《列宁全集》，才能系统清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对诸如民主革命的一般理论获得科学的理解。

论我国革命

读者来稿

论我国革命

November 23, 2021

论我国革命

读者来稿
我认为列宁道路将我国革命现阶段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相当准确的。在接下来，我想具体讨论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一般策略。

首先，我认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同于诸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列宁道路所说“自由派资产阶级无力进行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再次表明自己由于畏惧激烈斗争躲在法西斯主义的羽翼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大于革命性，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担。

其次，我将区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政府，建立革命民主政府。由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力量的不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左中右三种结果。第一种是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政府。第二种是出现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第三种可能是政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手中。这三种可能最后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第一种可能之下由于政权已经被无产阶级掌握，因此可以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后两种可能之下，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会给无产阶级政党创造出进行大规模组织和鼓动的机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前提条件。最终将通过一次新的“十月革命”来完成这一过程。

我国在当下只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革命的性质和目标不同决定了革命采取的策略不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该领导和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绝不放弃对工人阶级进行充分政治教育的任务，以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迅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发。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最常犯的是“左”和右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右的，例如历史上王明所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但同时应该保证自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证自己相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保证自己具有充分对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鼓动的自由。

第二种策略是“左”的，即毛泽东所说的“关门主义”。这种观点反对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随着经济危机加深，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进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充满怨恨，但又苦于找不到革命的道路。正如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许志永在法庭上所说：“如果我的改良主义主张不被接受，那么中国未来将会出现革命”（大意如此）。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时期，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突出体现在对历史上文革的妖魔化和恐惧）会采取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突出表现是2000-2012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广受欢迎。

但是，当特色政权加速法西斯化，改良主义的空间被扼杀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会转向革命立场。香港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勇武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理非）即在2014年改良主义的“占领中环”失败之后，急剧激进化，采纳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进行了从2019年至2020年失败的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处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领导之下，而不是反过来，而这又是缘于香港独特的国际位置和阶级结构。因此，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它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无力完成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在当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既具有深刻的革命性，也具有深刻的动摇性。革命性如前文所示，动摇性体现在当大规模革命运动爆发之后（例如1905年俄国革命），专制政府为拯救其统治，必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改良措施。例如召开国家杜马，和人民“分权”，同时坚决镇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大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跑步进入杜马，进入专制政府，放弃民主革命任务。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给先锋队带来了新的理论和认识，壮大了先锋队的力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机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既不应该拒绝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先锋队（当然，要视其觉悟程度而定），也不应该放弃在党内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展开路线斗争。

论我国革命（二）

读者来稿

论我国革命（二）

November 24, 2021

论我国革命（二）

读者来稿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头所说：

由于列宁道路之前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当下的革命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一革命阶段，主要目标是推翻黑帮法西斯专政，资产阶级自由派并非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我们之所以提出我国当前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便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我国左派当中流行了很多年错误的路线，也就是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而共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一错误路线所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绝对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灾难。我们认为，尽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满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每天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似乎跟中国左派共享了同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但却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用列宁的话说，作为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集中，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势必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本国的垄断资本想要继续壮大，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保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这使得海外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必然。

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国家需要转变角色和组织方式，使自身能够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 「自由放任式国家」 向 「积极干预式国家」 转型，对于中国来说，突出特点是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开明官僚向独裁官僚转移。

这种转变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阶级斗争：大型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是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抵抗，才能成功转变国家形态，从政治上加速中等资本家的灭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背后是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型」 的大背景，也体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般趋势和内在矛盾。正在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一冲突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就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两个层面严重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垄断资本成为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第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将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上、废除工人阶级已经取得

的权益，突出体现是现在被提升到政治高度的所谓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和对一切工人运动的严厉打击。第二，垄断资本的扩张势必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用工人阶级的鲜血和生命来为垄断资本争夺原材料、市场和投资机会。因此，垄断资本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胜利，绝不是什么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灾难。

至于有同志认为的承认我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会使革命黯然失色，失去意义，吸引不了工人阶级，我引用列宁在《专制制度与无产阶级》一文中的论述就可以反驳：

> 工人阶级抱有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种各样的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顽强的努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而灰心。对这样真正的革命阶级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摆脱一切自我欺骗、一切幻影和错觉更重要的了。在我们俄国，最流行和最常见的错觉之一，就是似乎我国的自由派运动不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似乎俄国所面临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最温和的解放派[73]一直到最极端的社会革命党人——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俄国觉悟的无产者却认为，这种承认是对实际情况的唯一正确的阶级分析。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之高阁，决不等于提前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那些回避所谓片面的阶级观点的人，那些想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又害怕直截了当地把我们俄国所面临的和在我们俄国已经开始的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会陷入大失所望和来回摇摆的境地。

不知这些同志看到列宁的回复有何感想呢。承认我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会使我们丧失对于抱有消灭世界范围内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伟大目的的工人阶级的吸引力。恰恰相反，我们将会获得这种吸引力。这只会使我们失去对一些整日希望能“最快速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吸引力。这些小资产阶级曾经寄希望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某一天“突然左转”，“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在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之后从「一次改良」演变为「一次革命」，幻想只通过一次「迅速的革命」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們只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获得上升空间，至少坐稳中产阶级的位置。哪怕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也在所不惜。因此，同样一批小资产阶级也很有可能被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只要一次革命就可以解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哦）所吸引，完成一个从“极左”向极右的华丽转身。我相信，失去对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吸引力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一件坏事情。

“一次革命论”的突出体现就是拒绝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而拒绝进行严肃科学的阶级分析正是法西斯主义“革命”的突出特点。法西斯主义“革命”开始就是一场小资产阶级运动，小资产阶级由于其在阶级结构和社会生产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沉迷于各种抽象的关于“人民”、“民族”、“社会主义”和“反资本”的口号中，而无法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理性科学的认识，也无法对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进行准确认识。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大批走向破产，他们迅速地转向“革命”立场是好不稀奇的。问题的关键是，这里的“革命”到底是哪

种革命？

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加以认真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将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团结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左翼，共同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我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取得胜利！在此，我希望请赞同“一次革命论”的同志回答以下问题：**1、“一次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哪个？2、“一次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3、“一次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朋友？**

至于有同志提到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事实。我认为，这一事实只能说明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了。这一事实绝不能推导出我们应该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地方，也存在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我国香港的人均gdp就远远高于内地，但还是爆发了2019-2020年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中的特点和我们应该对其采取的策略。首先，我认为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其政治代表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毛泽东在文中所讨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具有相似性。

>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4]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5]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6]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首先，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具有相当明确的纲领和目标的政治集团，其主要阶级基础是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既与小资产阶级相区别，也与垄断资产阶级相区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纲领是建立类似于美国这样进行全民普遍选举和采取宪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他们经常所说的“正常国家”。在这样的“正常国家”里，中等资产阶级可以免受官僚专制权力的侵害，也不会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所以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家”。

在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以马云为代表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并不支持所谓“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因此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相区别。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区分是，中等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官僚作为“靠山”，作为其完成垄断的暴力保证，因而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取市场一般利润

率，而不能像垄断资本一样获得超额利润率。同时中等资产阶级也时时面临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其进行兼并的风险。由此，产生了中等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这种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官僚专断”和“党”的痛恨。

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上文所说的其受到垄断资本的侵害，尤其是当正在崛起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建立全面领导权的时候，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原来奉行不移的改良主义立场在弱化，其先进人物往往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中等资产阶级自身并不掌握国家暴力，其往往依赖于官僚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暴力来镇压发生在自己企业中的工人运动，因此其又表现出保守性或者说反动性。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逐渐尖锐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等资产阶级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分化过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左翼将会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中间派将会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右翼则将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背叛革命，成为垄断资本阵营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仍然面临被垄断资本所压迫的境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争取到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的。这种支持是确保民主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由于我国实际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处于半边缘的位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史尤其是从08年至今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我国无法像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建立“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资产阶级自由派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政治目标将始终是一种幻想。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等国的情况来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残酷的相互竞争，我国无法建立长期稳固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只能要么倒退回现在的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状态，要么继续前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型政权，最终消灭国家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发展（以中特为例）

读者来稿

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发展（以中特为例）

读者来稿

序言：谈谈研究的方法

“一次”或“二次”革命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当下中国的革命是否需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具体革命实践中，我们必须面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必须面对中小私营资本家对官僚特权的不满，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于高昂房价的愤恨。

因此，“一次”或“二次”革命直接联系到革命的目标、纲领和路线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问题。

首先，我们都承认我们当下社会的性质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每个人都是停留在自己的主观认知方面。还没有人，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总过程做一详细的论述（类似于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认识我们当下中国的所处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大家都是凭借自己的感知而达成了共识的。当然这样的主观感受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力图成为革命者的人而言，必须要对资本主义发展与阶级斗争的过程做一科学的描述，才能达到毛主席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主观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

因此，笔者的这几篇文章，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力求严谨地讨论所谓“一次”或“二次”革命及其实现的条件，为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子问题需要被讨论清楚：

1.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2、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此基础上，可以讨论的问题

3.“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以及

4.要不要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左翼结成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我希望可以促成有逻辑的、科学的思考与讨论。最后，即使包括笔者自己在内也由于现实材

料掌握的不够、理论的不彻底，使得这几篇文章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笔者自己指出的问题，也希望读者可以多多提意见和批评。

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能否充分发展?

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最充分的发展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在政治上，要求所有公民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意味着工人作为国家的公民也同资本家一道，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罢工、游行示威等一切公民都所平等地拥有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人的工资不被人为地压低，从而保证工人对于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购买力。同时意味着除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之外，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性别之间、不同种族/民族之间、城市人与农村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些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歧视和压迫，都应当作为封建的遗毒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些要求本身没有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能允许的极限。

> **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人生而平等！）

我们的资产阶级在他还是一个革命阶级的年纪曾郑重地向世人宣告着生而为人享有的平等的权利。

这些言论与主张，早已被我们当今资产阶级这帮行尸走肉们忘得一干二净，顶多只在自己的宪法中或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他们的什么美梦中充分实现过。稍微踏出这个空中花园一步，资产阶级就会立刻感受到，给予无产阶级以平等的权利是如此的危险，一旦无产阶级拥有这样的权利，这把锋利的武器也立马会指向了资产阶级本身，以至于可以将整个资本主义埋葬。

然而，不给予无产阶级这样的权利，必然意味着在社会上保留一些人的特权（最典型的就是官僚特权），特权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必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当然，我们的资产阶级未必真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会有助于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斗争与解放，而在这样的发展中，资产阶级会被无产阶级所埋葬。

(2)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要求对劳动的一视同仁，要求资本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无限扩张，要求消除私人继承制而将资本集中于最能赚取剩余价值的人手中，要求打破城乡的二元对立，要求破除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消除性别分工和所有种族歧视，这是资本所能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改变所有旧式的生产方式的最激进的要求。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对这十条措施，没有一条超出了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极限。因此这些做法是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是，出于对这些措施背后隐含着的“激进的对私有制的否定”的恐惧，资产阶级往往不愿意实行这十条措施。只有当面对经济危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威胁下，才会从这十条中选出几条来实施。

>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然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消除土地所有权，意味着土地所有者不能凭借自己对土地的占有而占有剩余劳动，这立刻就可以得出凭借对机器、厂房、工具、原材料等的占有不过是和对土地的占有是一样的性质，只是占有了不同的生产资料而已，对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很轻易就会转化为对一切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否定；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消除劳动力的一切差别即彻底性别的解放，可是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平等立刻就意味着女性不再为家庭的再生产、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提供无偿的家务劳动；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破除城乡二元对立，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彻彻底底地进行乡村，使得农民工具有和城市中产阶级一样的购买力。可是乡村旧的生产模式下极其低廉的完成劳动力生产条件不正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么？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要求将资本的关系渗透到一切地域和领域，可是资本总是一窝蜂地涌向利润最高的产业领域和地区，留给其它领域的和地区的，则是旧的封建关系的延续与复活（比如东北）。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悖论一般的事实——即资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永远”无法使得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客观情况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专政下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历史上看，哪怕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其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或多或少地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因此也就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需要留一段时间来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这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秩序的重新巩固），而是应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是绝对的。

（二）中国的现实恰恰印证了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展这一普遍原理。

1、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既然是作为现实的行动的纲领，那么毋庸置疑，纲领就必然包括对现实的分析，而并不仅仅是就抽象的过程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必须要向所有看到我们纲领的人们证明——我们所论述的革命道理不是泛泛地空谈，不是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而是切切实实符合当下的条件的行动指南。我们谈论现实的条件，不是为了搞出什么中国特殊论，而恰恰是向人们揭露：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而正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历史规律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法解释的情况，而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这一发展的全过程，并指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

一般性的过程蕴含在事物的具体过程之中，将具体的过程描述清楚之时，也正是其一般性得到彰显之时。科学的一般的道理有其适用的条件，只有将这一条件摆明，才能证明科学的适用性。

同时，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社会科学没有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实验室，它所研究的任何实际过程都是矛盾多元决定的；在多对矛盾之中，只有将实际的过程展现出来，才能显示出我们所谈

论的问题正是主要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正是科学所描绘的这一过程而不是那一过程才是事物发展的主要进程。

具体到我们的研究，就必须阐述明白：中国的发展正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当然这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因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遵循/应当遵循一般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同样，只有阐明了中国当下“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出“一次”或者“二次”革命的观点。

我们看列宁同志的早期文章，就会发现在1-4卷中大量的出现列宁早年对俄国现实材料（尤其是经济材料）的研究，并且正是凭借这些对现实材料的研究，去反驳民粹派的观点。

2.2001-2008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我目前只能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做一笼统的描述，更为具体的阐释，我希望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其补上。

如果说邓的时代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确立的年代，江的时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确立的年代，胡温的时代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对外贸易的马车大幅前进的年代，那么习的年代，则是这一体制遭遇巨大困境的年代。

2001-2008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前8年，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模式在80-9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而到了新世纪的头几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真正确立。

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作为一种外部冲击阻断了这一增长的“迅猛”态势，那么这一所谓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早已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之中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同世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具有深刻的不平衡性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对立

资本在城市的集中意味着新一轮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而同时与之相并存的是外来务工者虽然工作在城市，然而因为户口和房价的限制（隐藏在房价背后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房地产行业超额利润的攫取，户口则是官僚掌握的一种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的方式。例如在北京，公务员相比于私营企业的员工获得户口的机率要大得多），打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乡村承担：乡村低廉的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工伤致残工人的成本等，使得资产阶级得以利用这个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来压低劳动力的价值。

然而，这样做给资本带来的后果便是——资本主义在乡村迟滞而又萎缩的发展形态，农民工极低的消费水平，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难以被彻底开拓。

同时，农村作为粮食与经济作物的产地，在同城市的交换之中，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种“不等价交换”之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压低劳动力的价值，都必须对农业进行补贴，然而这一补贴在我国只是落入了农资提供商的腰包，我们的农民除了必须接受极低的粮食价格之外，无法享受任何补贴。

而我们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不愿触动任何的土地所有制（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另一方面，又非常乐意看到劳动力在极低的成本下的再生产；毕竟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国内市场的狭窄并不十分妨碍资本家在海外的商品销售。

(2)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某位总设计师曾经提出过**“两个大局”**

>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而到了将来，

> 发展到一定的时 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然而，我们几十年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发展（2008年以前），摆在人们面前的就只是资本在东部地区的集中和发展，而且东部的资本和人口越集中，就越有更多的资本和人口流向东部地区；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资本的外流与人口的外流。

如此模式下，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并不充分的国内市场；而留给东部地区的也并不都是甜果子——生产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带来的是对土地、原材料、粮食等资源的巨大需求，超过本地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的部分则只能由外地以更高的成本提供；同时，人口的集中和工厂大规模用地都带来的是土地资源的紧缺，地租则一路上涨——这一不断扩大的人口与生产的集中对资本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劳动力价值的快速上涨，工人在拿着极低工资的同时却需要面临快速上涨的房租和餐饮费用，阶级的矛盾被迅速激化。

然而，资本能够在一地聚集起初便是因为这里便利的市场、交通、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等条件，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则在不同程度上更加便利了这些条件。因此，资本在一个地区越集中就越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毫无疑问这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却绝不是最好的道路。因此尽管“大城市病”使得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都苦不堪言，这样的集中在自然的状态下也并无减少的趋势。

要想扭转这一局面，资产阶级只有依靠一种他们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想尽力避免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只有在国家暴力的干预下，资本才能将自己的触手伸向农村；只有在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西部大开发”才能初见成效；只有在“神圣的”国家暴力的庇护下，资产阶级才能“平安地”从海外攫取剩余价值；也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下，中国资产阶级才能与西方资产阶级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

以上只是谈论了在上述“以东部沿海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模式下，社会矛盾的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性别对立、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生态环境问题、垄断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官僚

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这一发展的相当可观的现象。可以看到——隐藏在这些矛盾背后的，无非是阶级矛盾；然而，资本在最自发的条件下无法按其理想对所有的地区、所有的人口都雨露均沾，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充分发展，是以另一地方资本主义的萎缩发展为条件的；而我们立马就会看到，资本在一个地方榨尽了它所能榨取的一切，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资本不断地变换其投资场所与地点，使得世界上总有一各地方处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状态，而这不过是以其他的地方的萧条为代价的。而在这些萎缩发展或萧条的地区，则是旧有生产关系的延续与复活（我国的东北可能是最好的例证）。

这里我们也可以在部分上回答我们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在中特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到底能否继续发展?

目前的答案：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将在重重矛盾中继续发展，在不断克服旧的矛盾中遭遇新的矛盾，但始终无法实现充分发展。

得到了这一步的结论，我们几乎只需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我们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中特本身的统治能力了。

3.2008年的经济危机与中特的应对

如果说，2008年之前的资本主义是在不平衡与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发展的，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同时宣告了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的危机。

>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

为了避免可能一触即发的国内经济危机，特色在温家宝的主持下紧急出台了著名的“四万亿计划”，用来拯救中国的经济（进而也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危局）。

可是正如前文所说，2001-2008年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国内市场的不充分发展的状态，人民群众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使得过剩的产能必然不能被第II部类即生活资料的部类消化掉；即使是通常的第I部类的投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也难以保证获利。

中央原本希望，这样的“四万亿”可以用于投资落后地区以及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用以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但市场经济的不以人为意志的规律使得这四万亿最终还是流向了房市、金融、地方融资平台等等，新的市场只是在土地财政的带动下才得以形成。

后来，自习上台以来，中央政府开始日益明确地认识到：不深挖国内市场，不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砍掉已经严重过剩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落后产能”，扶持可以赚取“超额利润”的“新兴产业”，中特这艘船将很快触礁而沉。

因此，自2012年十八大以来，即使是在经济领域内也是各种动作层出不穷：交通、能源、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大批项目开始上马，通过对一般生产条件的建设（我愿称之为广义的第I部类），企图为国内市场的开拓打下下基础（所谓“要致富，先修路”）；狠下心砍掉过剩企业或者高耗能企业，大

幅扶持新兴产业；加大“扶贫”的力度，这次措施表面上看是在做福利，实则不过是将更多的农业人口卷进市场化的浪潮；加大海外扩张的力度，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同现在的霸主不得不展开数轮较量，近几年双方关系更是逐渐紧张。

习自称做这一改革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然而其实质我们不难推测，仍旧是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固有利益内打转转，因而，完全不能阻止资本向少数高利润率的行业（比如金融、房地产）、地域（比如长三角）涌入。那么对于这一系列操作的必然结果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判断：垄断资产阶级无力“拯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危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和延续统治，垄断资产阶级最终的选择是法西斯主义。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彼得格勒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January 03, 2022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彼得格勒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主要原则之一是：

革命必须分阶段且不间断地进行

也就是说：将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统一起来。承认第一点而否认第二点，就会在上一阶段革命成功之后陷入骄傲自满的境地甚至成为下一阶段革命的对象。承认第二点而否认第一点，就会使得我们忽视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失去现阶段革命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

如果我们把我国革命的进程比作一根弹簧，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这根弹簧被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压制到最低点的时候了。一切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无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农民的反抗行动都被严厉镇压，社会显示出一种病态的“稳定”和“和谐”。目前的形势处于革命低潮，甚至是最低潮。

但是，弹簧被压制到最低点绝不意味着它不能弹的很高，甚至能远远超过上一轮（1968年：文革最高潮）所能达到的高度。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被压制的力度是空前的，压制所采取的暴力手段之强大也是空前的，因此也必然为这根弹簧积蓄了强大的弹性势能，使其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可能直接“弹”入共产主义。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每一阶段的革命过程中都存在着向下滑落的可能性，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承认我国革命的巨大潜力绝不意味着否认革命必须按阶段进行的绝对性。如果我国革命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么我国革命按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的不同，应该分为：新民主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

今后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与历史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会有许多相似之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标志是打碎了旧的国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与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多次反复的斗争，以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实现革命胜利。

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样描述：

>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与一百年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日益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俄国面临的目标类似，是推翻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另一方面，今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领导的上一轮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在国际意义上属于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左翼的革命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认为：

>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并非如刘少奇等人所断言的那样，需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而是必须立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于旧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已经被打碎，新型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因此消灭城市旧资产阶级的任务大体上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但也绝不排除镇压反革命的暴力手段），即有可能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标志是城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

另一方面，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因此必然意味着我们

需要打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政权，而先锋队内部的走资派必然会采取一切方法和手段阻碍这一进程，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走资派的斗争将会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对抗性矛盾。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有三点：第一，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第二，废除作为阶级镇压工具的警察制度。第三，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已经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则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走资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认为，这一阶段国家正在消亡，但是还没有完全消亡。

>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会立即彻底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不会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同于旧的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保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保卫资产阶级法权，因此是正在消亡中的资产阶级国家）。

第三阶段：共产主义革命

从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刻起，我们并不能稍稍暂停我们的脚步，感慨一下我们已经走过了多远的革命道路。我们必须迎接新的更困难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和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胜利的标志是进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仍然面临着继续革命与复辟力量之间进行的长期斗争。由于历史上还没有地方实际进行过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步骤仍然需要更多实践才能加以描绘。

>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同志们，让我们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为打倒专制政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而团结奋斗吧！

论我国革命（四）——帝国主义时代与我国的统治阶级

读者来稿

论我国革命（四）——帝国主义时代与我国的统治阶级

January 31, 2022

论我国革命（四）——帝国主义时代与我国的统治阶级

读者来稿

一、我们所处的时代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就说：

>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一般过程就无法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革命的敌人是谁。而要认清我国革命的对象是谁，首先要认清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正如列宁在一百年前《帝国主义论》中所说：

>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有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帝国主义论》）

在《帝国主义论》的结尾，列宁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二、我国的统治阶级

大体上讲，中国的统治阶级分为两部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也就是网友们经常说

的“赵家人”。垄断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之间的最主要的区分是垄断资产阶级通过金融资本的方式实现了垄断，并由此获取超额利润，并且不断兼并中小资本。

>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等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列宁《帝国主义论》）

中国的资产阶级媒体《财新》在一篇关于最近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文章《监管层要求合理发放并购贷 出险房企偿债能力有望提升》中就不得不承认房地产行业垄断资本的兼并正在加剧：

> 国泰君安发布于12月5日的研报称，监管层的集中表态显示，和以往“以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不同，当下政策并未放松所有房企的融资，而是鼓励优质房企进行并购。这意味着行业将持续优胜劣汰，被淘汰的企业难以再通过融资重返市场，行业门槛将大幅提升。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

>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突围》中，中福集团董事长林满江和长明集团董事长傅长明就分别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傅长明与他的“杏园三结义”的兄弟荣成钢铁集团董事长钱荣成之间的矛盾正是源于傅长明试图以低价收购荣成钢铁集团所引起的。

就像电视剧《突围》中所描写的林满江与傅长明之间的关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在贷款、海外投资、**IPO**上市、合规和税收审查等方面都需要仰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其既服务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维护自己的利益，共同疯狂攫取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需要加以着重指出的是：《突围》中林满江和傅长明的结局不过是经济形势恶化、利润率下降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绝非“人民的胜利”。“反腐”立功之后的齐本安取代了林满江，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反而得到了加强。

表 2. 13 ： 中企 500 强和民企 500 强分结构对比

	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纳税（亿元）	员工数（万人）
中国 500 强	711700	32029	40200	3194
263 家国企	509008	22494	32526	2460
237 家民企	202692	9535	7674	734
民营 500 强	281932	11321	10254	951

表 2. 14：中企 500 强分所有制结构对比

	收入	净利润	资产	净资产	纳税	员工数
国有占比	71.52%	70.23%	87.39%	80.52%	80.91%	77.02%
民营占比	28.48%	29.77%	12.61%	19.48%	19.09%	22.95%

中国500强企业中263家为国有企业，其收入和利润占比超过八成

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房地产。垄断资产阶级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垄断地租的方式疯狂进行房地产投机活动，攫取了大量暴利。而另一方面则是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沦为“房奴”，不得不背负数十年沉重的房贷负担，或者是为了租房而将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得到的工资都交给房东。

企业名称	2021 排名	排名变化	2020 排名
万科	1	↑ (2)	3
恒大	2	↓ (1)	1
碧桂园	3	↓ (1)	2
中海	4	↑ (1)	5
融创	5	↓ (1)	4
保利	6	—	6
龙湖	7	—	7
华润	8	↑ (1)	9
世茂	9	↑ (2)	11
新城	10	↓ (2)	8

中国十大房地产企业

>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作“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列宁《帝国主义论》）

我们再来看看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根据中国福布斯富豪榜2021，在不考虑“隐形富豪”的情况下，中国排名前十名私人资本家总共拥有27158亿人民币的惊人资产。这些资产完全来自于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的剥削。

排名	姓名	财富（亿元）	财富来源	年龄	居住地

1	钟睒睒	4,244	农夫山泉/万泰生物	66	杭州
2	张一鸣	3,825	字节跳动	38	北京
3	曾毓群	3,272	宁德时代	52	宁德
4	马化腾	3,162	腾讯	50	深圳
5	马云	2,673	阿里巴巴	57	杭州
6	黄峥	2,132	拼多多	41	上海
7	何享健家族	2,067	美的集团	79	佛山
8	魏建军家族	1,996	长城汽车	57	保定
9	丁磊	1,932	网易	50	杭州
10	王卫	1,855	顺丰控股	51	深圳
	杨惠				

11	杨惠妍家族	1,790	碧桂园	40	佛山
12	秦英林家族	1,616	牧原股份	56	南阳
13	庞康	1,539	海天味业	65	佛山

最近刚刚去世的解直锟，是资本帝国“中植系”的实际控制人，其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一万亿。掌握了四大金融公司和持股超过30家上市公司。曾经疯狂一时的资本帝国“明天系”、安邦集团、海航集团和现在依然强势的“宝能系”所控制的资金规模甚至超越了解直锟。我们可以看到，在私人垄断资本的背后，往往闪现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魅影，一些高级官僚，通过“白手套”的方式，操纵名义上的私人垄断资本，实现对巨额资本的控制和代际传递。一个令人熟知的例子是周永康家族。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周永康通过现年42岁的周永康长子周滨、周滨岳母詹敏利、周永康的弟弟周元兴、弟妹周玲英、侄子周峰等人，控制了一个资产超过900亿的资本帝国。

> 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列宁《帝国主义论》）

三、我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历史

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轫于解放之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逐渐成熟起来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前，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走资派之间反复斗争的历史过程，这一斗争以无产阶级的彻底失败和走资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走资派领导的共产党在城乡大力扶植私人资本的同时，自身蜕化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集体占有以国有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资料，每个成员按自身在党国体系中的级别享有相应的收益；同时在政治上垄断了一切权力，并以政治吸纳（人大、政协）的方式将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纳入到政权范围中，形成了中国的统治阶级。

>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子女不甘心现有的财富分配，通过“价格变动”、“利息变动”、“汇率变动”等种种手段巧取豪夺，将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放入自己囊中。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以邓朴方所在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为代表的光大、农信、康华、工商、中信五家公司被

> 称为盛极一时的大“官倒”，其余各地还有更多的小“官倒”。据统计，大大小小的“官倒”获得的垄断租金总额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40%落入与统治阶级成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引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由于其对国有资本只有控制权，而所有权只能以集体所有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能通过直接合法的方式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集体占有权传递给下一代。因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个体必然存在着将国有资本私有化的动力，正是这一动力导致了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

另一方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在私有化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和分歧。首先，私有化过程对于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并不是一个本阶级成员平均分配国有企业生产资料过程，而是一个极端不均衡和矛盾重重的过程。因此，私有化过程必然导致已经或者将要分到较大蛋糕的阶级成员与利益相对受损的阶级成员之间的冲突。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关于私有化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在苏联表现为八一九事件，在中国则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之争。最近发生的司马南举报联想涉嫌“国有资产流失”是这一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最新表现。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全盘私有化也许符合一部分本阶级成员的利益，但是私有化之后无法形成庞大的独立的垄断资本集团，因此无法与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也就无法掠夺海外剩余价值，不符合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打左灯，向右转”的情况。 一般而言，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僚由于其远离经济领域，在私有化过程中受益最少甚至受损，因此经常表现的更“左”，更支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经济领域的官僚则会显得更“右”，更支持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他们往往借市场化改革之名将国有企业收入囊中，例如上个世纪末一直持续到2010年以后的国企私有化浪潮。这一国企私有化过程由于严重损害了国企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工人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钢事件。而到了今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可以熟练地同时驾驭和使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新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2012年之后，国企改制基本完成，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隐学”和“显学”并立的新局面。习近平一方面高调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其意识形态等核心内容，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此为“显学”；另一方面又实际重用一贯以新自由主义和尊重市场著称的刘鹤，令其主管经济工作，此为“隐学”。

四、中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3.2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20年12月）、268.5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323.2万亿国有金融企业资产和43.5万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2020年底），是世界上仅次于西方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最大的六家国有银行一年的利润就达到10763亿元，占服务业500强利润的41.50%。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自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完全建立在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国有资本总量的迅速增加，另一面则是无产阶级忍受尘

肺病、工伤、欠薪、超长劳动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无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从来没有属于无产阶级。

> 根据中国学者董涛的统计数据，在过去20年，中国资产阶级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率大幅上升——在中国工业企业总投资中薪资占比不到10%，但在同期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接近50%。中国在珠三角地区的工业生产率提高了约17%，而工资增幅却仅为6.7%。此外，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53.4%降至2005年的41.4%。从1993年至2004年，中国国有企业和重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也在快速下降，从240%降至43%。如果中国想继续维持自己的帝国主主义强权地位，就只有继续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为了与美国、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竞争，中国必然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落后国家，由此也必然将剥削全世界劳动人民。

引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

在残酷剥削本国无产阶级的同时，由于国内资本过剩，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将目光转向了海外。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使用外资的比值从2011年的0.63猛增到0.77。从2014年开始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到2016年中国资本输出达到顶峰，直接对外投资额高达1961.5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13.51%，位居全球第二（第一是美国，占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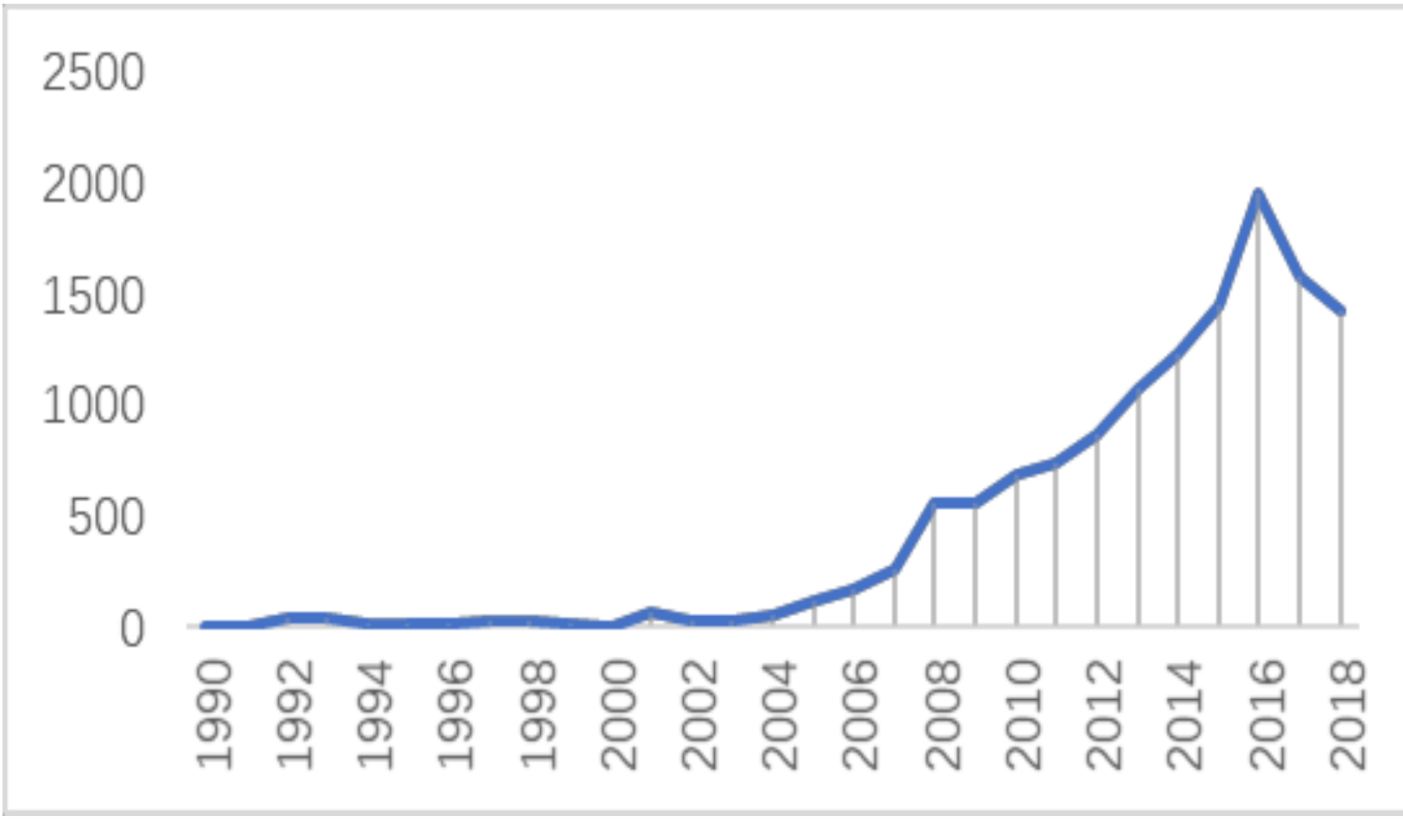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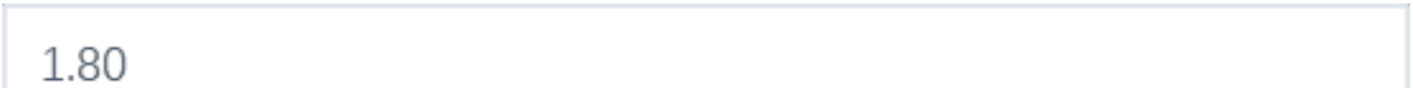


图 4. 39：1990-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亿美元）[1]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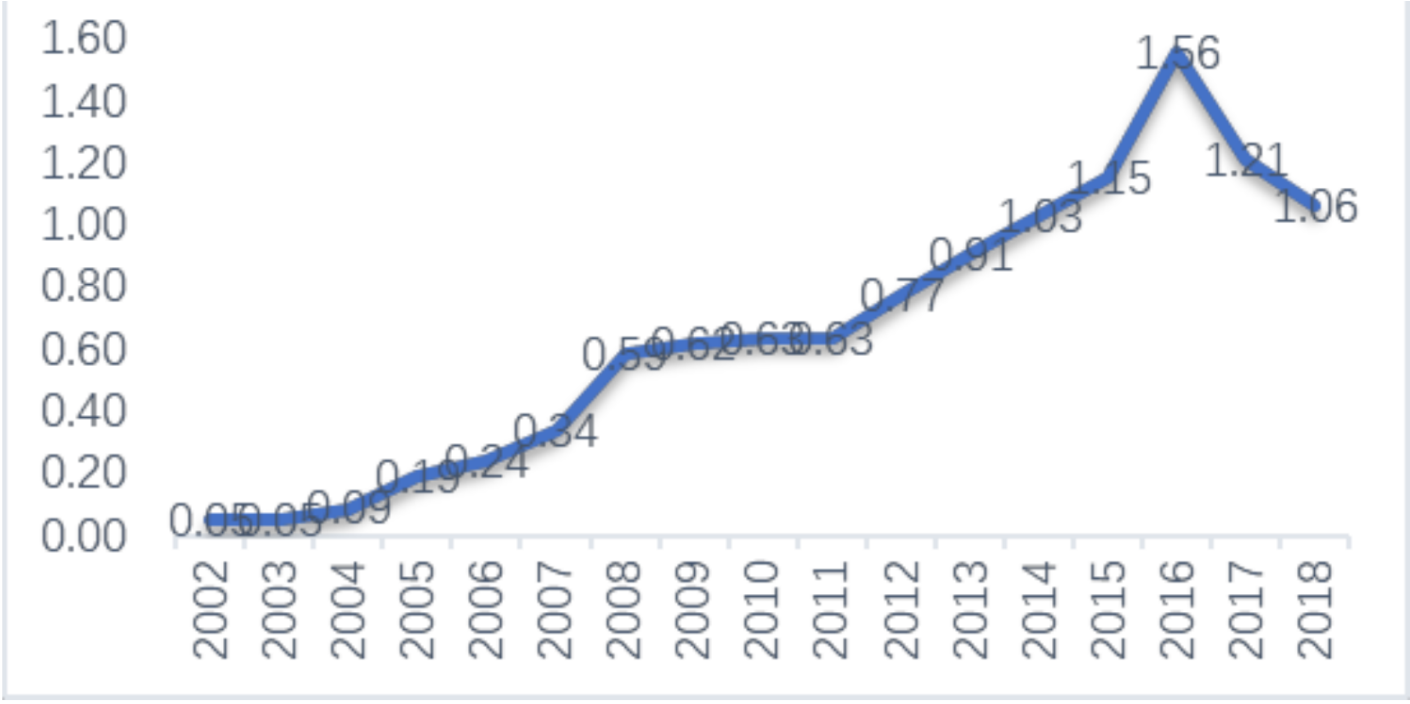


图 4. 38：1990-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3]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输出”这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特点做了清晰地刻画：

> 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将从海外无产阶级身上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来收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人贵族”阶层。

>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来说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列宁《帝国主义论》

自2012年以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加强所谓“意识形态工作”，通过民族主义和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来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给群众一种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错觉，同时煽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帝国主义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这种宣传也可以警告统治阶级中一些成员个人的私有化行动，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意识形态在国内为国有资本结束医疗、教育和分配住房等工人福利，以最大程度攫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在国外，所谓全球化和市场化主张则为出卖本国无产阶级利益，与西方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进行暂时的妥协，共享中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打下了基础。

这一方面的具体表现为中美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几乎答应了美国政府90%以上的要求，同意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同时向西方金融资本开放中国银行、保险、证券和电子支付等金融领域。这一协议本质上是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西方金融资本达成的关于如何合作疯狂掠夺中国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协议。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世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过去和未来都可能出于种种目的而达成一些妥协性暂时契约，例如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这些暂时的协定既完全无法被用来否认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也完全无法论证各帝国主义之间像考茨基所认为的“超帝国主义”一样，可能实现“永久和平”。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

> “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 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以获取利润;而且他们必须是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 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在民族问题上，特色黑帮彻底抛弃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基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而代之以新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掠夺；以“扶贫”为名强迫少数民族农民变成工业劳动力，从而更大程度榨取少数民族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打压少数民族自己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高压政策，通过“再教育营”等一系列暴力手段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运动。

中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残酷压迫正是中国目前民族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正如列宁所说：

> 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

> 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注：《金融资本》第487页。］

> 对此还要补充到是，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的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列宁《帝国主义论）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是现阶段革命的主要敌人。

【今朝特刊 | 理论争鸣】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驳《列宁道路》的民主革命论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革命的方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革命事业的关键问题，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扬帆起航时都必须给出清晰的答案。只有主要矛盾和革命方向找准了，才能使自己的主观努力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保障在实际工作中抓准关键问题，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来带动解决其它矛盾，从而不断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在诸多派别中，《列宁道路》提出我国当前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即第一阶段革命）实现的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是为了争取形式民主权利，民主革命胜利后仍旧是资产阶级统治。换句话说，《列宁道路》在当前的革命阶段所谋求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从专制转向民主。这种观点一方面歪曲了民主革命的目的，民主革命的本质不是形式民主，而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掩盖了当前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当前已经是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全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充分发展导致的，资产阶级对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的压迫已经日益深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的方向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实现公有制。由于在广大左翼青年中，《列宁道路》所主张的观点仍有一定影响，面对主要矛盾和革命性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马列主义者必须认清方向，以保证革命实践沿着正确航线前行。

一、民主革命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

关于民主革命的实质，《列宁道路》的许多论述是模糊的且前后矛盾的。在它的诸多论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今中国的革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变，亦即在他们所主张的第一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实现的仍旧是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 1976 年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至于中共是不是像苏共那样灭亡，只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罢了。无产阶级必须为这种形式转变做好准备，准备着从民主革命这一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毕竟这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转变。”

这在相当程度上误解了民主革命的概念。

民主革命并不是对形式民主的革命，而是对实质民主的革命——也即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列宁说过：“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1]。也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消灭社会关系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这个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们的‘最高纲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2]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

主革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即革命任务同民主革命是相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甚本内容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土改的目标就是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另一个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在历史上，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也是资产阶级革命要完成的任务。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3]。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虽然民族独立的任务至关重要，但它仍是从属地位的，因为在落后国家，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而农民面临的最迫切的需求是获得土地。这也决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民族运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其主要群众就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代表。

纵观十九世纪以来的各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外，民主革命的对象还包括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即阻碍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解放前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垄断财政、金融、外贸等国家资源，发展到最高峰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多年中，集中了二百亿美元的财产，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相融合，促进封建主义、地方割据不断发展，严重制约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强大社会基础。因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类似的还有 1848 年革命时期法国的金融资产阶级，这个金融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比工业资产阶级规模、社会力量要大得多，是奥尔良王朝的支柱，又称为金融贵族。金融贵族也是垄断财政、金融等国家资源，对企业主和农民征收高额赋税，阻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也阻碍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

因此，仅仅从形式民主出发，仅仅从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出发，是不可能理解一般民主革命实质的，更无法认清当代中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必须从形式民主深入到社会生产关系，分析这个时代中国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任务，才能看清新时代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二、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

《列宁道路》论述民主革命时，曾提到了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内容。它支持民主革命论的依据之一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因此需要首先进行民主革命，扫除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性、“深刻的不平衡性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城乡对立

资本在城市的集中意味着新一轮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而同时与之相并存的是外来务工者虽然工作在城市，然而因为户口和房价的限制（隐藏在房价背后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房地产行业超额利润的攫取，户口则是官僚掌握的一种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的方式。例如在北京，公务员相比于私营企业的员工获得户口的机率要大得多），打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乡村承担：乡村低廉的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工伤致残工人的成本等，使得资产阶级得以利用这个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来压低劳动力的价值。

然而，这样做给资本带来的后果便是——**资本主义在乡村迟滞而又萎缩的发展形态，农民**

工极低的消费水平，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难以被彻底开拓。

(2)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

如此模式下，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依旧是并不充分的国内市场；而留给东部地区的也并不都是甜果子——生产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带来的是对土地、原材料、粮食等资源的巨大需求，超过本地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的部分则只能由外地以更高的成本提供；同时，人口的集中和工厂大规模用地都带来的是土地资源的紧缺，地租则一路上涨——这一不断扩大的人口与生产的集中对资本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劳动力价值的快速上涨，工人在拿着极低工资的同时却需要面临快速上涨的房租和餐饮费用，阶级的矛盾被迅速激化。

然而，资本能够在一地聚集起初便是因为这里便利的市场、交通、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等条件，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则在不同程度上更加便利了这些条件。因此，资本在一个地区越集中就越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毫无疑问这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却绝不是最好的道路。因此尽管“大城市病”使得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都苦不堪言，这样的集中在自然的状态下也并无减少的趋势。”[4]

《列宁道路》所描述的这种城乡对立和区域不平衡，这种资本主义无法“充分发展”的特征，是新时代中国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如何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呢？《列宁道路》关于这种联系的论述是混乱的，一会儿说：“**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需要留一段时间来发展资本主义”，似乎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扫除这些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因素；一会儿又说“只有阐明了中国当下‘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专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出‘一次’或者‘二次’革命的观点” ，似乎是说当今政权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民主革命要推翻专制政权，以扫除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我们对这两种情况一一分析：

（1）如果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不是扫除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因素，那这么一场民主革命在经济上、在生产关系上的任务是什么呢？没有任务！《列宁道路》在其它地方提到过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到过通过民主革命获得政治自由，却唯独没有提到民主革命在生产关系上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它所谓的民主革命成为仅仅涉及到政治制度变迁和阶级关系变更的革命，而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么是这样的革命不存在，要么是缺乏对革命内涵的分析能力。

(2) 如果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扫除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因素，而这种扫除又是通过推翻专制制度（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来实现的话，那必须理解为正是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改开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政治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经济上则通过国有资本集团垄断城市土地、粮食供应、水、电、油、汽、通信、金融等关键行业，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共产党通过所掌握的这些经济资源，采用凯恩斯主义道路，大力干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地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前列；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关系渗入了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最偏远的农村和最偏僻的山区都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中。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非但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的限度内实现了“充分发展”。

这里，在界定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方面，我们和《列宁道路》的认识是根本不同的。《列宁道路》将其理解为“不受阻碍”，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还受到一些阻碍，所以只能进行民主革命。但是，如果非要等资本主义发展到“完美”和“不受阻碍”才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没有爆发的可能。1917 年 10 月的俄国，农民等小生产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还不占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资本主义发展地极其不充分。这些正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现在《列宁道路》又捡起这些陈腐的论据反对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如果非要等资本主义发展到“完美”才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今天的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也都没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道路》还不敢公开承认这种过于荒谬的观点，只能以一种折衷和模糊的陈述进行掩盖：“现实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彻底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能允许的一切民主条件，从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也存在着诸如种族歧视、性别压迫、警察滥杀无辜等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本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中小私人资本与掌握政权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而存在着美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华尔街政府的可能性。”[5]《列宁道路》泛泛地谈“可能性”，但是，这种抽象的、无法向现实性转化的“可能性”是空洞的，是无。

“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绝不可理解为 “绝对不受阻碍”。这种“绝对不受阻碍”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现实中而非头脑臆想的事物总是由内在矛盾推动运动的，总是受到阻碍的，阻碍的顶点也正是矛盾的顶点，也正是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变的节点。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能理解为中国走完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只能理解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开始充分暴露并且日益尖锐。尖锐的城乡对立和极度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正是帝国主义时代尖锐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对立和不平衡，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某种特殊形态（专制或民主），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增殖的特性本身。因此，从这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中，得出的结论根本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还不充分，恰恰相反，它是过于充分了，以至于走到了尽头。由此，进一步的推论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这套体系即将走到终点，只有通过革命推翻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这种内在的对立和冲突。

因此，《列宁道路》，或者是转入第一种情况，即承认自己所理解的民主革命，不包含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具体内容，或者转入第二种情况，认为民主革命包括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种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只能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于是便自相矛盾，推翻了民主革命本身。

《列宁道路》犯下这些错误的核心原因，乃在于它主要从政治变迁（专制政权）和阶级关系（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角度去思考革命，而忘记了这两者都是根植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基础之上的。因此，也就错误地理解了革命的本质。

革命并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变更。革命，是用暴力的方式对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剧烈调整。在一场社会革命中，旧的生产关系或者旧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因素被扫除了，新的生产关系便要建立起来；相应地，之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层被推翻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就要上

台。随着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建立，新的政治设施、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也会逐步生根发芽。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革命的实质，而政治设施、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等，只是变革的表现形式。理解一场革命的本质，不能仅仅从革命中的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出发，而是要牢牢抓住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一关键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因此，要界定一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命的性质，必须要从现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分析它要扫除生产关系中哪些旧有的因素，建立哪些新的因素。相应地，要判定新时代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

为了理解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对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随着 1976 年文革结束和走资派上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依托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独占政治统治的制度特点，和欧美产业转移的时代特点，中国的资本主义在 1978-2008 年间实现了近 30 年的高速发展。2008 年-2012 年，中国在欧美金融危机时期弯道超车，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左右，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如果说在此前由国有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而其它行业还处在自由竞争状态，那么在 2012 年之后，中国的主要生产部门都实现了垄断，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到多数服务业，几乎都形成了几家行业巨头独占鳌头的状态。自由竞争结束了，垄断时代到来了。与实体产业垄断同时发生的，是金融资本的疯狂扩张，是它对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日益深刻的渗透和控制。同一时期，国内主要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为了实现过剩资本的转移，为了进一步获得超额利润，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步伐大大加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特征。

帝国主义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在国内，中国步入帝国主义是跟全行业的市场饱和同时发生的，生产过剩使得资本利润率快速下滑，经济陷入全方面的萧条和停滞；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地太过充分，市场渗透到了最偏远的地区，把绝大多数人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入城镇化末期的中国，已难以找到有效的矛盾缓和空间；为了满足资本快速增殖的需要，劳动群众的工资被压至极低的水平；市场化的教育、医疗尤其是住房压得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喘不过气来，资本用房贷和房租夺走了劳动群众的大部分收入，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劳动群众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生活压力的增大导致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普遍降低，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资本增殖的长期环境更加恶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工业无产阶级在 2011-2014 年之间发起了一系列有组织的罢工斗争，要求获取更加合理合法的工资。尽管这种斗争在 2015-2021 年间由于经济衰退而暂时减弱，但是在 2022 年的富士康工人抗争中，无产阶级再一次展现了团结起来后不可战胜的力量。

为了应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统治阶级自 2015 年以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管控，强力打压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其它阶层的不满情绪在逐步增加；在国外，中国加大资本输出，在非洲、欧洲和东南亚的一系列投资和贸易举措，不断触动着在这些地区的旧有利益格局。作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垄断资本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旧有市场进行重新瓜分，这种要求导致它和传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摩擦日益加剧，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旧有的国际格局正逐步打破，新的国际垄断同盟正在加速形成中。为了适应垄断资本扩张和重新

瓜分国际市场的需求，统治阶级在国内舆论方面大肆鼓动民族主义，挑动本国无产阶级去反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劳动群众，为未来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做准备。

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矛盾的总体轮廓，从这种轮廓中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帝国主义中国的矛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暂时的和历史的制度，表明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消除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只能是社会主义。其所以是社会主义，乃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局部调整（如供给侧改革，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强化管制或放开管制），只能短暂地缓和冲突，无法解决资本增殖面临的根本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便是消灭资本；其所以是社会主义，还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过于充分，为社会主义建立了极其坚实的物质基础：既然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已在多数行业中造成了垄断，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导致一切行业的过剩，那么它也就同时也就造成了劳动群众利用这些高度社会化的产业来参加社会管理、组织生产和改善物质生活状况的有利条件。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有远超 20 世纪的物质条件：更为庞大的社会经济组织、更加丰富的物质产品、更大规模的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阶级、更少的封建和小生产的残余。

因此，这个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和直接要求便是推翻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这种变革涉及到的直接对抗的两大阶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民主革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代革命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阶级关系和统一战线

《列宁道路》认定当代中国革命为民主革命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左翼，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垄断资本之间存在矛盾，他们也具有革命的倾向。在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应该团结他们，而社会主义革命只会将其推向对立面。因此，当前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里涉及到各个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政治态度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列宁道路》谈得并不多：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条件脱离直接生产过程去从事非生产劳动，而受到大资产阶级排挤的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的政治代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小资产阶级具体由哪些阶层组成，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种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随着经济危机加深，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进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充满怨恨，但又苦于找不到革命的道路。……但是，当特色政权加速法西斯化，改良主义的空间被扼杀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会转向革命立场。”[7]

“不论革命成功后是否共同组建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都必须牢牢把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将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5]

这些多是泛泛而谈，我们仅指出比较重要的一点稍作分析：从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得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中间是缺乏逻辑依据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必然要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是，难道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就只能是民主革命吗？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的统一战线就只能是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吗？为什么就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呢？在这里，《列宁道路》简单地把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同起来了，这在历史上是完全错误的。俄国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者和小农（类似于中国土改时的“中农”）总体上都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应该联合与团结[8]，这里的“小农”就是历史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小资产阶级既可能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可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从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这一特点，并不能直接推出革命的性质。

关于中等资产阶级，《列宁道路》有大段的论述：

“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具有相当明确的纲领和目标的政治集团，其**主要阶级基础是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既与小资产阶级相区别，也与垄断资产阶级相区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纲领是建立类似于美国这样进行全民普遍选举和采取宪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他们经常所说的“正常国家”。在这样的“正常国家”里，中等资产阶级可以免受官僚专制权力的侵害，也不会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所以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家”。”

“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区分是，**中等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官僚作为“靠山”，作为其完成垄断的暴力保证，因而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取市场一般利润率，而不能像垄断资本一样获得超额利润率。**同时中等资产阶级也时时面临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其进行兼并的风险。由此，产生了中等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这种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官僚专断”和“党”的痛恨。”

“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上文所说的其受到垄断资本的侵害，尤其是当正在崛起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建立全面领导权的时候，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原来奉行不移的改良主义立场在弱化，**其先进人物往往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中等资产阶级自身并不掌握国家暴力，其往往依赖于官僚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暴力来镇压发生在自己企业中的工人运动，因此其又表现出保守性或者说反动性。”[9]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该领导和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推翻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左翼的革命民主专政。”[10]

所以，《列宁道路》认为中等资产阶级是可能表现出革命性的，甚至是要参加未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它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自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垄断资本。

不过，我们要问，中等资产阶级在今天反对垄断资本，在明天就会革命吗？

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群体是垄断资产阶级，它们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其它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同这一主要敌人存在矛盾，那他们都是革命的力量吗？未必！和革命主要敌人存在矛盾的群体，有时也会成为反革命势力。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中，自由资产阶级难道不是跟沙皇及专制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吗？难道他们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专制制度，希望召开立宪会议、获得民主吗？但是，在 1905 年的革命进程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实际表现如何呢？它们很快同专制政府妥协，充当了沙皇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11]。因为相比于痛恨沙皇专制制度，他们更害怕工农群众的革命发动。

中等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究竟有多大意义，是会依时代和环境而变化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这种条件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确有一定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中立其中间派；而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相比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较多的发展，从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要更为尖锐，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对沙皇专制政权很不满，但是当劳动群众的革命洪流到来之时，资产阶级却迅速和专制制度和解，以求尽快结束“混乱的状态”，因此，在俄国民主革命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具备一定势力的、可以与工农群众联合行动的资产阶级左翼；而在新时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远远超过上个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发展的程度、两大阶级潜在冲突的烈度也远超上个世纪，相比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等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只能算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当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奋起反抗现政权，反抗资本统治时，中等资产阶级是更容易倒向劳动群众呢？还是更容易倒向垄断资本呢？当废除私有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迫切使命的时候，却预先幻想，在同垄断资产阶级存在矛盾的中等资产阶级中，必然会形成一个能同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左翼派别，并依靠这个幻想出来的资产阶级左翼派别来确定统一战线，岂不是很荒谬的吗？这将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呢？这只会用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幻想来麻痹无产阶级，只会模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退一步讲，即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存在一定的革命性，难道可以以此断定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左翼即使存在，也只能是一个人数很少，力量很小的团体，不可能左右革命的性质。《列宁道路》将今天中等资产阶级比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认为“中等资产阶级（其政治代表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毛泽东在文中所讨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具有相似性”[9]，那我们就看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革命性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理解的：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

……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

量。”

……

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12]

在这里，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方面”（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去判定革命性质）。虽然应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但这两个群体本身并不能决定革命的性质。放在今天的中国，以中等资产阶级存在一定的革命性来判定当前革命是民主革命，不也是可笑的吗？

1905 年的孟什维克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会使革命规模缩小，从而使革命陷于于失败”[1]，《列宁道路》也害怕资产阶级自由派退出革命，因此拼命抓住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放，甚至不惜削弱革命的原则要求。虽然《列宁道路》通篇在谈无产阶级领导权，但由于看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真正的同盟者，看不到无产阶级胜利的真正希望，只能把未来寄托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身上，甚至认为一旦离开了他们，“同盟者之间的内部斗争会极大削弱革命力量，**从而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或者资产阶级窃取革命果实，与反动派分享政权。**”[5]

《列宁道路》之所以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因为它没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各阶级以及它们的政治态度。

毫无疑问，在新时代的中国，垄断资产阶级是敌人中最反动的一派，而无产阶级（包括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工人、脑力无产阶级）是主要的革命者。除此之外，还剩下小资产阶级和非垄断资本（《列宁道路》所谓的“中等资产阶级”），如何看待他们的政治态度呢？

首先来看小资产阶级。《列宁道路》泛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却看不到小资产阶级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他们跟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有很大不同了。我们参考《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中关于当代阶级结构和规模的分析，在小资产阶级中，自耕农占到近 60%，个体工商户超过 35%，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不到 5%[13]。自耕农和个体工商户占到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这两个群体虽然跟私有制的某种特定形式相联系，但其中的大多数已经同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完全不同了。今天，自耕农中的主体，依靠农业收入仅仅能勉强维持生活，甚至不能维持生活；城乡的小资产阶级，多数工作强度甚至大于无产阶级，收入并没有高出无产阶级多少[13]，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受到土地所有者的盘剥，房价和房租夺走了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他们生活改善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这些自耕农和个体工商户的大多数，生产方式属于私有制，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垄断资本绝对统治，市场近乎饱和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生产和保存多少剩余，他们这种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成为资本增殖的土壤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无产阶级差不了太多，更类似于列宁所说的俄国农村中的“半无产者”。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将给他们带来绝对的益处，仅仅住房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便会直接将这两类小资产阶级群体身上数十年的重担一扫而空。面对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时，私有制再也不是他们的枷锁了，因此，他们也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有力支持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同盟军。

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社会化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发展尚不充分的时期，拥有一定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中农以及个体工商户，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而且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小资产

阶级；而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垄断资本已经将整个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市场几乎完全饱和的新时代中国，拥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中农及个体工商户，虽然从所有制上还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但这已经是几乎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了。因此，今天小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不应该再划入中间阵营，而应该划入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不再是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派。

至于自耕农和个体工商户中上层的少数，以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能在经济活动中产生较多的剩余，有一定可能性向资本转化，因此，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历史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更为相似，其左翼有可能转入革命阵营，其右翼又可能转入资本主义阵营。

至于中小资本家，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差不了多少。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小资本家距离资本主义更近一些，形成左翼的可能性更小。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中下层自耕农、个体工商户）组成同盟军，中立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小资本家，将矛头对准垄断资本这一最大的敌人。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绝不排斥争取一般民主的斗争，无产阶级要积极参与这种斗争，要领导这种斗争，利用这种斗争分化小资产阶级上层，将一部分左翼争取过来，但无产阶级始终牢牢记得，它最有力的同盟者是城乡半无产者，是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民主的斗争始终从属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民主斗争从社会主义革命中独立出来的行为，只会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沦为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道路》幻想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去争取资产阶级推翻自己阶级的统治。他们所幻想的是联合自由派资产阶级去推翻垄断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在阻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发展。事实上，自由主义和波拿巴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形式，真正的自由派实际上不在民间，不在体制外，而在体制内，只不过现在政治环境不允许不能表达出来而已。当社会矛盾凸显，资产阶级不能按照原有方式统治下去的时候，他们立马就会跳出来，主张改变统治形式，继续维护大资本的利益（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另外的问题，只能由未来的历史走向来确定）。新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旗帜，《列宁道路》幻想用自由派的名义，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是与虎谋皮。资产阶级内部本就是矛盾重重，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日益激化的矛盾。这种矛盾无论怎样发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不是没有利用的可能，但却不能依此判定革命性质。

同样地，也决不能以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政治局势作为判定革命性质的依据。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是通过多次蓄力后的重击直接打败当代特色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还是特色政权在各阶级的行动中被迫该旗易帜转变为民主统治，又或是特色政权被打败后中等资产阶级暂时上台从而出现一个自由时期，这些都不是预先准确估计而只能交由力量对比去决定的事情。特色一党专政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统治，只是诸多政治走向中的一种可能性，决不能由一种或然而非必然的政治局面来判定革命的性质。

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是不以人哪怕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如周恩来

所说，在根本上“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中国当前已经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其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革命性质也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当前不是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中国掌权的不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反，掌权者是为资本家整体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革命任务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主张民主革命论的人实际上看不到革命希望，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他们鼓吹民主革命论，相当于散布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赠予无产阶级组织权的幻想，诱骗群众离开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两者之间通过民主革命回到一种和平共存的议会民主状态，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他们处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缺乏对工人斗争和正确路线的理解。当前确实是无产阶级运动相对低潮的时期，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意识都在不断增强，他们仍是新时期社会运动的主体。上层小资产阶级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又在不断分化，当前被大量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已经很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存在。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入到革命队伍中，当工人运动暂时沉寂，而一部分的左翼政治投机冒险行动失败之后，小资产阶级就认为工人运动已经失败了，工人阶级不能作为主体出现在革命舞台上，而要联合自由派去争取运动空间。这是小资产阶级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的表现。列宁曾经指出：“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主张民主革命论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同样的表现，如果革命高潮期持有这种思想，就只能把领导权拱手让人，将革命前途断送，将革命演变成资产阶级的改朝换代。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和脑力无产者群体，他们对资本的压迫已经觉醒，他们迫切希望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这必然转化为争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动力。无产阶级要求的民主是当家作主，而不是议会民主这样的形式民主。

---

[1] 列选一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年 6—7 月）

[2] 列选一卷，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 年 11 月 26 日和 12 月 2 日[12 月 9 日和 15 日]）

[3] 列选二卷，论民族自决权（节选）（1914 年 2—5 月）

[4] 《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资本主义无法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充分发展（以中特为例）》，列宁道路,2021.12.03.

[5] 当代中国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列宁道路，2021.11.23.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7] 论我国革命，列宁道路，2021.11.23.

[8]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

[9] 论我国革命（二），列宁道路，2021.11.24.
[10]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2022.01.03.
[11]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64.
[12]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7.
[13]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2019.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TG 频道《今朝》：https://t.me/MLMismRevolutionary，加入我们的 TG 读者群 https://t.me/+G-VKERmOA4IxMzRk，一起跟踪最新文章，研判阶级动态。

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上）

列宁道路

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上）

列宁道路
全文目录：

一、革命性质的两种判断标准以及它们的优先级

二、为什么说中国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实际上很低

三、民主革命的一般含义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四、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及其两条道路

五、《列宁道路》的看法在2022年11月民主运动中受到的检验

附录 阶级结构估计的办法

中国必将到来的新一轮革命或许可以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理论上的准备较为充分。列宁在1905年6、7月间，于10月全俄政治罢工和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即将到来的前夕才写下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忧虑力量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放弃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沦为自由派攻击专制制度的工具。《今朝》则在2023年1月，在并不存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历史条件下，刊发了题为“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驳《列宁道路》的民主革命论”（以下简称为“《今朝》文”）的文章，忧虑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为已是“遥远过去”的民主革命所替代。《列宁道路》并不认为这个问题迫切到了《今朝》文所说的“关键”的地步。列宁所揭示的、在一个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一系列环节构成。只有抓住那个“今朝”（在这个词本来的时间意义上）最突出的环节，也就是当下的关键，才能让整个链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从而迈出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步。我们现在还处在这整个链条最开始的环节上，最关键的是建立作为策略基础的组织力量，即通过工人小组、全国政治报、实质建党、全面灌输以形成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在这个力量形成以后，如何使用这个力量，是像冒险主义者那样希望把特色黑帮、资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扫掉，还是像《今朝》那样浪漫主义地把小资产阶级放进社会主义革命的阵营去攻击自由派和黑帮，还是像《列宁道路》所主张的那样，学习列宁，通过领导反专制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关键。但是，一来讨论革命性质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教育，可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二来可能形成理论上的比较充分的准备，让先进分子在历史关头来临前就具备相应的修养，因此我们打算初步论证一下当下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说明它的两条可能的道路，指出在这两条可能的道路中，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上升型民主革命道路是唯一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同时分析表现为冒险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别错在何处。

一、革命性质的两种判断标准以及它们的优先级

关于革命性质，有两种判断标准。第一种判断标准，是从社会性质出发，从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出发，或者说是从革命的客观条件出发。第二种判断标准，是从阶级状况出发，从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出发，或者说是从革命的主观准备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用主观准备程度去判定革命的性质，其中，主观准备程度是直接的判定标准，而客观条件是间接的判定标准。这一看法基于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结合了决定论和能动论这两个方面。由于唯物史观中的决定论方面，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面，这两种判断标准在许多情况下是一致的。由于唯物史观中的能动论方面，即上层建筑可以先于经济基础而改变并推动经济基础去改变，这两种判断标准在一些情况下又是不一致的。在它们不一致的时候，直接的判定标准，即革命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这一标准，比起间接的判定标准，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这一标准，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之所以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具有判定革命性质的优先性，是因为革命是由革命阶级直接完成的，而革命阶级在同样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在二者冲突时，把生产关系标准置于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这一标准之上，就会形成一种类似俄国革命中的“经济派”的思潮。这种思潮，在革命处于准备阶段时，主张工人能够由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自动具有阶级觉悟，从而抹杀了对工人进行全面政治灌输的任务。而在革命处于高潮时，又会借口革命脱离了既有生产关系基础，反对革命的激进化，例如在毛泽东时代所批判的“先机械化再集体化”的主张。我们反对这种优先考虑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的判断标准，也反对它衍生出来的第二国际式的思潮。我们把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作为首位的判断标准，认为当无产阶级尚未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哪怕客观上已经有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而当无产阶级（包括贫雇农）已经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即使生产力并不发达，即使雇佣劳动关系并没有充分发展，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这两种判断标准，特别是针对考茨基式的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置于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之上的做法，列宁说：

> “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今朝》文则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传统，照搬第二国际和考茨基传统：

> “《列宁道路》犯下这些错误的核心原因，乃在于它主要从政治变迁（专制政权）和阶级关系（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角度去思考革命，而忘记了这两者都是根植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基础之上的。因此，也就错误地理解了革命的本质。”

《列宁道路》确实从领导（而不仅仅是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角度去思考了革命，但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为了争取这种目前掌握在自由派手中的、对小资产阶级而言的民主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觉悟和组织起来， 必须走工人小组、全国政治报、实质建党、全面灌输这些步骤。对于这些，《今朝》文却只是说：

> “当前确实是无产阶级运动相对低潮的时期，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意识都在不断增强，他们仍是新时期社会运动的主体。”

好一个“不断增强”！就靠着“不断增强”去实现社会主义吗？靠着这样的自我安慰，不但实现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连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也争取不了。而这是那种把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屈从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思维方法所必然衍生出来的结果。《列宁道路》从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看法得出了为此必须积极工作、创造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结论，《今朝》从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得出了“他们（包括‘脑力无产者’的‘无产阶级’）对资本的压迫已经觉醒”的结论。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到底是谁在断送革命前途呢？

关于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的判断标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一下，以说明这并不是仅仅依据列宁的一句孤立的话，而是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的思考方式。例如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曾指出：

> “社会革命不是一次会战，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所有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些改革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正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用彻底革命的方式表述我们的每一项民主要求。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在一项基本的民主改革都未充分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经过了民主主义训练的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可以战胜资产阶级，哪怕资产阶级并未进行充分的民主改革。或者说，哪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那么充分，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从另一方面说，未经民主主义训练的无产阶级，没有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哪怕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并成为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

又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

> 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1918年夏天才开始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82、18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个论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标准的角度看是很让人费解的。列宁的解释则是从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出发的：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农村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从富农的影响下摆脱出来，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因此农村的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而是民主主义性质。等到1918年夏天，虽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由于平分土地，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还加强了，雇佣劳动关系还削弱了，但是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觉悟和组织起来了，因此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了力量，就此展开了。

列宁不仅用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标准思考俄国革命，而且用这一标准来思考其它国家的革命，例如德国革命。这一点特别有启发，因为列宁认为德国是当时的第二号帝国主义国家，和今天特色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当。但是列宁并不因此就做出德国革命一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结论：

>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德国革命后来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线。这当然不是因为德国的帝国主义不够发达，不是因为德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中国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加以说明，但跟当时德国“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情况相比，自然是远远不如的。这种情况下的中国革命，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不可能。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只是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生产力基础，但不会自动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力量提供出来。只有经由实质建党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通过领导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二、为什么说中国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实际上很低

既然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是判断革命性质的直接标准，既然有足够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就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承认已经存在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去承认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呢？是否存在一种秘密的组织力量，既不为黑帮警察所发现，也不为各派马克思主义者所了解，却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工人党员？如果存在这样的力量，那中国革命不就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吗？

衡量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的规模，列宁采取过三种方式。在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方式最为直接，那就是统计党员人数和工会会员人数。（这一方式在1905革命的高潮期间也采用过。）党员人数那时在几十万的规模，工会会员人数则在数百万的规模。我们今天不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各派组织的规模是秘密。但据我们所了解到的，都非常有限。一个直观的历史检验，就是佳士抗争这场具有明确社会主义方向、其参与者当时都具有坚定社会主义意识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包括觉悟工人、声援团和背后的二线、三线人员在内，其规模也不过百余人而已。佳士抗争的公开要求，诸如释放被捕工友、建立工会等，都完全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只是因为参与者的社会主义立场，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方向的斗争。

列宁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十月革命胜利前的这十年间，经常使用的衡量有觉悟和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的方式，是统计有多少工人给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定阅和捐款等方式。当时各派报纸都公布经济支持的数额和进行支持的人数或组织数。列宁经常用提供经济支持的工人人数或组织数去证明觉悟工人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而只有少数觉悟工人在支持孟什维克。列宁号召工人每周向《真理报》捐款一戈比（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块钱人民币），主要不是因为《真理报》需要工人的经济支

持才能生存和发展，而是因为这种捐款习惯培养着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着工人用实际行动支持自己政党的觉悟。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指导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时，比如说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也曾强烈建议英国的各派共产主义者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并定期出版报纸，然后通过号召工人捐款来巩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 “要让这个地区的矿工能够每天（假如愿意，开始时可以一周一次）为自己的日报（或周报）——即令篇幅很小很小，这无关紧要——捐献半个便士；不然真正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英国的这一地区就不算开始。”（《致托马斯·贝尔同志》，《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0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但这个阶段我们同样没有达到：英国有形式民主条件，可以出版工人报纸。在俄国一开始没有，后来，列宁通过工人小组、秘密的全国政治报和实质建党后的全面灌输才建立了初始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通过这个先进阶层领导了1905年的民主革命；哪怕是革命失败了，也取得议会讲坛和公开报纸等民主成果。我们今天不但不能有公开报纸，无法接受工人的经济支持，并借以统计觉悟工人力量的增长，而且连实际存在的党也没有，甚至连全国性的政治报也没有。我们不但处于十月革命之前，不但处于1905年革命以前，而且处于1900年《火星报》出版以前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存在是不可想像的。

列宁在1905年革命以前，特别是在实质建党以前，如何衡量工人阶级的力量呢？列宁是用报纸的出版状况来衡量的：

> “报纸出版（和发行）号数多少和是否按时，可以成为衡量我们军事行动的这个最基本最必要的部门是否坚实可靠的最确切的标准，这样说看来并不是夸大。”（《从何着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报刊是政治组织的雏形和基础。如果在此基础上，政治组织建立起来了，那么就有更好的标准，比如说组织成员的人数等去衡量它的规模。如果这样的政治组织尚未建立起来，或者只是形式上建立起来而实质上并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就只能用它的机关刊物去衡量它的发展。要是它的刊物能够定期出版，它就有材料可以在自己的群众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要是它的刊物不能够定期出版，即便它自称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那也只是一句空话。

就算用最初始的报刊出版状况来衡量今天的促进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作，那也是非常不能让人满意的。《今朝》创刊时间不长，更新快，可是出版不稳定，持续性有待观察。《列宁道路》更新较慢，只能稳定地出季刊，更像《曙光》杂志，而不像《火星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几乎半年才更新一次，最近才有一点改善。这些小组以及其它的几个小组，哪怕像中毛共那样自称为党，也都只是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初始的一步。他们都需要去工人中间建立小组，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并在未来努力创办全国政治报，然后在政治报的帮助下把这些工人小组融合成一个实质上存在的工人政党。再以这个政党为工具，对工人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领导工人的各种形式的、包括自觉的游行示威在内的斗争。我们并不反对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们认为不通过领导民主革命，就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也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争取。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需要为精确纲领奋斗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无论是精确纲领，还是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目前都不存在，都需要我们在目前可以说相当薄弱的基础上经过多个阶段的努力把这些条件创造出来。

三、民主革命的一般含义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哪怕从《今朝》文的判断标准，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第二位的标准出发，《今朝》文对民主革命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它说：

> 也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消灭社会关系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这个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今朝》在这句话前后都引用了列宁，但只要自己一说话就错，因为作者完全不理解民主革命与土地革命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土地革命一定是民主革命，但民主革命不一定是土地革命。正是从把民主革命等同于土地革命这一误解出发，《今朝》坚信民主革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孟什维克的类似看法称作“无知”，因为他们不理解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因此总是把主张民主革命理解为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完全不知道恰好要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今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简直和普列汉诺夫及其一派孟什维克一模一样。我们来看看列宁是怎么向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孟什维克解释土地革命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的：

> “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农业已经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农业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说消灭了土地私有制，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土地制度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联成一体，以致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这种土地制度的国家里发生了革命，比如说工业资产阶级代替专制官僚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可能有一种没有农民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能有发生在这种国家里的没有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中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并不是农民革命，就是说它并不在只同农民有关的土地关系方面进行革命，并不把农民当做进行革命的、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一般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原理无疑适用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农民革命，但是这个一般概念丝毫没有说明，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获得完全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就客观必要性来说）成为农民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15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像中国人是亚洲人，但亚洲人并不一定都是中国人一样。甚至《今朝》自己引用的列宁的话都从正面解释了这一点，告诉《今朝》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只是《今朝》没有看到上面引用的、列宁从反面解释这一点的话，就自己把不超出资本主义关系就是民主革命，理解成了不超出资本主义土地关系才是民主革命。这样做，《今朝》就可以给土地关系之外、资本主义关系之内的变革盖上社会主义的面纱。例如，《今朝》文这样写道：

>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将给他们带来绝对的益处，仅仅住房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便会直接将这两类小资产阶级群体身上数十年的重担一扫而空。”

住房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教育和医疗的社会化都完全可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的变革，就像列宁

所说的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一样，因为这些都可以和雇佣劳动制度共存。俄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三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共和国，土地国有化，八小时工作制），布尔什维克党也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但一旦开始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取消粮食买卖和投机（即实行余粮收集制）的革命，就遭到农民的顽强抵抗，农民进行了以施琅喀塔得叛乱为典型的一系列暴动逼迫列宁让步。列宁最后通过新经济政策重新允许农村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的发展，直到去世也没有再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当然也会像他们在俄国的同伴支持土地国有化那样，支持住房、教育、医疗的社会化，只要不是自己所在的领域被社会化就行。他们会拥护《今朝》实质上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然后在真正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时候用暴动埋葬那些把小资产阶级看作社会主义者的《今朝》们。

《今朝》对民主革命的狭义理解，在使他们错误地把民主革命的主张当作“社会主义”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必然的阶级后果，就是把有民主主义革命热情的小资产阶级看作社会主义者。

《今朝》把小资产阶级放入社会主义阵营经过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把非生产劳动者（《今朝》使用的是“商业服务业工人、脑力无产阶级”这些不恰当的概念）划入无产阶级的范围，第二个步骤是把剩下的小资产阶级的多数从民主革命阵营直接挪到社会主义革命阵营。关于从事非生产劳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已经讲得非常多了，现在又不得不进行重复。考茨基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后来被列宁指责背叛了他自己整理的这本马克思的著作。在这样的辩论中，不但马克思主义者像个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也像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修正主义者。《今朝》对问题的提法都不正确，答案更是错误。正确的提法是：非生产劳动区别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者，作为小资产阶级，也区别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政治经济学上把工人阶级的范围确定下来。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以斯密对生产劳动的两种定义为出发点。在分析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第一定义时，马克思写道：

> “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想要理解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从而想要理解科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就只有理解科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只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才是科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在分析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第二定义时，马克思写道：

> “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更确切地说，同上述他的另一种见解交错在一起的见解）可归结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只有

> 这种观点才能使我们既弄清楚真正的雇佣劳动的概念，又弄清楚‘非生产劳动’的概念，而亚·斯密到处都用生产‘非生产劳动者’所必需的生产费用来给非生产劳动下定义。”（《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强调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意义之一，正在于通过这一区分可以使我们弄清楚真正的雇佣劳动的概念，从而弄清楚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概念。如果不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么所有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领取工资的劳动者，都可以被那些试图模糊阶级界限的人称作工人阶级。实际上，只有劳动力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针对那些试图把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雇员称作生产劳动者，从而称作工人阶级的尝试，马克思写道：

> “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

> 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论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妓女、仆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是马克思加的）

演员、妓女、仆役等等，都可以受雇于人，形成形式上的生产劳动者和工人，但这种把非生产劳动者看作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的判断，被马克思看作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所进行的归类。而按照劳动者的立场进行归类，则不能把非生产劳动者看作为整个社会生产了剩余价值的工人。非生产劳动者在雇佣他/她的资本家看来是生产性的，能够带来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她是非生产性的，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依靠别人的劳动生存的，他们消耗而非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

生产劳动者是科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且只有生产劳动者才是科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非生产劳动者应该划进政治经济学上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非生产劳动者，作为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存在着劳资斗争，有与工人阶级接近的时候，这是《今朝》看到的一面；作为不生产物质产品、靠工人阶级生产的物质产品过活的非生产劳动者，与雇主一样依靠工人阶级提供的剩余价值生活，而与工人阶级相对立，这是《今朝》没有看到的一面。这种非生产劳动者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与小业主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在阶级意义上是完全一样的。

马克思对家仆的阶级属性这样写道：

> “事实上，没有一个阶级会给小资产阶级提供更为卑贱的分子。”（《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

> 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马克思看来，受雇于人的家仆是非生产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中最为卑贱的部分。其他的非生产劳动者，则是小资产阶级中不那么卑贱的部分：

>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不管是否卑贱，非生产劳动者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并且不是小业主那样自食其力的小资产阶级，而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小资产阶级。马克思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今朝》的双重错误：既不应该用“商业服务业工人、脑力无产阶级”指代非生产劳动者，更不应该把他们划入经济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范畴。用脑力和体力划分阶级的做法，在今天中国的革命者中影响广泛，却显示了许多革命者理论修养的低下，对这种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大道的提法缺乏辨别力。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今天革命运动的乏力，与革命理论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有很大的关系。

冒险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的争论，正是在这种错误的提法下展开的。冒险主义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于是要反对小资产阶级，因此也要反对非生产劳动者集团。但他们思考的方式是把体力劳动者看作工人阶级，把脑力劳动者看作小资产阶级。实际上，雇佣关系中的体力劳动者可能是小资产阶级，雇佣关系中的脑力劳动者也可以是经济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例如，被雇佣的家仆多数都是体力劳动者，就应该把他们划进工人阶级吗？那马克思为什么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不是和他们的主人一样依靠他人劳动生产的产品生活吗？

浪漫主义者同样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看到要反对非生产劳动者集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太大，于是想要把非生产劳动者集团划进工人阶级的范围。他们和冒险主义者对待非生产劳动者的态度是相反的，但他们和冒险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却是一样的。冒险主义者说脑力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则说属于工人阶级。浪漫主义者引用恩格斯来纠正冒险主义者：

> “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恩格斯当然没有错，错在使用脑力体力划分阶级的冒险主义者。他们不承认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存在，于是与恩格斯直接矛盾。浪漫主义者还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论据去驳斥冒险主义者：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

> 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 (《剩余价值理论》附录“（12）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44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非常肯定有脑力劳动者生产工人存在，他们既然参与了资本主义的物质产品生产，就属于生产劳动者，是生产工人。马克思当然也没有错。这是严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然结论。冒险主义者不管这些，随意地选取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个标准，去划分本来应该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来划分的阶级界限。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对的，但这种随意造成的不精确性当然会遇到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不精确性还造成了这样的后果，那就是如果只用脑力体力来区分的话，浪漫主义者通过证明脑力雇佣劳动者可以是工人阶级，进一步得出了脑力雇佣劳动者全部是，或者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结论，并借以支持自己社会革命论。实际上，冒险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的整个讨论都建立在了脑力体力划分阶级这个错误的前提下。使用脑力体力在理论上根本就无法划分阶级，因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可以是生产劳动者，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者，因此都可以是工人阶级，也可以是小资产阶级。

用体力脑力划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做法是中国某些“理论家”的“独创”，可惜他们不理解理论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系列的训练作为阶梯，就像他们不理解实际中达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系列的步骤作为阶梯一样。这样的“独创”还是少一些为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剩余价值理论》的传统，是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去划清工人阶级和非生产劳动者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在此基础上，《剩余价值理论》还有一系列的推论，例如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较少的生产劳动者，即工人，就能够养活较多的非生产劳动者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受雇佣者中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分，因此这一区分不适用于小业主：

> 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 (《剩余价值理论》附录“（12）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因此，不能够把生产性行业中的小业主看作是生产劳动者，看作是工人阶级。比如拥有自己卡车的司机，虽然他所工作的行业是生产性的交通运输业，但他并未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中。他和出卖自己生产的商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样，虽然遭到资本各式各样的盘剥，虽然因为要少消费多干活才能维持小业主的地位，虽然生活水平甚至低于工人阶级的平均水平，但他仍然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小业主，而不是生产劳动者意义上的工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他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因为他

是非生产劳动者，而是因为他是小业主。非生产劳动者和小业主构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业主逐渐在衰落，而非生产劳动者则在发展：

> 如果生产劳动者是由资本支付的劳动者，非生产劳动者是由收入支付的劳动者，那末十分明显，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之比等于资本和收入之比。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比例的增加，不仅仅取决于资本量和收入量之间的现有比例。它还取决于增长着的收入（利润）以怎样的比例转化为资本，并以怎样的比例当作收入来花费。虽然资产阶级起初很节约，但是随着资本的生产率即劳动者的生产率的增长，它就开始仿效封建主豢养大批侍从。根据最近的（1861或1862年）工厂报告，联合王国真正在工厂工作的总人数（包括管理人员）只有775534人，而女仆单是英格兰一处就有100万。让工厂女工每天在工厂流汗12小时，以便工厂主可以拿她的无酬劳动的一部分雇她的姊妹当佣人，雇她的兄弟当马夫，雇她的堂兄弟当士兵或警察，来为他个人服务，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安排！ （《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97、19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非生产劳动者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可能在人口规模上超过工人阶级。从我们在附录中对中国阶级结构的估计来看，非生产劳动者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7.9%，非常接近工人阶级40.5%的占比。接下来，非生产劳动者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会在人数上超过工人阶级，形成类似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已经形成的阶级结构。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浪漫主义者把非生产劳动者划进工人阶级范畴的愿望。但请看看马克思在这里是怎么讲的：这是“两个阶级”！自食其力的小业主被看作小资产阶级，依靠工人阶级的无酬劳动为生的非生产劳动者却被看作工人阶级，这种事也只有毫不在意工人阶级阶级独立性的浪漫主义者才干得出来。

如果说第一个步骤，即把非生产劳动者划入工人阶级范畴，还只是显示了《今朝》理论上的笨拙和幼稚的话，那么第二个步骤简直都让我们吓了一跳。我们惊讶于真的会有人写下这样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句子来：

> “今天小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不应该再划入中间阵营，而应该划入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不再是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派。”

对科学社会主义要无知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提供这样的勇气。《今朝》为把小资产阶级的多数划入社会主义革命阵营，勉强找了三个理由：一是小资产阶级生活艰辛，如同工人；二是小资产阶级态度摇摆，会摆向无产阶级；三是小资产阶级由于市场饱合不再产生资本主义。这三个理由都完全不成立。

先看第一个理由。小资产阶级生活艰辛，并非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特有的现象。《今朝》文的作者只需翻看一下列宁批判民粹派的文章，就会看到列宁许多次地用统计资料指出那时俄国的小资产阶级一样生活艰难，一样只有靠多干活少消费才能维持，甚至一样相当比例的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低于雇佣工人。用生活水平代替生产关系去划分阶级，是《今朝》没有稳固理论观点的表现。

再看第二个理由。小资产阶级态度摇摆，有时会支持无产阶级，绝不是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理由，因为他们有时还会支持资产阶级，甚至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支持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并争取到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情况，在历史上属于少数的例外。引用列宁中立小资产阶级的话

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列宁还有很多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话。既然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列宁必然从两个方面都讲。而只引述列宁中立小资产阶级的话，估计都不是因为有意歪曲，而是因为无知。我们在这里引用列宁的看法直接与《今朝》对立的一段：

> “在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同时，我们应当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过来。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列宁从来不期望最多保持中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共产主义者，《今朝》则说他们中的多数“不再是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派”。难怪冒险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今朝》主张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民主革命，因为从科学上来讲，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朝》在这个问题上信口开河，一方面，说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必然要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说这个统一战线“为什么就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呢”。《今朝》甚至只从“小资产阶级”这个词本身想一想，想一想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小工人阶级”，就应该不会这样胡说八道。与《今朝》的信口开河恰恰相反，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联合小资产阶级进行，另一方面，联合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就只能是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方面，冒险主义者比浪漫主义者清醒得多。冒险主义者错在看不到民主革命阶段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浪漫主义者错在把这种民主主义的革命性硬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性，从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列宁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 “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今朝》陷入了矛盾：它又想要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又想要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只能祈祷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不要完结。可是列宁把《今朝》关在了马克思主义的门外，连个门缝都没有给它留：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民主革命后将全部完结。什么叫全部完结？就是一点也不剩下，就是完全不能指望小资产阶级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笑的是，《今朝》居然还试图引证列宁去支持自己的观点：

> 在这里，《列宁道路》简单地把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同起来了，这在历史上是完全错误的。俄国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者和小农（类似于中国土改时的“中农”）总体上都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应该联合与团结[[8]]，这里的“小农”就是历史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小资产阶级既可能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可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今朝》自己才在历史上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似乎忘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忘记了余粮收集制的失败，忘记了列宁本人在1918年遇刺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所为。可怜的列宁，被小资产阶级打了五枪，中了三弹，还得在《今朝》这里被迫支持小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革命。让我们相信《今朝》文的作者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小资产阶级吧。在他们完成彻底民主主义革命（他们以

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我们请列宁保佑他们少中几颗小资产阶级射出的子弹。

而且《今朝》在这里既不引用列宁的原话，又不写页码，只在文末标注“[8]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这些文件有40页之多，我们无从得知列宁在哪里支持了《今朝》的论点。我们猜测大概是指下面这句话：

> “上述三类农村居民的总和，构成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人口的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是有充分保障的。”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三类农村居民就是《今朝》所提到的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者和小农。列宁仿佛预料到了《今朝》要歪曲他的看法，就在这句话的同一页，列宁接着写道：

> “上述三类空前愚昧、十分分散、备受压抑、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是列宁加的)

列宁应该是非常担心有人要把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获得多数小资产阶级群众支持的观点，歪曲成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多数小资产阶级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因此对三个“在……以后”都加上了着重号。可惜列宁的努力白费了，《今朝》还是要进行这样的歪曲。列宁在《今朝》的笔下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在1905年说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将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全部终结，在1920年又说小资产阶级还有社会主义革命性。列宁有非常稳固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列宁从来没有丝毫的动摇。把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变成小资产阶级一般地支持工人阶级，难道不是恰恰反映了《今朝》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吗?

这里，我们顺便再谈一谈半无产者这个问题。半无产者这个概念，在列宁那里偶尔指全体小资产阶级，因为全体小资产阶级都有两面性；有时候指一部分时间当工人，一部分时间当小资产阶级的群体，像在《今朝》提到的这里就是如此；多数情况指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比如小农中占地最少、经济上最困难的部分，类似“下中农”的含义。在所有这些含义中，都不是说小资产阶级两面性就不存在了，小资产阶级就变成社会主义者了。小资产阶级两面性仍然存在，只是因为半无产者的状态越接近无产者，他所固有的两面性中，偏向无产阶级的那一面就越多，偏向资产阶级的那一面就越少。如果半无产者概念是指全体小资产阶级，那么就应该把半无产者理解为完全动摇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群体。如果半无产者这个概念是指一部分时间当工人，一部分时间当小资产阶级的群体，那么就应当一方面把半无产者理解为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过渡的群体，另一方面具体看这些半无产者到底是当工人的时间多一些，还是当小资产阶级的时间多一些。如果半无产者这个概念是指小资产阶级下层，那么就应当把半无产者理解为小资产阶级中最接近工人阶级的阶层，动摇性最小而革命性最强的阶层。我们通常在最后一种意义上，即小资产阶级下层的意义上理解半无产者。这个阶层整体上支持甚至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最

大，然而这和小资产阶级整体上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就在《今朝》想加以歪曲的这篇文献里，列宁强调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才是党工作的首要对象：

> “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黑体是列宁加的)

这里列宁不仅强调了单独组织雇佣工人是基本任务，明确了阶级界限，而且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并非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就一定会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需要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才能形成。这是我们在第一个部分论证了的看法。同样，并非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半无产者，他们就天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他们同样需要教育和组织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力量，甚至需要等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力量。正因为如此，列宁才在类别上把他们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区别开来。

最后看《今朝》把小资产阶级看作社会主义者的第三个理由：小资产阶级几乎不再生产资本主义了。关于小资产阶级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论》通过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详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结论之一。我们不去重复这些经济学原理的ABC，只引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去说明《今朝》关于小资产阶级几乎不再生产资本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直接对立的：

“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我们之所以如此认真地去分析《今朝》的胡言乱语，目的在于向读者证明：为了硬把革命的性质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就需要或者把小资产阶级划入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把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今朝》沿着前一条路走了下去，为了自圆其说，产生了荒唐的结果。但这些荒唐的结果中，有些正确的东西被猜测到了，那就是必须承认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性，必须争取劳动者的多数，才能推翻专制政府。但这样的结论，一来不应该用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浪漫主义幻想去论证，二来不应该取消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经过领导民主革命彻底完成的阶段才能达到。（未完）

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下）

列宁道路

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下）

列宁道路
全文目录：

一、革命性质的两种判断标准以及它们的优先级

二、为什么说中国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实际上很低

三、民主革命的一般含义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四、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及其两条道路

五、《列宁道路》的看法在2022年11月民主运动中受到的检验

附录 阶级结构估计的办法

四、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及其两条道路

这里我们要论证，即使使用生产关系的第二位的标准，当前的革命仍然是民主革命。我们借鉴《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第80页表2.4对中国2016年阶级状况估计的办法，对新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列宁道路》曾经发表过对此书的书评，书的电子版随书评一起发布。我们的分析与该书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三点：一是使用了最新的2020年的统计数据，二是估计了非生产劳动者的数量，三是考虑了小生产的分化情况，没有把从事农林牧渔等行业的人口都看作是小业主。具体的计算方法，读者可以参看本文的附录“阶级结构估计的办法”。

我们估计的结果为：

1、工人人数总计：就业工人2亿9650.3万人+失业工人2103.4万人=3亿1753.7万人。

工人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3亿1753.7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40.5%。（过程见附录B）

2、小资产阶级的总人数为：小业主1亿5238.0万人+非生产劳动者2亿9746.7万人=4亿4984.7万人。小资产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小业主19.4%+非生产劳动者37.9%=57.3%。（过程见附录C）

3、私营资本家人数为：A1就业人员7亿5064万人×私营资本家占就业人口比重2.35%=1764.0万人。私营资本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私营资本家人数为1764.0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2.3%。（过程见附录D）

4、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人数为：A1就业人员7亿5064万人×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就

业人口的比例0.62%=465.4万人。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465.4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0.59%。（过程见附录E）

5、以上四项总和为100.69%，不是100%，原因有二：一是未采用数学上融洽的登记失业率，而采用了更真实一些的、高出一个百分点的调查失业率；二是有0.2%的就业人口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没有进行分类。

在这个表现了生产关系总状况的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有3亿多人，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约为40%。这个阶级所能够发挥的历史作用，要远远超出它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而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所能够发挥的历史作用，又要远远超出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比例。十月革命时，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即日常就用向《真理报》捐款的行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大概有20多万人。当时俄国工人总数约在1000多万，人口总数约在1亿多人。也就是说，以政治报刊为基础、以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为日常任务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17年的努力（从1900年《火星报》创刊开始算起）教育和组织了工人阶级的2%。这2%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训练获得的，可以说勉强刚刚足以完成十月革命的任务。如果我们达到俄国十月革命时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2%的水平，考虑到工人阶级3亿1753.7万人的规模，则需要组织约635万觉悟的无产阶级。鉴于组织的力量随着其人数的增长而几何级数式的增强，或许实际上并不需要六百万这么多。但必须承认，这个数字目前几乎是零，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条从零到数百万的道路的终点，我们现在则站在这条道路的起点。在列宁看来，不通过领导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不可能走过从开始的17个人（取于1899年在《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上签名的人数，包括列宁和他的爱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甚至包括后来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内）到1917年的20多万人的道路。在我们看来，不通过领导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也不可能走过那条从2018年佳士抗争的百余人到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的数百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道路。

小资产阶级有差不多4.5亿人，占劳动力人口的接近60%。小资产阶级的两重地位和摇摆态度，在它的两个构成部分身上体现得都很明显。小业主们被黑帮专制政府肆意盘剥，比如有卡车个体户被黑帮随意罚款后自杀，又比如“动态清零”政策下小店主们遭遇随意封控而店面纷纷倒闭。小业主们痛恨黑帮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总想保住自己的那份小产业，甚至幻想着发家致富，实现自己从小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甚至黑帮的爬升。小业主支持资本主义也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支持黑帮，特别“爱国”，特别支持武力攻台和全球扩张，以为这些帝国主义政策能改善自己的境况。他们有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对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作为一个阶级最多也只能做到中立。非生产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小业主有类似的两面性，这在上面的理论分析中已经进行了说明。浪漫主义者想把银行职员、房地产中介、教师、专家、医生、演员这样的人组织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我们没有忘记，这些阶层在十月革命后，如何通过怠工等方式几乎毁灭了苏维埃政权。或许他们会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驱使下同工人政权合作，形成类似“路标转换派”的集团。我们应该像列宁那样接受他们的合作意向，也应该像列宁那样把他们看作小资产阶级集团，并对其反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政治防备，而不是像浪漫主义者那样说什么这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在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后，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 “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列宁全集》第三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我们同样要说：我们初步论证了小资产阶级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而浪漫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为了让工人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就不得不把非生产劳动者的一部分以致全部划进工人阶级的范畴，然后欣喜于“工人阶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已接近80%。浪漫主义者不但在判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上搞错了，而且即使在生产关系标准下也搞错了；不但不理解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对工人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有利，而且不理解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工人阶级不仅不需要担心自由派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更要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而言的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但把非生产劳动者硬塞进工人阶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传统、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模糊了阶级界限，把小资产者变成了社会主义者，遮蔽了为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而日益迫切起来的教育和组织任务。

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一样，要社会主义革命却不想经过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但他们理论上比浪漫主义者稍微清醒一些，同时政治上更糊涂一些。之所以说他们理论上比浪漫主义者稍微清醒一些，是因为他们用荒谬的标准，用体力劳动者才是工人阶级这样的语言，大概正确地划分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样做只是漫画式地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传统、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传统，然而毕竟把浪漫主义者拆除的阶级篱笆重新树立了起来。但冒险主义者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却比浪漫主义者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更严重，因为反对全体小资产阶级群众意味着将工人阶级置于劳动力人口多数的对立面上。浪漫主义者以自我欺骗的方式建立了劳动者联盟进行民主革命，而且既然都是“工人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就不存在了。冒险主义者则看不到，劳动者如果能建立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将获得劳动力人口的97.8%，即绝大多数的支持。这个联盟将是不可战胜的。而无产阶级如果不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进行斗争，如果因为没有组织力量和科学纲领而无力进行这种斗争，那么这样的民主革命联盟就建立不起来。反过来，自由派资产阶级将领导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并力求用改良而不是革命方式来进行这一斗争。如果目前这种工人阶级无组织无力量的状况持续下去，自由派将获得59.6%（小资产阶级和私营资产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之和）这一多数的拥护。这个完全可能出现的反动多数同样有能力塑造历史，那时不仅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民主革命也不能彻底完成，旧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将只有形式上的改变而大多实际上得到保留。

我们反对“左”右倾两种机会主义主张，反对冒险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的策略观点。我们主张通过上升型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和必须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没有关系，更不是主张旧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形式变换这一下降型民主革命道路。但我们必须提醒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下降型民主革命的可能完全存在，而且这就是目前我们面对的现实得多的可能。如果要扭转

这种对工人阶级不利的历史趋势，如果要避免普鲁士道路而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

（1）建立工人小组，制定纲领，通过政治报和纲领融合各个主张暴力革命的工人小组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个党实质存在，能够稳定地出版全国性的政治刊物，能够在组织上领导各个委员会和支部以刊物为基础对工人阶级进行全面的政治灌输，初步形成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在这个阶段，可以搁置直接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通过领导彻底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分歧，各个尚未消融于党中的小组分别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不能以策略分歧为借口拒绝建立统一的党。有工人基础的各小组都有资格参与实质建党工作，底线是这个小组接受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必把策略的分歧提到首位。革命而非改良的政治原则，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建党过程中是首要的原则。

（2）在有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作为群众基础（哪怕一开始只有几千人）的秘密党能够稳定运转的情况下，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机构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看两种策略中的哪一个能够获得多数觉悟工人的支持。我们坚信，即使部分觉悟工人一开始不能够理解我们的观点，客观的历史进程会让他们多数转向通过领导彻底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

（3）在比例可能不高、但觉悟和组织程度较高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带领下，工人阶级以劳动者专政为主要口号，从自由派手中夺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以97.8%的人口作为彻底民主革命的力量来源，麻痹占人口2.3%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例如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深刻危机中，武装推翻仅有0.59%人口支持的黑帮专制政府，实现劳动者专政的口号，并力争在这个专政中使无产阶级处于支配地位。

（4）极力壮大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极力促进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并组织其下层半无产者与工人阶级接近，极力争取多数人口的支持或中立，尽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要敢于对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政治军事反抗进行暴力镇压，并避免对小资产阶级多数群众采取强制措施的冒险主义倾向，同时也要继续拒绝将小资产阶级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摇性当作“社会主义”要求的浪漫主义倾向。

（5）在各个阶段，对工人群众都应既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又进行民主主义的教育。在将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放在首位，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和组织独立性的同时，须竭力对无产阶级进行仇恨专制政府的民主主义影响。

五、《列宁道路》的看法在2022年11月民主运动中受到的检验

先来看看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看法所受到的检验。我们认为并不存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其斗争是自发民主主义性质的。以影响最大的富士康工人斗争为例。这场斗争的突出优点是工人用武力击退了警察的镇压，缺点则是其防御性、自发性、无组织性和不可持续性。防御性表现在工人阶级没有提出进攻性的要求，而是限于要求资方兑现返费的经济承诺。这丝毫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微小调整。这种调整甚至都没有提出制度要求，而是围绕着一次性的经济承诺来展开的。这样的斗争，即使是自觉的、有组织的、持续不断的，也只能看作是民主主义性质的斗争，甚至是较初步的民主主义的斗争，更何况还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未能持续的。斗争的自发性表现在，没有任何革命派别在富士康组织工人小组，没有向小组内的工人提供刊物来进行社会主

义和民主主义的宣传，更没有向小组外的工人提供传单和小册子来进行斗争的鼓动。这场斗争是工人自己发起进行的。这场斗争也没有产生组织上的结果，因为它不是政治组织推动的，所以也没有使政治组织通过斗争而扩大和加强，没有对那个从目前几乎是零到数百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过程做出贡献。斗争结束后，黑帮专制政府对一些参与的工人进行了迫害。由于斗争的自发性、无组织性，所以没有营救和帮助遭到报复的工人的行动。这场斗争在形式上是比较激烈的，参与者是产业工人，但这丝毫不能证明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质，丝毫不能说明已经形成和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这只是说明了，工人阶级不仅缺乏社会主义意识，而且缺乏民主主义意识。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仅要帮助工人阶级形成社会主义的觉悟，而且要帮助工人形成革命民主主义意识，帮助工人提出更广泛、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作为工人实际上提出社会主义要求的训练和准备。这证明了《今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意识都在不断增强”不过是崇拜自发性的自我安慰，而《列宁道路》提出的通过工人小组、政治报刊、实质建党、工业化全面灌输去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和民主主义意识的呼吁符合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

再来看看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看法所受到的检验。小资产阶级在11月民主运动中，发起了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北京亮马河两地为代表、遍布全国多个城市的市民、学生抗议行动。小资产阶级抗议行动的形式远不如富士康工人斗争激烈，但其要求却表现了比富士康工人斗争更激进的内容。多数小资产阶级要求停止“动态清零”的黑帮政策，要求民主主义的改良；还有少数小资产阶级提出了打倒黑帮、独裁者下台的口号，要求民主主义的革命。即使是停止“动态清零”政策的要求，也是政策性要求，比富士康工人提出的兑现一次性经济承诺的要求要更高，更不用说打倒黑帮、独裁者下台这样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了。我们没有观察到非生产劳动者，比如医生、教师等，像富士康工人那样采取暴力反抗的方式，也没有听说他们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化、医疗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样的社会主义要求。小资产阶级市民运动的要求表现了民主主义的性质，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证明了《今朝》关于小资产阶级“不再是民主派，而是社会主义派”的看法不符合实际，而《列宁道路》对小资产阶级有民主主义革命潜力、需要开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来领导的看法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看看我们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所受到的检验。我们认为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目前实际上掌握在这个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个阶级的代表在四通桥上的行动使得自由派的纲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广泛响应。甚至四通桥抗议者自身都是经济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这也表现了自由派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自由派的纲领是一个改良纲领，主张不要独裁者、但可以保留黑帮党。由于这个纲领的改良性质和自由派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民主革命走下降路线、走与黑帮妥协的路线是完全可能的。小资产阶级没有响应工人阶级的纲领和号召，是因为工人阶级目前无组织、无纲领、无号召。而且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方式激烈，但其内容甚至低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起不到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需要有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需要有组织起来的觉悟力量，才能把实际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夺取过来，推动民主运动走向彻底民主革命的结果，并以此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今朝》说《列宁道路》“只会用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幻想来麻痹无产阶级”，现实是资产阶级不仅参加着民主革命，而且领导着民主革命，拉着民主革命往下降路线走。只有承认通过彻底民主革命的中间步骤才能把现存的民主运动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今朝》所忧虑的自由派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可能性。

最后看看革命的对象黑帮。黑帮无疑在11月民主运动中遭到了打击。他们一方面部分满足了富士康工人的要求，另一方面被迫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从一些黑帮成员都没有得到通常给予的医疗照顾的情况来看，特色专制政府明显没有做好政策转向的准备，这说明他们是在11月民主运动的压力下仓促行事的。黑帮之所以如此畏惧，是因为在群众基础广泛的民主运动中，他们极端孤立。就连一些沾染了沙文主义的粉“红”色小资产阶级都声称他们不再爱国了。黑帮造成了民主运动中自己成为孤家寡人的局面，这是客观的局面。想在这种局面中避免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主观的愿望。

通过领导彻底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由2022年11月民主运动的整体图景进行了初步的检验。从零起步造就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力量，要依靠彻底民主主义的斗争训练。利用客观的阶级结构让工人阶级拥有占劳动力人口97.8%的压倒性多数的支持，要依靠劳动者专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纲领。在今日中国，只有先进阶层率领工人阶级去领导彻底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才能走向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

附录 阶级结构估计的办法

基本思路是把A3的全国七大类职业划分为四大阶级，其中：

（1）单位负责人：全部属于黑帮或私营资产阶级。

（2）专业技术人员：全部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非生产劳动者。

（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全部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非生产劳动者。

（4）商业、服务业人员：主要利用A2的行业数据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劳动者）、小资产阶级（非生产劳动者和小业主）、私营资产阶级。

（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主要利用A4的身份构成数据进行划分，雇员属于农业工人，自营劳动者及其家庭帮工属于小业主，雇主属于私营资产阶级。

（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全部属于工人阶级。

（7）其他：0.2%：不作归属。

A、主要的统计材料:

1、就业基本情况（《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1》，表1-13）：

劳动力7亿8392万人，就业人员7亿506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口1160万人，登记失业率4.24%，调查失业率5.2%。

2、分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1》，表1-20）：

共19个行业，就业人数1亿7039.1万人。标注的生产性行业和非生产性行业是我们为了后面的计算方便而初略加上的。其实还可以在各行业里进一步细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子行业，为了计算的简便我们没有这样做。行业细分的数据可以在表4-3中找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计算，并不会改变最后的结论。

（1）农林牧渔业：85.7万人（按身份划分的资料里单列了这一项，因此在这里不必进行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划分。就其本身而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经营的部分是生产性的。）

（2）采矿业：352.1万人（生产性行业）

（3）制造业：3805.5万人（生产性行业）

（4）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379.7万人（生产性行业）

（5）建筑业：2153.3万人（生产性行业）

（6）批发零售业：786.9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12.2万人（生产性行业）

（8）住宿餐饮业：256.6万人（生产性行业）

（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87.1万人（半生产性行业，例如生产线编程属于生产性，广播电视则属于非生产性）

（10）金融业：859.0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1）房地产业：525.4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2）租赁和商业服务业：643.6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431.2万人（半生产性行业，例如科学研究远离生产，属于非生产性，专业技术服务有的直接与物质生产相关，属于生产性）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45.6万人（半生产性行业，例如水利业属于农业生产必需的生产性行业，土地管理业则属于非生产性行业）

（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82.8万人（半生产性行业，例如按摩属于非生产性，机动车修理属于生产性）

（16）教育：1958.9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7）卫生和社会工作：1051.9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49.5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9）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972.2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3、全国就业人员职业构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1》，表3-8）：

（1）单位负责人：1.8%

（2）专业技术人员：9.5%

（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1.7%

（4）商业、服务业人员：31.7%

（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3.8%

（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21.2%

（7）其他：0.2%

主要指标解释（《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1》，第426页，R11项）：

单位负责人指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及其工作机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具有决策、管理权的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指从事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指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机构中从事行政业务、行政事务、行政执法和仲裁、安全保卫、消防和应急救援等工作的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指从事商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和快递、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住宿和餐饮以及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技术服务、生态保护、文化、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的人员。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及辅助生产的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指从事生产及设备制造，矿产开采，工程施工和运输设备操作的人员及有关人员。（在《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7》第374页上，这一指标解释除表述略有不同外，还有如下内容：包括工段长和各种生产工人、设备操作工人、司机、船员、其他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4、全国就业人员身份构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1》，表3-8）：

（1）雇员：61.5%

（2）雇主：2.1%

（3）自营劳动者：34.9%

（4）家庭帮工：1.6%

B、对工人阶级的估计

1、鉴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是无争议的工人阶级，且按2017年标准仅统计了工段长及以下的人员，我们将A3（6）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所占就业人口的21.2%全部计入工人阶级的范围。

2、鉴于农林牧渔产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们取A4（1）的比例，即雇员占61.5%的比例，认为A3（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向工人阶级提供了占总就业人口23.8%×61.5%=14.6%的成员。

3、鉴于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既包含了生产劳动行业，也包含了非生产劳动行业，需要按照行业来对该职业进行划分。统计局没有提供全部就业人口按行业划分的资料（其实这是估计工人阶级规模最好的途径，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是利用类似资料进行估计的），只提供了A2分行业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数资料。我们只好利用这部分就业人口中相应行业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所占的比例，去代替全国就业人口中相应行业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所占的比例。

我们先来计算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中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比例。据A3中的统计指标解释，商业、服务业人员指从事商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和快递、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住宿和餐饮以及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技术服务、生态保护、文化、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的人员。

据A2分行业数据：（6）批发零售业：786.9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12.2万人（生产性行业）

（8）住宿餐饮业：256.6万人（生产性行业）

（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87.1万人（半生产性行业，例如生产线编程属于生产性，广播电视则属于非生产性）

（10）金融业：859.0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1）房地产业：525.4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2）租赁和商业服务业：643.6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45.6万人（半生产性行业，例如水利业属于农业生产必需的生产性行业，土地管理业则属于非生产性行业）

（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82.8万人（半生产性行业，例如按摩属于非生产性，机动车修理属于生产性）

（16）教育：1958.9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7）卫生和社会工作：1051.9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49.5万人（非生产性行业）

我们将半生产性行业中的一半人口算作生产劳动行业就业人员，那么这些行业中就有生产劳动行业就业人口：（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12.2万人+（8）住宿餐饮业：256.6万人+（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87.1万人×0.5+（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45.6万人×0.5+（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82.8万人×0.5=1476.55万人。

接下来考虑其中还有雇员、老板和小业主的差别。取A4（1）中雇员占61.5%的比例，那么这些行业中共有生产性工人阶级：1476.55万人×61.5%=908.1万人。

以上行业中非生产性行业就业人口为：（6）批发零售业：786.9万人+（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87.1万人×0.5+（10）金融业：859.0万人+（11）房地产业：525.4万人+（12）租赁和商业服务业：643.6万人+（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45.6万人×0.5+（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82.8万人×0.5+（16）教育：1958.9万人+（17）卫生和社会工作：1051.9万人+（18）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149.5万人=6382.95万人。

接下来考虑其中还有雇员、老板和小业主的差别。取A4（1）中雇员占61.5%的比例，那么这些行业中共有非生产性劳动者6382.95万人×61.5%=3925.5万人。

所有这些行业的总就业人口为：生产劳动行业就业人口1476.55万人+非生产性行业就业人口6382.95万人=7859.5万人。

其中：生产劳动者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占比：908.1万人÷7859.5万人=11.6%

非生产劳动者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占比：3925.5万人÷7859.5万人=49.9%

身份构成中的雇员栏目的61.5%即由这两部分共同组成。

最后，我们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计算出来的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比例，去模拟全国总就业人口中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中的这一比例。

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向工人阶级提供的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A3（4）商业、服务业人员：31.7%×11.6%=3.7%

我们顺便计算这一职业中的小资产阶级构成，以便后面利用这一数据。

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向非生产劳动者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提供的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A3（4）商业、服务业人员：31.7%×49.9%=15.8%

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向小业主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提供的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A3（4）商业、服务业人员：31.7%×36.5%=11.6%。[这里的36.5%=A4（3）自营劳动者：34.9%+A（4）家庭帮工：1.6%。家庭帮工的英译为无酬家庭工人，应当多为小业主为节省成本而让亲属充当，可以算作小业主的一部分。]

4、A3中的其它职业，包括（1）单位负责人：1.8%

（2）专业技术人员：9.5%

（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1.7%

（7）其他：0.2%

都没有向工人阶级提供成员。

5、综合以上4项，工人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B1制造业工人21.2%+B2农业工人14.6%+B3商业服务业中的生产性工人3.7%=39.5%。

6、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我们也将之分解为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

我们使用就业人口中二者的比例来模拟失业人口中的这一比例。先计算非生产性劳动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A3（2）专业技术人员：9.5%+A3（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1.7%+A3（4）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的非生产劳动者15.8%=37.0%。

就业人口中工人阶级与非生产劳动者占到就业人口总和的：39.5%+37.0%=76.5%

其中工人阶级占比为：39.5%÷76.5%=51.6%

非生产劳动者占比为：37.0%÷76.5%=48.4%

据A1就业基本情况：

劳动力7亿8392万人，就业人员7亿506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口1160万人，登记失业率4.24%，调查失业率5.2%。

取更真实的调查失业率5.2%，则失业人口为：7亿8392万人×5.2%=4076.4万人。

其中工人阶级的失业人口为：4076.4万人×51.6%=2103.4万人。

非生产劳动者的失业人口为：4076.4万人×48.4%=1973.0万人。

7、就业工人为：7亿5064万人×39.5%=2亿9650.3万人。

工人人数总计：就业工人2亿9650.3万人+失业工人2103.4万人=**3**亿**1753.7**万人。

工人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3亿1753.7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40.5%**。

顺便计算非生产劳动者的总人数和占比。

就业的非生产劳动者：7亿5064万人×非生产性劳动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37.0%=2亿7773.7万人

非生产劳动者总计：就业的非生产劳动者2亿7773.7万人+失业的非生产劳动者1973.0万人=2亿9746.7万人。

非生产劳动者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2亿9746.7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37.9%。

C、对小资产阶级的估计

1、先来估计小业主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

农林牧渔业中的小业主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A3（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3.8%×[A4（3）自营劳动者：34.9%+A4（4）家庭帮工：1.6%]=8.7%，这里我们还是把无酬的家庭帮工作为小业主的亲属计入小业主的人口内。

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的小业主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A3（4）商业、服务业人员：31.7%×[A4（3）自营劳动者：34.9%+A4（4）家庭帮工：1.6%]=11.6%

A3中的其它以下职业不提供小业主人口或忽略不计：（1）单位负责人：1.8%

（2）专业技术人员：9.5%

（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1.7%

（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21.2%

（7）其他：0.2%

小业主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农林牧渔业提供的8.7%+商业、服务业提供的11.6%=20.3%。

小业主的人数为：7亿5064万人×20.3%=1亿5238.0万人。

小业主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1亿5238.0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19.4%。

2、根据B7的计算，非生产劳动者总计：就业的非生产劳动者2亿7773.7万人+失业的非生产劳动者1973.0万人=2亿9746.7万人。

非生产劳动者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2亿9746.7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37.9%。

3、小资产阶级的总人数为：小业主1亿5238.0万人+非生产劳动者2亿9746.7万人=4亿4984.7万人。

小资产阶级占劳动力人口比例为：小业主19.4%+非生产劳动者37.9%=57.3%。

D、对私营资产阶级的估计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在第76页估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时，引用了2010年六普的数据，说明在单位负责人1269万人中，其中企业负责人994万人，体制内负责人275万人。由于书中没有指明具体页码或来源于哪个表格，我们没能找到这一来源，从而无法使用新的数据。仍旧使用这一旧数据来估计，则：

2009年体制内负责人占单位负责人比例为：体制内负责人275万人÷单位负责人1269万人=21.7%。我们把剩下的78.3%看作是体制内企业中的官僚和一部分私营资产阶级混合在一起的数字。

使用这一比例估计2020年体制内非企业官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A3（1）单位负责人占比1.8%×体制内负责人占单位负责人比例21.7%=0.39%。

剩下的单位负责人包括体制内企业中的官僚和一部分私营资产阶级，占就业人口比例为：A3（1）单位负责人占比1.8%×剩余78.3%=1.41%。

A3（4）商业、服务业和A3（5）农林牧渔水利业还提供了另一部分私营资产阶级，占就业人口比例为：A3（4）商业、服务业人员：31.7%×A4（2）雇主：2.1%+A3（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3.8%×A4（2）雇主：2.1%=1.17%

公私企业合计的负责人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1.41%+1.17%=2.58%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第77页估计体制内企业官僚人数为私营资本家的10%。我们仍然采用这一估计，则体制内企业中官僚人数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为：2.58%÷11=0.23%。

私营资本家占就业人口比重为：2.58%÷11×10=2.35%。

私营资本家人数为：A1就业人员7亿5064万人×私营资本家占就业人口比重2.35%=1764.0万人。

私营资本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私营资本家人数为1764.0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2.3%。

E、对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估计。

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体制内非企业官僚0.39%+体制内企业官僚0.23%=0.62%。

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人数为：A1就业人员7亿5064万人×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就业人口的比例0.62%=465.4万人。

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特色黑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465.4万人÷劳动力7亿8392万人=0.59%。

F、以上四项总和为100.69%，不是100%，原因有二：一是未采用登记失业率，而采用了更真实的、高出一个百分点的调查失业率；二是有0.2%的就业人口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没有进行分类。（全文完）

【今朝特刊|理论争鸣】不参加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吗？——回应《列宁道路》（一）

目录

（一）《列宁道路》的定义 1
（二）《列宁道路》的测算 1
（三）《列宁道路》的问题 2
（四）马克思的论述 2
（五）马克思的结论 3

（一）《列宁道路》的定义

《列宁道路》在2023年1月底的文章中对“非生产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这样的论断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和解释。

《列宁道路》明确地写道：“不管是否卑贱，非生产劳动者都属于小资产阶级。”“非生产劳动者应该划进政治经济学上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不能把非生产劳动者看作为整个社会生产了剩余价值的工人。”

为什么呢？

《列宁道路》给出的原因是：“非生产劳动者在雇佣他/她的资本家看来是生产性的，能够带来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她是非生产性的，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依靠别人的劳动生存的，他们消耗而非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作为不生产物质产品、靠工人阶级生产的物质产品过活的非生产劳动者，与雇主一样依靠工人阶级提供的剩余价值生活，而与工人阶级相对立。”

最后，《列宁道路》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劳动力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列宁道路》的认识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不参加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非生产性劳动者，虽然也属于“劳动者”，但却应当划为小资产阶级。如果这样的概括不够充分，还请见谅。

（二）《列宁道路》的测算

基于以上的认识，《列宁道路》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人数进行了估算：“小资产阶级的总人数为：小业主1亿5238.0万人+非生产劳动者2亿9746.7万人=4亿4984.7万人。小资产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小业主19.4%+非生产劳动者37.9%=57.3%。”

《列宁道路》通过一顿操作，认为**中国有大约4.5亿的小资产阶级**，占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57%。换句话说，**全中国每10个劳动力中，就有大约6个小资产阶级**。即便我们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也明白，这样的数字是极端可笑的！

我们知道，上一个认为整个社会的中产阶层的人数在不断扩大、乃至占据社会人口的主体结构、最终走向“人民资本主义”的人，还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伯恩施坦。

（三）《列宁道路》的问题

《列宁道路》为何闹了如此大的一个笑话呢？归根到底是对“雇佣劳动者”的定义不理解所引起的。《列宁道路》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参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凡是不参与直接的物质生产部门，统统不能称之为工人阶级。正因如此，《列宁道路》将大量处于流通领域的无产者、处于服务业的无产者排除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之外。

正如在其“附录 C”中估算的那样，《列宁道路》将“**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许多**农民**等等也同样归属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四）马克思的论述

那么，一个不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雇佣劳动者（比如百货商店的店员），是否属于无产者呢？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明确的阐述，而且是正面的阐述。马克思甚至害怕引起读者的误解，主动强调了这个“矛盾”。

在《资本论》第三卷 第四篇“商业资本”中，马克思写道：

“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别的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因此，购买这种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私人服务，而是为了使预付在这上面的资本自行增殖。第二，因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他的工资，也和一切其他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由他那种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劳动的产物决定的。”【《马恩全集》第二版第 25 卷（上），《资本论》第三卷，第 326 页。】

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商业雇佣工人确实不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马克思主动写了如下文字：

“就商业雇佣工人来说，困难根本不在于说明，他们怎样直接为他们的雇主生产利润，尽管他们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不过是它的转化形式）。……困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马恩全集》第二版第 25 卷（上），《资本论》第三卷，第 327 页。】

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的来源，他说：

“但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从而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之间的差别，必然会在商业工人和产业资本直接雇用的工人之间发生。因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因为他由自己的费用加到商品上的追加价值，不过是原先已有的价值追加，尽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究竟怎样保持和保存他的不变资本的这个价值？）所以，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马恩全集》第二版第 25 卷（上），《资本论》第三卷，第 326 页。】

马克思在该章中反反复复提醒我们：“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并对商品到货币和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马恩全集》第二版第 25 卷（上），《资本论》第三卷，第 332 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商业资本是如何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这一过程我们不在此处详细张贴，读者朋友们可自行阅读该章节，非常精彩。

马克思最终写道：

“正如工人（即产业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马恩全集》第 25 卷（上），《资本论》第三卷，第 328 页。】

“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

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力的一种发挥，一种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之间，不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马恩全集》第二版第 25 卷（上），《资本论》第三卷，第 335 页。】

（五）马克思的结论

最后，我们要提醒读者读一下马克思的最终结论。这一结论十分经典，这不仅仅是马克思对商业雇佣工人的考察，更是将该问题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考察的结果：

“**他（即商业雇佣工人）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一部分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

“只要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需要实现，资本家就会增加这种工人（即商业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的增加，始终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

商业资本分享了产业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商业雇佣工人的意义即帮助了社会总资本节省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

产业雇佣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在生产体系中却往往不能独立实现它。商业雇佣工人（除仓储、运输等以外的多数流通领域的工人）不创造剩余价值，却帮助实现了剩余价值。如果没有产业工人的劳动，就不存在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商业工人的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就不会实现。凝结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就不会转化为货币，那么产业工人也就得不到工资。

也许《列宁道路》可以反驳说，没有商业资本和商业雇佣工人，产业资本也可以自己去售卖呀！这个问题显得有些滑稽。如果产业资本自营商业活动，它也要付出和商业资本等质的一切资本量。问题不过是从“独立的商业资本”那里转移到了“从属于产业资本的商业资本”那里。

因此，【“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不过是资本主义在生产体系的分工问题。】在工厂中拧螺丝、塞礼盒的雇佣工人和在百货超市里打扫卫生、售卖商品的雇佣工人都是雇佣工人。他们仅仅在劳动内容上有区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没有丝毫区别。

而事实就是这样。一个无产者，今天可以进工厂打工，明天也可以受聘在商店里看护商品。在工厂中他可能日结 120 元或月结 3000 余元，在商店里，工资水平也很难有多少变化。难道这个雇佣工人今天是无产者，明天就是小资产阶级了吗？

（六）怎样才能科学地划分阶级？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曾对如何进行阶级划分有过总结性的概括：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第二版 第 37 卷，《伟大的创举》，第 13 页。】

进行阶级划分一般有三个标准：

第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也即人与生产资料之间是否存在所有/占有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所有制”的问题；

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即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是否存在支配或部分支配他人进行劳动的权力；

第三是人与劳动成果的关系，取得归自己支配的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也即是以劳动获取收入还是依靠资本的所有权获取收入，获取的收入额度大致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相仿佛还是远远超出其劳动力价值。

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即：“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一定社会经济

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此，按照是否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其他简单的标准进行阶级划分是非常肤浅和错误的。

【今朝特刊|理论争鸣】 小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回应《列宁道路》（二）

一、基本态度

我们没有想到，在《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一文中，关于当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可以争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表述，会引起《列宁道路》如此嘲讽。

《列宁道路》幻想着在中国当下进行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国政治的一党专制的现状，达到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或者说“**形式民主**”的结果，以此来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更广泛、更充分的发展。如此，争取小资产阶级自然是《列宁道路》的基本方针。不仅如此，《列宁道路》还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人数“**人为地**”提升到了 4 亿 5 千万之多，占到劳动者总人数的 57%。在《列宁道路》看来，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在绝对数量上反而成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主力军，而“工人阶级”在绝对数量上同小资产阶级相比，还处于下风。

既然如此，又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

与《列宁道路》的认识相反，我们坚持认为，未来的革命方向必然是，而且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而且只能要争取社会主义革命。

站在这样的基本立场上，革命的主力军始终是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潮流的从属的组成部分。虽然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主力军，不能决定革命的性质，不能左右革命的任务或目标，也不能决定革命的成败。但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越来越不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无法固守他们原有的生产条件，而要不断地被抛入到或即将被抛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作为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应当积极争取小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使之参与到革命的洪流中来，成为助推革命前进的一个积极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及其政治立场的变化做科学的分析，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选择。

小资产阶级究竟有多少可以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一要看该阶级（或者该阶级的一部分）在当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具体的现实情况；二要看革命者针对该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所做的具体工作。

但无论如何，分化，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的必然结果。一部分走向反革命的右翼，一部分走向支持或部分支持革命的左翼或泛左翼，将成为历史洪流的一个现象。

下文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一些分析，读者朋友们如有兴趣，请批阅。如无兴趣，我们的态度便如上所述，到此为止了。

二、历史变化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最后到毛主席，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其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认识呈现出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的过程，同时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仍处于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力量仍不断升起。一个工厂中如有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便已经称得上是巨型企业。而大量的、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过是小作坊的小型工厂普遍存在。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上不断地加入进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有很多论述。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把流行的社会主义区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类型，其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被纳入到【反动的社会主义】这一类别当中。

在晚年，恩格斯同样尖锐地指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2]

我们发现，马恩两位对小资产阶级的总体看法仍持负面。唯一的突破口即：只有当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他们才会"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小资产阶级中的下层，也即地位及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对保有自身阶级地位悲观的小资产阶级，才会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他们谋求的不是现在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未来的、可能的利益。

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批评就更加的不遗余力。其核心原因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转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第二国际也逐渐变质，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各色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的观点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此起彼伏。对小资产阶级及其混入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政治观点的批评就十分必要。

在毛主席这里，应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更加炉火纯青。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主席写道：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8)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

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

[1] 《马恩全集》第 4 卷，第 476-477 页。
[2] 《马恩选集》第 4 卷，第 639 页。

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毛主席的结论是：

“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但是，当小资产阶级因为革命的浪潮而不断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看似在数量上、在声势上壮大了。但小资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把其固有的阶级偏见带到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毛主席积极采取了批评和改造的方针，不是把已经加入到延安来的小资产阶级们清除出去，而是通过“延安整风”的活动对小资产阶级加以改造。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可见，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最后到毛主席，革命导师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剖析越来越深入，与此相伴的是革命的大潮也越来越汹涌。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成员“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中来。对这样一批人，采取团结和批评的态度使之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力量应该说是一个正确方针。这和对严重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成员采取敌视和打击的基本立场也并不矛盾。它们都构成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革命运动中采取的具体的策略之一。

三、小资产阶级在当下中国的基本概况

在当下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继续分化着，甚至毋宁说，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直在分化中挣扎。他们和过去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既有相同性，也产生了新的差别。

我们参考《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这本书中关于阶级的划分标准进行阐述。该书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同时推荐给读者朋友们阅读。

表 2.3：中国当前就业人员身份构成[1]

	人数（万人）	比例
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560	0.73%
私营雇主	2,170	2.81%
办事员	7,670	9.94%
专业技术人员	7,700	9.97%
个体工商户	12,900	16.71%
自耕农	21,300	27.59%
产业工人	16,200	20.98%
商业服务业员工	8,700	11.27%
合计	77,200[2]	100.0%

[3]

[3]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第 80 页。

根据该书的作者所收集的大约 2016-2019 年的数据，中国社会就业人口中按“职业”划分的成色如上表。

基于上述职业划分的数据，该书作者进一步对阶级成分进行了划分：

表 2.4：中国各阶级概览[1]

	阶级	人数（万人）	比例
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560	0.73%
私营雇主	私人资产阶级	2,170	2.81%
自耕农	小资产阶级	21,300	27.59%
个体工商户		12,900	16.71%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		1,150	1.49%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脑力无产阶级	6,550	8.49%
体制外办事员		6,970	9.03%
产业工人	体力无产阶级	16,200	20.98%
商业服务业员工		8,700	11.27%
体制内办事员	-	700	0.91%
合计		77,200	100.0%

[4]

根据 2022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劳动力构成大致保持平衡。

项 目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劳动力 （万人）	79042	78653	78985	78392	78024
就业人员 （万人）	76058	75782	75447	75064	74652
第一产业	20295	19515	18652	17715	17072
第二产业	21762	21356	21234	21543	21712
第三产业	34001	34911	35561	35806	35868

[5]

在就业人口的数量上，只有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总量从大约 2 亿下降到 1.7 亿，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 3.4 亿增加到 3.58 亿。其余关于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有限公司就业人数等等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继续沿用该书的数据仍具有合理性。个别不同的数据笔者会在文中补充进来。

按照该书的划分，小资产阶级由四个部分组成：自耕农、个体工商户、较高级的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其中，自耕农部分大多属于经历过进城务工，最终由于年龄问题回到乡村职业务农的中老年人。这部分成员收入极低，乃至于低于一般无产阶级。其数量在不断减少，在未来可能成为一个消失的职业。这批自耕农掌握着少量的农业劳动工具，据有部分农田，按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看似乎可以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然而其所获得的收入、其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与深度参与市场经济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相差异巨大。因此，是否将自耕农划入典型意义的小资产阶级仍待考量。笔者倾向于划归为半无产者。

个体工商户部分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根据最新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达到 1.54 亿户，同比增长 11.1%，其中，企业 4842.3 万户，个体工商户 1.03 亿户。根据调查显示，个体工商户平均从业人数为 2.68 人，以此推算，全国个体工商户解决了我国 2.76 亿人的就业。（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即，统计意义上的个体工商户共有 2.76 亿人。在上述数据中，还有大量外卖员被迫进行了个体工商户的注册，以及有大量因生产关系变化而离开该生产条件的死户。因此，实际的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应当低于该数据。

其中，农村个体工商户的平均收入水平与一般工人相仿佛，城市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水平则略高

4 同上。

5 《中国统计年鉴》2022 年版。

于城市平均收入。

当前的个体工商户想要在中国垄断资本的经济环境下生存，除了依靠惊人的“自我剥削”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也许他们中的个别可以鲤鱼跃龙门，成为一个小资本家，而大多数不可避免的要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毋宁说，相当多的个体工商户本来就一直在“打工”和“个体经营”的状态中来回交替。中下层小业主的社会地位，收入和社会地位已经很接近无产阶级了，可以将其归为半无产者；只有上层的小业主，才是市场经济下的典型小资产阶级。

第三部分是高级技术人员。虽然这些技术人员不像资本家那样掌握着生产资料，乃至自己也要成为雇佣劳动者；同时，他们也不作为管理人员出现，不具有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但是，他们在实际的社会生产体系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如副主任医师以上而不具有医院管理权的医生，也能够通过开药拿回扣，也能够每年拿科室的分红），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越了一般无产者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议价权和选择权也更大。因此，将之划归于无产阶级显然不合适，划归为小资产阶级比较妥当。

第四部分是中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者虽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然而，他们也是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一个环节。他们不所有却部分占有（或辅助占有）着生产资料，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生产组织中，具有部分的支配其他人劳动的权力；在收入上，他们也高于一般工人的水平。因此属于小资产阶级。与之相比，中高层到高层则毫无疑问属于资产阶级的行列。

基于上述判断，在剔除了自耕农之外，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大约为 1.4 亿人，占总劳动人口的 18%左右。而无产阶级+自耕农占比为 78%左右。

以上均为估算，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更欢迎大家对当前社会中国各阶级成分的划分做出更多贡献。

由以上情况分析可见，小资产阶级在当前社会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固。如果说在毛主席的时代，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部分还是“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那么，当前社会中，经济条件每况愈下，“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的成员则更是大大扩充起来，成为小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部分。这批小资产阶级在经济条件上处于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在人数上处于多数。他们无法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环境下实现多少剩余，更不用说扩大资本以晋升为可以进行雇佣劳动的小资本家了。他们对社会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同无产阶级的不满在不断地接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在不断地扩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说，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不少方面都具有重合性。

说小资产阶级全体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是不正确的，但说他们的下层，那些生活境遇越来越糟糕，乃至几乎已经不能维持其个体的经营状态的小资产阶级们，他们转入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可能的。这与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走向反革命丝毫不冲突。

小资产阶级在分化。这个“分化”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化，不是列宁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化，而是在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金融资本统治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不断吸血、垄断压制着局外资本和小资本的条件下的分化。分化，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蕴含着小资产阶级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

四、总结

小资产阶级是否会转向支持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话题，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讨论，那将毫无意义。我们认为，小资产阶级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其不断分化出来的下层具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也将改造他们的经济地位：不是把他们推入更加落魄

的深渊，因为他们已经很落魄，落魄到其经济条件已十分接近无产者；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不必如今日这般辛劳和漂泊的劳动者。

然而则一切都仅仅是“可能性”，它还不具备转入“现实性”的条件。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这样的条件必然反映到其对待革命的认识和立场上来，这是该阶级在革命问题上消极的成分。该阶级的下层乃至中下层是否会真正的转入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既取决于其客观的经济地位，也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但无论如何，小资产阶级并不构成革命的主力军，而是可能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才是决定革命成败的根本因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本身却不仅仅会实现阶级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过程将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因此，为了推动革命的进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今朝特刊|理论争鸣】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回应《列宁道路》（三）

（一）《列宁道路》的问题 1
（二）马克思是如何下定义的 1
（三）马克思对非生产劳动的分析 2
（四）《列宁道路》的错误 3
（五）结论 5

（一）《列宁道路》的问题

《列宁道路》之所以产生这种混乱的认识，除了对马列主义进行幻想式的曲解之外，还在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读。

《列宁道路》将劳动者按照“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了区分，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和“不生产只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列宁道路》就在这里犯了错误，他将“生产性劳动”等同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而把其他“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

《列宁道路》原文便是如此：“作为不**生产物质产品**、靠工人阶级生产的**物质产品**过活的非生产劳动者，与雇主一样依靠工人阶级**提供的剩余价值**生活，而与工人阶级相对立”。

请问《列宁道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非生产性劳动”吗？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吗？“生产劳动”的概念仅仅包含在物质生产部门内吗？

还是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如何下定义的。

（二）马克思是如何下定义的

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这一章中的第三、四小节“（3）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的二重性。对问题的**第一种解释**：把生产劳动看成同资本交换的劳动”、“（4）斯密对问题的**第二种解释**：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中，马克思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两种解释进行了评述。

马克思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斯密对于生产劳动所阐述的**第二种见解即错误的见解**，同**正确的见解完全交错在一起，**以致这两种见解在同一段文字中接连交替出现。”斯密的第二种见解是错误的，也即对“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而第一种见解则是正确的，即：“把生产劳动看成同资本交换的劳动”。

马克思评述道：“他（即亚当·斯密）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生产劳动”是什么？

答曰：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

只有通过这种“交换”，也即劳动力商品的买卖，“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一句话，“生产

劳动”是可以为资本家带来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其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因为“资本增殖”的结果发生了，所以，这样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同时，如果“资本的增殖”没有发生，则即便是产业工人的雇佣劳动，也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举例道：“如果一个工作日只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是说，只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那末，**绝对地说，这一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再生产即不断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这个价值额等于它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从资本主义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当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时，他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当他的劳动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只创造了劳动力价值的部分，比如说这个工人以磨洋工的形式进行劳动，那么，他的劳动对资本主义来说便不是生产劳动。

可见，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把握是站在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进行定义的，也即站在“资本增殖”的角度上进行定义的。

“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生产劳动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它要与可变资本相交换，换句话说，它要通过劳动力的买卖的形式进行劳动，也即，它是雇佣劳动；第二，它要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的增殖。

这个时候，《列宁道路》大概是要跳出来说道：你看吧，马克思说了，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那些不生产剩余价值而仅仅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了。

请这位朋友慢些，不要着急，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么用他的原文回答的。我们就以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为抓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 第四章中写道：

“对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润和这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对商业资本来说，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劳动**。”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不是指狭义的、生产领域内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的劳动，而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为资本家实现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

正因如此，和“生产劳动”对立的“非生产劳动”不是“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什么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是“不能实现资本增殖的劳动”。产业工人在产业资本家的领导下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增殖；商业雇佣工人不生产剩余价值，但在商业资本家的支配下实现了商业资本的资本增殖；银行业店员不从事物质生产部门，在银行家的控制下服务于生息资本的增殖。对于这些资本家而言，他们所雇佣的工人、他们所购买到的劳动力商品，都服务于他们各自资本的增殖，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些雇佣工人的劳动均属于“生产劳动”。在这里，生产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同义词。

（三）马克思对非生产劳动的分析

马克思给“非生产劳动”同样下了精确的定义：

“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动）。”

马克思乃至害怕读者们看不懂，特地举出个例子附在后面，供大家以具象的思维去理解，马克思写道：

“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

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

在这里，一个被剧院老板雇佣的丑角，显然不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不是从事使用价值的创造的。他只是一个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在《列宁道路》那里，“作为不生产物质产品、靠工人阶级生产的物质产品过活的非生产劳动者，与雇主一样依靠工人阶级提供的剩余价值生活，而与工人阶级相对立”（《列宁道路》原文），但为何马克思却称这位演员为“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呢？因为这位演员是被剧院老板雇佣的，他是作为一个雇佣劳动者而存在，他被剧院老板剥削，并服务于剧院老板的资本增殖活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下，他从事着“生产劳动”。

而另一个例子，一个“缝补工”，明明是从事了物质产品的生产，即通过“缝补”的劳动，为实际的、物质的产品——裤子——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因为缝补活动作为一种消费资料的维修活动，裤子这种产品的使用年限被延长了，使用价值增加了）。

但是这样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劳动，却不被马克思视为“生产劳动”，反而是一种“非生产劳动”呢？

因为，这种劳动对于该接受其服务的资本家来说，仅仅获得了一种新的使用价值，而不作为价值以积累起来。换句话说，这个接受裤子缝补的资本家仅仅享受到了一种服务，而不是把该缝补工人作为剥削对象从其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个缝补工的劳动能力不属于这个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为这个资本家实现资本增殖。

因此，“生产劳动”必须在“雇佣关系”下进行把握，而不能从其劳动形式上（工厂拧螺丝还是看护百货店货架上的商品）进行区分。

为此，马克思又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马克思故意使用这些不在产业工人行列里的其他劳动者进行举例，偏偏就要用这些不是进行“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的例子进行举例，就是为了驳斥那些不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把握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在具象的表面上肤浅地把握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人。

马克思不断在强调，必须在“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下，来看待“生产劳动”，为资本家进行资本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也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劳动，对于一些人来说可以说“生产劳动”，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又举了一个例子：

“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我这个消费者来说，**即使在饭店里也是非生产劳动者**。"

饭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对于饭店老板来说，他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因为他们的劳动为资本家的资本实现了增殖；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则是非生产劳动，因为这一劳动一经付出就消失了，并没有化为消费者的资本积累下来；同时，消费者在饭店消费也不是为了进行生产，进行资本增殖，而是为了吃饭，为了消费本身。

一项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是“生产劳动”，对于消费者来说却是“非生产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呈现出不同的评价。

（四）《列宁道路》对马克思的误读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中写道：“斯密对于生产劳动所阐述的**第二种见解即错误的见解**，同**正确的见解完全交错在一起。**"

这时，我们要来看看斯密的第二种见解，也即错误的见解是什么呢？

马克思归纳了斯密的错误见解后写道：

“这样，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更确切地说，同上述他的另一种见解交错在一起的见解）可归结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

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

马克思所写的话简直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

斯密认为，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这样的见解，就是马克思开篇便提点到的“**错误见解**"!

马克思明明白白地写道：“**第二种见解即错误的见解**"。

然而，《列宁道路》却堂而皇之的进行引用。其秘密就隐藏在《列宁道路》摘引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这一段话的“**省略号**”里。

《列宁道路》摘引如下:

“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更确切地说，同上述他的另一种见解交错在一起的见解）可归结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只有**这种观点才能使我们既弄清楚真正的雇佣劳动的概念**，又弄清楚‘非生产劳动’的概念，而亚·斯密到处都用生产‘非生产劳动者’所必需的生产费用来给非生产劳动下定义。"

（《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 16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黑体是《列宁道路》所加)”

问题就在这里，《列宁道路》在这个“**省略号**”里究竟隐藏了什么内容呢？

马克思所谓的“**这种观点**”究竟是指哪种观点呢？

是前一段话，即亚当·斯密的**第二种错误见解**，还是“**省略号**"中省略的内容呢？

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的全文是如何写的（由于这一段话较长，所以笔者在这里对每一句话都做了分段)：

“这样，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 （更确切地说，同上述他的另一种见解交错在一起的见解）可归结 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 何商品”的劳动。

斯密不否认，这两种劳动都是商品。

请看前面讲的：“后者的劳动也同前者的劳动一样，有它的价值，理应得到报酬”（就是说，从经济学来看；无论对这种劳动还是那种劳动，都谈不上从道德等等观点来看)。

商品的概念本身包含着劳动体现、物化和实现在自己的产品中的意思。

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作商品，只有劳动能力才能看作商品，劳动本身是劳动能力的暂时表现。

只有这种观点才能使我们既弄清楚真正的雇佣劳动的概念，又弄清楚“非生产劳动”的概念，而亚·斯密到处都用生产“非生产劳动者”所必需的生产费用来给非生产劳动下定义。

由此可见，商品必须看作一种和劳动本身不同的存在。

这样，商品世界就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劳动能力。 另一方面是商品本身**。"

【《马恩全集》第二版第 26 卷 (I),《资本论》第四卷,《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第 163 页。】

斯密“**不否认**”，不否认的是什么呢？

他不否认，不管如何对“劳动”进行分类，“劳动”都是商品。

马克思对斯密的这一有关“劳动”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即不能说“劳动”是一种商品，应该说“劳动力”才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直接强调道：“**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作商品，只有劳动能力才能看作商品，劳动本身是劳动能力的暂时表现。**"

换句话说，马克思在这里对斯密把“劳动”视为一种商品的概念进行了批评。只有把劳动力看作是一个商品，那么，雇佣劳动才能产生。同样，超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的剩余价值，才可以在理论上被发现。

基于此，马克思说道：“只有这种观点才能使我们**既**弄清楚真正的雇佣劳动的概念，**又**弄清楚“非生产劳动”的概念。”

这种观点是指什么观点呢？

是《列宁道路》所引的斯密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也即**错误的见解**；还是马克思在这里对斯密的“劳动是商品”的观点的纠正，也即“**劳动力才是一种商品**”的观点呢？

毫无疑问是后者。

马克思在这里重点是强调斯密对“劳动”和“劳动力”认识的误区，并突出“劳动力是商品”的这一结论。只有这样，才能理清楚“雇佣劳动”的概念，也即为资本家进行资本增殖的劳动的概念，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也即把劳动同收入相交换的概念。（在马克思这里应该纠正为劳动力同收入相交换，斯密的有关“劳动”同资本、同收入的交换在马克思这里都被纠正为“劳动力”同这些因素相交换）

但是，《列宁道路》恰恰把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给隐去了，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让读者误以为，似乎马克思说“**只有这种观点**”是指马克思对斯密的第二种错误见解的一种肯定，似乎马克思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才是生产性劳动者”！

《列宁道路》的问题便在此处：

其一，《列宁道路》误以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劳动”专指产业工人或仓储运输工人等从事物质部门生产、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可事实上，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劳动”是指与资本的可变部分相交换的劳动，也即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劳动”常常和“雇佣劳动”成为“同义语”。

其二，建立在以上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列宁道路》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针对阶级的多维度的、综合的划分方法出发，而是简单地根据是否“从事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的角度出发，只将产业工人等部分工人阶级划入无产阶级行列，而将其他雇佣劳动者（如服务业无产者、体制内外底层的办事员等等）剔除无产阶级的行列，即便他们也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底层劳动者——这一点连《列宁道路》也无法否认。可事实上，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的方法是根据“**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人在劳动组织中的权力**”、“**人获取劳动成果的方式和多寡**”这样的三重维度综合出发，评定一定的集团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阶级关系。《列宁道路》自称为“列宁的道路”，然而却置列宁本人的论述于不顾，自创了阶级划分的标准，并在其自己划分的标准上来看待社会运动的大趋势，焉有不误之理。

（五）结论

马列主义者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必须实事求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对任何概念的把握都是从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条件，科学的概念便不存在。从表面的、肤浅的角度出发，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本质。通过劳动力买卖而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它不一定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可以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等等；它不一定局限在物质生产部门，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内也必然存在。《列宁道路》对生产劳动的错误认识，导致无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商业店员等）划入了小资产阶级的阵营，从而得出了“小资产阶级人多

势众”的假象。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我们相信，《列宁道路》并非是有意歪曲，而是对概念的认识缺乏细致的认识，产生了误解，以至于在误解的基础上越走越远。但是，只要把科学的概念从混乱的表象中梳理清晰，客观世界的变化便不会成为一种未知。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TG 频道《今朝》：https://t.me/MLMismRevolutionary，加入我们的 TG 读者群 https://t.me/+G-VKERmOA4IxMzRk，一起跟踪最新文章，研判阶级动态。

【今朝特刊 | 理论争鸣】如何判定革命性质以及中国革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回应《列宁道路》(4)

当代中国革命的方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诸多派别中，《列宁道路》是鼓吹民主革命论的先锋，它提出以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作为判断革命性质的首要标准，而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很低，因此只能先搞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论在革命性质的一般判定准则方面，还是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特殊判定结果上，《列宁道路》的主张都是大错特错的。

一、列宁道路是如何认识革命性质的？

在 2023 年 2 月的文章《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1]，《列宁道路》认为革命性质有客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主观（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两种判断标准，而由于“革命是由革命阶级直接完成的，而革命阶级在同样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因此，在判定革命性质方面，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这一主观标准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我们把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作为首位的判断标准，**认为当无产阶级尚未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哪怕客观上已经有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而当无产阶级（包括贫雇农）已经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即使生产力并不发达，即使雇佣劳动关系并没有充分发展，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进一步证明主观标准的优先性，《列宁道路》以俄国革命和 1918 年德国革命举例，关于德国革命：

“列宁认为德国是当时的第二号帝国主义国家，和今天特色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当。但是列宁并不因此就做出德国革命一定是社会主义性质……德国革命后来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线。这当然不是因为德国的帝国主义不够发达，不是因为德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

从主观条件优先决定革命性质这一原则出发，《列宁道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先进无产阶级阶层，不存在拥有几万乃至数十万工人党员的政党。因此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德国革命后来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线……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中国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加以说明，但跟当时德国“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情况相比，自然是远远不如的。这种情况下的中国革命，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不可能。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只是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生产力基础，但不会自动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力量提供出来。”

二、一般判定准则：革命任务而非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

到底是革命任务（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决定革命性质，还是革命动力

（革命的参与阶级）决定性质，这是一度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问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下一阶段的革命性质到底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已经退出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类比 1917 年 2 月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种观点争论不休，且争论很快从“中国革命性质”的特殊问题，上升到“革命性质判断标准”的一般问题：到底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还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这场争论在中共“六大”前夕达到了高峰，周恩来曾回忆道：“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2]

1928 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经过了激烈讨论后，“六大”在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做出了正确判断：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发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六大”决议首次提出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确立了革命性质的一般判定准则[3]。虽然在其它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缺点，但“六大”关于革命性质的这些结论，为混乱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正确方向。

之所以不优先以革命动力来判定革命性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社会各个阶级（革命动力）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是受革命任务制约的。比如，中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及共产党，但在农业合作化阶段则会犹豫摇摆。这是因为前一阶段的任务是打倒三座大山，消灭地主和封建土地制度，而后一阶段的任务则是消灭私有制。这些任务是以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产生的，而不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革命任务是更深刻、更本质的存在。即使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很高，也不可能改变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的任务，因此不可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2）相同的革命阶级（革命动力）可能参与甚至领导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无产阶级既可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如俄国十月革命），也可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单凭革命动力是无法准确判断革命性质的。

关于革命性质问题，周恩来在 1944 年研究总结“六大”时再次强调；“**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2]。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列宁道路》把党史中的结论推倒重来，重提革命动力作为决定革命性质的首要标准，得到的只会是极其错误而混乱的观点。

三、《列宁道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革命性质？

关于革命性质的判定标准：

“我们把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作为首位的判断标准，认为当无产阶级尚未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哪怕客观上已经有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列宁道路》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的国家，当无产阶级尚未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条件），如果爆发了革命（条件），无产阶级自然无法获取领导权，从而这场革命也就不能越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界限，因此，**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论）。**在这里，发生民主革命是有条件的。**

继续往前走时，《列宁道路》就开始在逻辑上混乱了：在这些国家（包括新时代中国），由于当下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普遍还不够高，所以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里，民主革命成为必然的阶段。**

《列宁道路》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把“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偷换为“经历民主革命阶段”的必然性。

当《列宁道路》还在正常论述时，“发生一场民主革命”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革命发生”且“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同时满足的情况下；但当《列宁道路》开始胡言乱语时，就把这些条件抽走，“民主革命”突然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了。

“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两个条件是否会同时存在呢？**在当前阶段**，只存在“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的条件，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的国家而言，并不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谈不上当前“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事情。

在未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随着现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崩离析，许多国家将会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发生”的条件具备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很低”的条件存在吗？我们只能回答说：“有可能！”如果马列毛主义者没能实现和工人阶级的有效结合，如果没能形成工人阶级的成熟先锋队，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积累起丰富的斗争经验，那么它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是不足以领导一场革命的，革命将越不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从而仅仅成为“民主革命”。但是，如果马列毛主义者在从当下到革命前夕进行了积极且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果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经验，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那么发生的革命极有可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从而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列宁道路》看不到得出结论（“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经过自觉的和艰苦的工作之后，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大大提升），它默认“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很低”会一直持续到革命前夕，从而得出了“必然经历民主革命阶段”这一荒唐的结论。

我们顺着《列宁道路》前半部分的合理逻辑出发，得出的正确推论应该是：为了避免革命沦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把革命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无产阶级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觉悟和组织程度（马列毛主义者应努力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当中去），从而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将这场社会革命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水平，并争取胜利！

2）混淆“革命性质”的两种不同用法。

马列毛主义者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判定革命性质：（1）革命任务是什么；（2）先进阶级在某场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怎么样。

我们从矛盾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个问题。把某个国家看作一个具体的事物，这个事物的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比如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产阶级，次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因此我国是资产阶级国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又分成了两大集团，一个是组织严密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和某些大型垄断民企），他们占据绝对优势，在经济上控制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在政治独占政权；另一个是组织松散的民营资本（绝大多数中小民企），他们在官僚集团的庇佑下，放弃政治权力，享有合法剥削工人的经济权力。因此，我国不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还是一个一党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解决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为了促使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转化，无产阶级的使命和任务便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公有制，由此

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的革命性质，是从“革命任务是什么的”这一必然性角度去谈论的，也即革命任务一天没有实现，主要矛盾一天没有解决，革命就会必然在不远的未来再次发生。**

在现实的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究竟在革命任务方面完成得怎么样，却会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在以劳资矛盾为主的多组矛盾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剧烈，最终爆发一场或多场革命。就其中的某一场革命来说，至少有两种现实的可能性。第一种是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种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还不够，因此被冲击的资产阶级（包括官僚集团和民营资本）抛弃了曾经庇佑他们的官僚集团，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

上述两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称为革命，在客观结果方面，第一种革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任务，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而第二种革命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因此，前一种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后一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里的革命性质，不是从“革命任务是什么”，而是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谈论的。就这点而言，两种不同的革命性质都是现实可能的。**

尽管都是现实可能的，但这两种革命性质同必然的革命任务之间的关系却截然不同。（1）第一种革命，即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这种革命代表着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无产阶级）转化为了主要方面，而原来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转化为了次要方面。因此，这种革命伴随着原有事物的“质的变化”。并且，这种革命还意味着，矛盾双方中代表着新生事物、因此也代表着历史必然性的那一方（无产阶级）获得了胜利。随着这种胜利的到来，旧有的事物（资产阶级国家）被扬弃了，新的事物（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2）第二种革命，即一党专政被推翻，但却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这种革命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资产阶级，次要方面仍然是无产阶级，双方没有发生转化，因此事物的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处于从属地位的民营资本，现在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国家体制从一党专政变成了民主体制。但是，这样的革命并没有结束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通过革命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也并不是代表历史必然性的无产阶级。于是，事物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但却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即从一党专政变成了民主体制，

一个是必然的，一个仅仅是可能的。第一种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革命，这种必然性是由革命任务的必然性、由主要矛盾的双方所决定的。革命任务一天不解决、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一天不转化为主要方面，这个革命就必然会在将来的某天发生。第二种革命仅仅是可能的，它的发生并没有解决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这种革命（此处的民主革命）是一个大的、必然会发生的革命历程（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中，诸多小的、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革命历程。

因此，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这一角度出发，在同一场革命存在着诸多现实可能性，只而有同革命任务的客观内容一致的现实可能性才是必然的，而其它的仅仅是可能的。

马列毛主义者主要就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判定革命性质：1）对某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进行总结，从而判定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性质。即从必然性的角度，从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的角度，判断革命性质；2）对某次革命中各阶级尤其是先进阶级在革命任务方面的实际表现进行总结，也即从现实性的角度（现实性在革命爆发的前夜体现为现

实的可能性）角度，从某一次革命发生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质的变化的角度，来判断某次革命的性质。

就必然性、即“革命任务是什么”而言，革命性质由一整段历史时期中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比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的调整、消灭封建制度、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调整、消灭私有制和资本）所决定，它为先进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根据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先进阶级往往无法通过单次革命“一击必杀”，因此，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可能会有多次革命发生，单次革命的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完成革命任务方面的“表现”可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就现实可能性、即“某次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而言，革命性质更多地是对单次革命所能达到的客观水平的事前预估或事后总结。**这次革命中先进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同阶级的力量对比、国际局势等一系列因素，会共同决定本次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并进一步决定本次革命的性质。

我们再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呢？**是根据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来确定是否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吗？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依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革命：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几次革命中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呢？**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总体上失败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获得了成功。但由于这几次革命所致力解决的问题没有越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们达到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所以这几次革命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0 世纪的德国革命也是如此。步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德国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是什么呢？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从 20 世纪的革命结果来看，既然垄断程度更低、小生产势力更为强大、封建残余更多、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比重更小的俄国都能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德国自然也存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厚物质基础）！因此，**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便是推翻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0 世纪初期德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1918 年，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任务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呢？**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还很缺乏，没有形成自己强有力的先锋队，没能真正提出社会主义变革的主张和任务，仅仅推翻了君主政权，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这次革命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因此，**1918 年德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它仅仅达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但这次革命的性质（任务的完成情况）丝毫不能决定、更不能改变 20 世纪初期的德国革命性质（任务是什么）**

我们花费这么大力气举这么多例子，就是为了说明革命性质的两种不同内涵，既可能从“任务是什么”的角度谈论革命性质（必然性的角度），也可能从“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现实可能性的角度）谈论革命性质。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的国家的革命性质时，究竟是谈论哪种意义的革命性质呢？显然是 “这些国家的革命任务是什么”这一必然性的角度，而不是“某次革命中任务完成情况，是否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水平”这一现实可能性的角度。

《列宁道路》却把两种理解混淆在一起了，当它涉及革命性质时，有时站在“一整段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有些时候却又跳到了“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所谓“主观标准决定性质”，“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等错误论断的逻辑根源基本来源于这种混淆。我们把它的一些观点用

更准确的语言整理出来：

（1） 正确前提：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决定某次革命的任务完成情况（革命性质，现实可能性）

错误结论：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决定一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革命性质，必然性）

（2） 正确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果无产阶级组织程度和觉悟较低，则发生的单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现实可能性）

错误结论：这些国家在当前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必然性）

（3） 正确前提：由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不足，1918 年德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现实可能性）

错误结论：20 世纪帝国主义德国的革命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必然性）

《列宁道路》的论证总体上便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前提和结论都是在谈革命性质，当它论述正确的前提时，是站在“单次革命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出发的（可能性的角度），当它进一步得出推论时，却是从“革命任务是什么”的角度阐述的（必然性的角度）。如果仅从形式逻辑出发，撇开革命性质的具体内涵，前提和结论确实可以实现无缝衔接；但是深入“革命性质”的实质内涵时，看到的便是上面那些毫无逻辑的跳跃和匪夷所思的推断。

四、再论中国革命性质

分析中国革命性质时，《列宁道路》提到：

“跟当时德国“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情况相比，（中国工人阶级）自然是远远不如的。这种情况下的中国革命，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不可能。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只是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生产力基础，但不会自动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力量提供出来。”

《列宁道路》在这里的主要错误，还是混用了革命性质的两种不同内涵，这里不再赘述混淆的问题。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谈谈《列宁道路》逻辑中的内在矛盾。**如果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因此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得两个推论：

1）由于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由于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革命。

从《列宁道路》逻辑中得到的前一推论，取消了它的“民主革命论”；后一推论，取消了马列主义。如果把《列宁道路》的逻辑贯穿到底，就必然得出这上述两个推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道路》的逻辑底色，是把“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这一当前现象当作了静止的本质，当作了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看不到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由低到高发展的必然性。一旦承认了这种必然性，社会革命性质就不能由某一阶段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决定，而是要进一步地追问：在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经过自觉力量的有意识的工作，未来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未来可以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可以领导什么程度的社会变革？一旦这

样提出问题，就再也没有“主观标准决定革命性质”的任何空间了。因为在觉悟和组织程度较高的基础上，在主观上无产阶级既可能仅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 究竟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就需要从这个时代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中去寻找答案。归根结底，正是这一变革的要求决定了革命性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谈得很详细了。[4]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初级，从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基础还能薄弱的国家，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很高，完全有可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体现；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其发达，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帝国主义阶段，从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土壤已经极其深厚的国家，展现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方式，是更加坚决、充分、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而决不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道路》用“民主革命论”把无产阶级往后拽，模糊无产阶级的视线，阻碍无产阶级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五、小结

1、有两种意义上的革命性质：（1）一整段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它由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由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进程，显示着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的整个过程，革命的完成意味着旧事物的“质的变化”。这种革命是必然的，是矛盾双方中代表历史必然性的进步方面从被压迫一方转化为专政的一方。这种意义上的革命性质是由革命任务而非革命动力决定。从“革命任务是什么”的角度出发，帝国主义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迫切要求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更具体的分析见[4]），因此，中国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先进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怎么样。它是由事物的矛盾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在社会动荡中一党专政被民主制代替）。这种革命的发生和进程，显示了事物的多样性的矛盾的相互关系和转化，但这种转化不是必然的而仅仅是可能的。这种革命的完成并不是主要矛盾中代表历史进步的一方（无产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因此这种转化也没有任何历史的必然性，而仅仅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2、民主革命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们混淆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区别，把其中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会造成阶段性质变），变成了唯一的现实可能性，进而将其错误地宣布为必然性（必然经历民主革命阶段），堵住了其他一切现实可能性，麻痹了无产阶级的意思，束缚了自身的手脚，放弃了无产阶级通过日常的斗争积蓄力量进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得出这些错误和有害的结论。《列宁道路》就是如此。他们将“革命任务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性）和 “革命任务完成情况”问题（某种现实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混为一谈，提出以主观因素决定整个历史阶段革命性质的错误判断标准，并以今日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足，幻想把未来的革命降低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水平。《列宁道路》也谈论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但是它指出的是错误的前进方向，这套 “民主革命论”，只会模糊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向，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甚至使得工人阶级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放弃领导权，造成令人惋惜的失败！

3、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绝不意味着即将发生的革命必然地、直接地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就可能性而言，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发生的**单次**革命运动，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既可能是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可能是社会主义革

命。革命最终以哪种具体的路径胜利，是在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时建立社会政权，还是在打倒官僚资产阶级之后经历民主化的阶段后，无产阶级再夺取政权，又或是其它某种在今天无法预估的方式，这些都要以未来具体的政治情势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决定。但无论是哪种路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并不会自发地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产生出来，为了能在革命发生时夺取领导权，为了使革命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并获得胜利，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劳动群众所承受的剥削和压迫之苦，为了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走完社会主义革命历程，马列毛主义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走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在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进行灌输，实现科学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形成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依靠这一自觉组织持续领导工人运动和其它劳动群众的斗争，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积累阶级斗争的经验。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TG 频道《今朝》：https://t.me/MLMismRevolutionary，加入我们的TG读者群 https://t.me/+G-VKERmOA4IxMzRk，一起跟踪最新文章，研判阶级动态。

[1] 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道路，2023.01.
[2]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
[4]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驳《列宁道路》的民主革命论，今朝，2023.01.

【今朝特刊|理论争鸣】如何评价2022年11月的民主运动？——回应《列宁道路》（五）

2022年11月的民主运动本质上处于没有领导者甚至组织者的境地，并非像《列宁道路》所说的是由自由派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无产阶级要获得未来的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恰恰不能像《列宁道路》那样预设“彻底民主革命的中间步骤”来给运动带上紧箍咒，而是要展现彻底的坚决的革命性，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剥夺资产阶级，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实行一切民主改革。

一、列宁道路是如何看待2022年11月的群众运动的？

在2023年2月的文章《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1]，《列宁道路》认为“通过领导彻底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由2022年11月民主运动的整体图景进行了初步的检验”。

《列宁道路》的主要论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富士康工人斗争为代表的工人运动是“丝毫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未能持续的”，说明“工人阶级不仅缺乏社会主义意识，而且缺乏民主主义意识”。其次，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北京亮马河两地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虽然“形式远不如富士康工人斗争激烈，但其要求却表现了比富士康工人斗争更激进的内容”，运动的要求“表现了民主主义的性质，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三，“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目前实际上掌握在这个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一方面因为“四通桥上的行动使得自由派的纲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广泛响应”，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内容甚至低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

在此基础上，《列宁道路》不断强调民主革命阶段的必要性。对于工人阶级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仅要帮助工人阶级形成社会主义的觉悟，而且要帮助工人形成革命民主主义意识，帮助工人提出更广泛、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作为工人实际上提出社会主义要求的训练和准备。”在此基础上，工人阶级需要通过“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和“组织起来的觉悟力量”，“把实际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夺取过来，推动民主运动走向彻底民主革命的结果，并以此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

二、2022年11月的民主运动是自由派资产阶级领导的吗？

2022年11月的民主运动真的如《列宁道路》所说，是由自由派资产阶级领导的吗？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如果运动参与者采用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口号，就可以说这场运动是这个阶级所领导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要真正领导一场运动，不但需要在思想上获得运动参与者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采纳某一口号并不代表完全认同该口号背后的思想），还需要在组织上以某种方式与运动参与者结合起来，不断施加影响、推动运动的展开。当然，这种领导权未必是在运动前就存在的，也可能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再来详细考察2022年11月民主运动的两个典型——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和北京亮马河事件。两场运动的导火索都是新疆乌鲁木齐11月24日发生的火灾。由于封控，该火灾

[1] 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道路，2023.01.

导致了至少十名居民丧生，但当地政府却只字不提封城的问题，反而将火灾归因于居民们不懂如何消防自救。这引发了群众们的大规模不满，新疆乌鲁木齐市民直接奋起抗议，要求解除封锁措施并获得成功。11 月 26 日，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们率先在校内举办了哀悼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的活动，此后悼念和抗议活动席卷全国多个高校、多个城市。

1.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运动最初只是一场较为自发的悼念活动。11 月 26 日晚 9 点前，十几名年轻人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摆放鲜花和香薰蜡烛，播放维吾尔族歌手的歌曲。根据初到现场的抗议者反映，“现场的气氛其实是很宁静，很静谧，然后也比较温馨的”，“现场实际上非常非常安静，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反抗情绪。只是大家在一起”[2]。有一些抗议者表示，“大家聚在一起之后，不知道该干嘛”。

到 27 日凌晨，行动逐渐升级。警察试图通过拉警戒线的方式不让群众进入悼念区，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他们开始通过与警察理论、冲击警戒线等方式尝试加入悼念队伍。抗议的人数也逐渐增加至 200-300 人。一些抗议者开始在现场传阅白纸，也有一些抗议者试探性地喊出“罢核酸”的口号。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人群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相对温和的参与者感觉到现场变得危险，而逐渐离开；而更加激进的参与者留了下来，或加入进来。当然，也有“很多人为了上厕所不得不离开现场，出去以后就进不来了”。[3]

据参与者回忆，大家开始喊口号的时候是 “很戏谑，很松散，甚至有点欢快的这样一个氛围”，一些口号也是集体创造出来的，比如先有人喊了“五四精神”，又有另外的声音喊出了“要‘六四精神’，不要‘五四精神’”，后来口号就变成了“光复六四”。四通桥的标语也被提出。刚开始有人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的时候，有一些抗议者劝说不要喊这句口号，认为这会让警察知道他们了解四通桥事件。但“不要核酸要自由”、“不做奴才做公民”、“不要文革要改革”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都成为呼声很高的口号。而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时候，人群的情绪和声音都是最大的。[2]

尽管如此，据参与者回忆，现场敢于喊口号的人可能只占到 10%至 20%。这也让他感到“比较悲观和比较迷茫”。“哪怕是大家已经聚在一起，属于是比较不明哲保身的这样一个同温层，但是真正的去喊口号的人也没有多少。然后同时在去挑选口号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之间也会产生一些非常微妙的分歧。哪怕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短兵相接的这样一个对峙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出来大家其实是立场非常非常的多元，然后在光谱上面分布的也是很散。”[2]

27 日凌晨四点后，绝大多数参与者离开现场，剩下的抗议者则被警察强力驱散，其中有一些被警察带走。27 日中午，大量群众再次在乌鲁木齐中路聚集，警方封锁该路段后，还有数以千计的群众涌向华山路、长乐路和镇宁路。口号除了 “不自由毋宁死”等，还聚焦于“放人”。一些抗议群众举起了白纸，但也有人举着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3]。随着警察行动的升级，当天的抗议主要演化为警民对峙。警察多次冲散驱赶抗议群众，不断揪人送上大巴，甚至暴打群众。28 日凌晨，警察强制清场，大肆逮捕最后还在现场的群众。28 日上午，一张海报在 Telegram 等平台上广泛流传，号召大家在当晚前往静安寺、人民广场和陆家嘴等地聚集。当晚，大量的警力在这些地点集结，在

[2] EP-027 那些年轻的抗议者：我们为什么要上街（文字版）https://www.bumingbai.net/2022/11/ep-027-china-protestors-text/

[3] 【現場】烏魯木齊中路一夜一日，燎原的火花被點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128-mainland-shanghai-zero-covid-protests/

地铁站对青年人进行手机检查，一旦遭到拒绝或发现安装有 Telegram、Twitter 等软件就直接带走。当晚没有发生实际的抗议或聚集活动，整场运动也就这样结束了。

2. 北京亮马河抗议

11 月 27 日，乌鲁木齐中路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北京亮马河运动开始了。虽然行动前有一些号召（如朋友圈的隐晦提示），但活动依然主要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消息的人们自发地来到现场。行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年轻人，据参与者回忆，当天在现场时间比较长的 80%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4]。他们有学生，也有电影从业者、法律从业者、新闻工作作者、酒吧老板和 DJ 等。根据后来的被抓捕名单来看，女权活动圈子和酒吧 DJ 圈子似乎是参与者中较有组织的两个社群[5]。

刚开始的行动主要采取点蜡烛、唱歌等表达悼念的形式。随着人越来越多，人群临时更改集合地点到亮马河北岸，大家围绕鲜花和蜡烛开始举白纸或写有悼念文字的纸，合唱《国际歌》和《送别》，并开始高呼反对防疫政策、纪念新疆大火逝者、要求释放上海被捕人士的口号。警察在 21 点左右赶到现场，拉起警戒线避免人群聚集，开始驱散人群，并将一些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的抗议者带走。大约到 21 点 50 分，增援警察到场，将现场大约 300 名悼念群众驱散。

警察的行动引起了大家的不满，被驱散的人群沿着亮马河两岸行走，最终在 23 点 30 分在新源街京城大厦重新聚集。此时人群规模已经达到至少 500 人，他们拿着鲜花和白纸，呼喊着“不做核酸”、“少做核酸”，“上海放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电影自由”等口号。一名警察试图涌入人群阻止一些抗议者唱国歌的行为，现场出现了一些冲突，最终人群逼退了那名警察。23 点 59 分，警察试图组成人墙来分散人流，但群众回之以更响亮的口号，一名男生号召“我们走起来吧，游行就是要走起来才有意义”，另一位女生回答“此刻，我们在这里就是意义”。在警察不断地推搡和扯打下，人群在 1 点 40 分左右短暂散开，但很快又来到农展桥聚集起来，此时抗议人数已经缩减到 100 多人，他们在凌晨四点左右最终散去。[6]

整个行动中并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在现场参与者看来，最初带头在河边点蜡烛、唱歌、发放白纸的女生们在午夜前就离开了，在现场参与者看来也并没有起到组织者的作用。后面几位男生承担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但并没有成为绝对的领导者。由于当天的行动缺乏事先的组织，行动过程中有时大家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比如，想唱歌时不知道要唱什么歌，因为除了《国歌》和《国际歌》就想不到有什么能让大家一起唱的歌；想喊口号不知道该喊些什么，甚至不得不在现场用手机搜索。现场的政治光谱也较为分散，既有自由派，也有左派。[4]大家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诉求和口号，正如一位亮马河抗议者在接受 BBC 采访时说：“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行动纲领”。

两场抗议运动，无论是活动的发起还是后续的组织，都显示出很强的自发性。乌鲁木齐大火的悲剧激发了群众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在之前一系列市民要求解封运动的铺垫下，一些较为激进的群众被南传学生的行动所点燃，依托已有的社交网络开展行动。**参与人数不多，且主要集中于学生、知识分子、艺术和媒体工作者等。他们的确部分采用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口号，但是这只是因为四通桥的口号是当前唯一广为传播的口号，它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群众对于封控和专制政治统治的不满**

[4] 11 月 27 日，亲历北京亮马桥 https://www.dw.com/zh/11%E6%9C%8827%E6%97%A5%E4%BA%B2%E5%8E%86%E5%8C%97%E4%BA%AC%E4%BA%AE%E9%A9%AC%E6%A1%A5/a-63950713

[5] 北京"白纸运动"示威被捕者是谁？不少女性 还有记者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kw-01172023095114.html

[6] 【現場】北京亮馬河：此刻，我們在這裏就是意義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129-mainland-beijing-zero-covid-protests/

以及对于民主权利的渴望。在自发的抗议活动中，抗议人群没有时间也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创造出新的口号。**但需要指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没有领导这些运动，这些运动缺乏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本质上处于没有领导者甚至组织者的境地。**

三、如何看待 2022 年 11 月的群众运动和我们的任务？

在具体分析了 2022 年 11 月的民主运动后，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运动与同时期以富士康工人斗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运动。

诚然，如《列宁道路》所述，以富士康工人斗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运动也是自发、无组织的，只提出了经济诉求，而且并没有对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形成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运动的展开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则表现出了令人震撼的战斗性、坚定性和组织性，绝非市民和学生能比拟。同样面对警察的攻击，无产阶级毫不畏惧，直接采用战斗的姿态，仅仅用两天时间就取得了胜利。正如本刊在《郑州富士康工人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所述，它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最激烈、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工人斗争，战斗的无产阶级展现自己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

但是，这个能够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自己在独自战斗，并没有能对同样行动起来的市民和学生形成影响。虽然他们是在反抗当时的防疫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在经济诉求之外提出反对防疫政策、甚至专制制度的诉求，没有能够通过诉求和实际行动影响小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去影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无产阶级。

这说明了什么？这恰恰说明，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没有对无产阶级形成有效影响。这也再次证明了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这也向我们左翼青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到工人中去，宣传社会主义，让战斗的无产阶级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列宁道路》看来，这样的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民主革命中间步骤，提出更广泛、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才能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认为，在《列宁道路》所说的，“工人阶级需要有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需要有组织起来的觉悟力量”之外，无产阶级更要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要“更严格地维护自己的阶级独立性”、避免“将自己的阶级要求淹没在一般的民主主义词句的大海里”，也要“毫不留情地揭穿”资产阶级民主派[7]，还要积极地将争取民主的要求与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正如本刊前几篇回应文章所述，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形成、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挤压，日渐趋近于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他们对于独裁非常不满，对于资本的压迫也非常不满。但他们其实并没有参与到本次的民主运动中。要把他们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中争取过来，或者说要让他们也愿意行动起来，恰恰需要无产阶级在“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之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并在斗争中展现自己的力量，展现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让我们引用《列宁道路》没有引用全的列宁的那段话：**“我们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现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这些民主要求就是：建立共和国，实行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男女平等，民族自决等等。**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作为一种例外，而且只能表现为某种不充分的、被扭曲的形式。我们在依靠已经实现的民主制、揭露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彻底性的同时，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剥夺资产阶级，因为这是消灭群众贫困和充分地、全面地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的必要基础。在这些改革中，有一些将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前就开始，有一些要在推翻资产阶级过程中实行，还有一些则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实行。**社会革命不是

[7]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列宁全集》第 9 卷.

一次会战，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所有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些改革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正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用彻底革命的方式表述我们的每一项民主要求。**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在一项基本的民主改革都未充分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8]

正如列宁所说，彻底的民主主义要求本来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列宁道路》指责我们试图“避免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看来，我们并不“避免”民主革命，我们承认民主革命也是一种未来的可能。但可能并不等于必然。在未来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对民主运动的领导权的获得，不是靠预设一个必经的“民主革命”阶段，不是靠把自己的要求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之内，以避免把小资产阶级盟友吓跑。作为最坚决的民主战士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提前预设所谓的“中间步骤”，从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给自己戴上紧箍咒，让运动不超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在争取民主的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方式恰恰是展现其彻底的坚决的革命性，而非妥协性！

《列宁道路》声称：“通过领导彻底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由 2022 年 11 月民主运动的整体图景进行了初步的检验”。用运动的当下去预言运动的未来，这就是《列宁道路》的论证逻辑。如果这也可以称为检验，那么在工人阶级获得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之前，工联主义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可以经历一万次这样的检验，表明自己就是真理。这样的“真理”是立足于现在，用直线式的发展来思考运动的未来，而不考虑运动过程中的质变和飞跃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不否认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不代表无产阶级需要坚决支持民主革命，把它上升为必然性，进而把它变成现实。社会主义是更大的历史必然性。这需要我们左翼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用百倍的毅力和热情去与工人相结合，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在 21 世纪再一次让社会主义成为坚不可摧的现实！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TG 频道《今朝》：https://t.me/MLMismRevolutionary，加入我们的 TG 读者群 https://t.me/+G-VKERmOA4IxMzRk，一起跟踪最新文章，研判阶级动态。

[8]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列宁全集》第 27 卷.

论《今朝》与《列宁道路》的“理论争鸣”（1）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论《今朝》与《列宁道路》的“理论争鸣”（1）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编者按：有两篇读者来稿专题分析了当代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其中，第一篇比较赞成本频道的观点，而第二篇则与本频道进行了商榷。我们认为，这两篇文章所进行的分析均有启发性，例如此来稿即在阶级划分标准、非生产劳动等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入、比较准确的分析。为了推动革命的理论准备工作起见，我们将两篇来稿，以及我们撰写的一篇解释频道观点的文章，一起推送给读者。

今年以来，活跃于Telegram的两个革命马克思主义频道《今朝》与《列宁道路》之间展开了“同志式的理论争鸣”，主要涉及阶级分析方法及其结果、对中国未来革命阶段与动力的判断、对于当前社会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分析，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的分歧也贯穿其间。作为两个频道的共同读者，笔者很高兴地看到，有这样的中国左翼能够较为系统地论述和争论当前革命的诸核心问题，而不是停留在左群内部碎片化的口水之争，在当前左翼理论混乱、实践停滞的情况下，客观上无疑是迈出了一步。

对于《今朝》为此撰写的五篇特刊，笔者认为，尽管它指出了《列宁道路》在分析和判断上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今朝》并没有做出真正有效的批评，自身的立论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本文中，笔者简要回顾二者的争论要点，并对《今朝》的批评的不足进行回应，以期双方进一步阐发并解决分歧。

一、阶级分析问题：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划界标准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不同的阶级分析方式得出的对现实阶级矛盾状况的分析结果，将导出对于革命阶段、政治策略乃至组织方式等问题的不同判断。因此，纵观两个频道的分歧（当然，还应该包括其他派别），直接结论似乎是“一次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分歧，但实则立论于对于当前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估计之上。显然，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导者，特色官僚和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小资产阶级有多大的力量，它在革命中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而，小资产阶级作为劳动和资本两极的缓冲地带，在阶级分析框架中是最为模糊不清的。不仅是因为它兼具劳动者与资产者的特性，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同时消灭和产生着不同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对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即占有劳动资料的小商品生产者，例如自耕农、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当前左翼少有分歧：它们总体上随着大资本的挤压而减少、没落，大多数成员将被抛入无产者的行列，因而当他们不再执迷于返回小生产者的乌托邦而认识到自身与无产阶级的共同命运时，才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从粗放走向集约，又会重新产生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除了耳熟能详的工人贵族和公务员，还有形形色色的非生产劳动者（属于当前划分的“服务业”）。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与经典的产业工人的相似性在于，同样是作为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被卷

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给资本家带来利益。非生产劳动者是否能够纳入无产阶级的范围，构成了争议的发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何在？进一步追究，分歧在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如何划分？

《今朝》认为，“通过劳动力买卖而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它不一定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可以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劳动等等；它不一定局限在物质生产部门，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内也必然存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回应《列宁道路》（三）》（五）结论）可以看出，《今朝》对生产劳动做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因此几乎等于雇佣劳动，只要以某种形式（未必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实现。《今朝》仅仅从雇佣劳动中排除了这样一种非生产劳动情形：“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比如家仆和与之性质相当的知识分子。这是《列宁道路》同样肯定的：这里劳动者用于交换的是服务（无论是纯粹的服务还是以商品形式出现）而不是劳动力，它虽然生产了一些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但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相比之下，《列宁道路》对生产劳动的界定是更狭窄的：**1**、劳动力商品与可变资本相交换，**2**、物质生产部门，即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当然需要指出，这里的“物质生产部门”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直接产出“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还应该包括必要的生产性流通部门（比如运输、快递）——尽管它们不提供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物质产品。结果，非生产性流通与其他的非生产部门一样被排除在外，而这正是《今朝》试图多划入生产劳动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今朝》混淆了必要的销售和额外的营销，那些把商品从仓库排上货架的工人仍然属于生产性流通部门，但为招徕顾客消费的推销员显然不在此列。资本家为了市场营销不惜投入巨资，但去掉它并不影响顾客购买同样的商品。

产业资本家不能独享剩余价值，必须将剩余价值按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分割给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甚至地主和官僚。这些部门的**“劳动”**之所以应划入非生产劳动，是因为不仅不创造剩余价值，甚至不创造价值，虽然可以美其名曰**“参加了剩余价值的实现”**。由于这些部门都寄生于物质产业部门，归根结底寄生于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尽管这些部门的资本家也会雇佣劳动者，比如推销员、前台服务员、交易所和银行职员，但这些雇佣劳动者实质上仍然是从同一个剩余价值的蛋糕中分走了一块（只不过比他们的雇主少得多），因而表现出与传统小资产阶级相当的两面性。

因此，《列宁道路》对于无产阶级做出了比《今朝》更为狭义的界定，“工人阶级的范围需要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缩小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则需要相应地扩大，即从占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集团，扩大到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扩大范围后纳入的正是上述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可以说是“新小资产阶级”，因为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不断派生和增加（并替代传统小资产阶级）——这意味着较少的生产者能够养活社会上更多的非生产者，其中也包含非生产劳动者。

总之，《列宁道路》和《今朝》都承认，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是划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界限的标准。为此，双方都引经据典，试图给出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定义，这无疑值得肯定。然而，双方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中“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的二重性”的解读中分道扬镳。

两个频道对于斯密的第一种解释（把生产劳动看成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没有异议，因为马克思也将其指认为正确的定义。《今朝》批评《列宁道路》歪曲马克思原意，在于对斯密的第二种解释（生产劳动是

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做出过度推论，似乎马克思在评论斯密时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才是生产性劳动者”。实际上，这个“似乎”来自《今朝》对于“物质生产”做的狭隘理解。马克思自己解释道，不应根据是否在商品上留痕来理解劳动在商品中的物化，为此举了制造业、农业和运输业的例子来对比。斯密的第二个解释在马克思看来并不确切、存在矛盾，但《列宁道路》并没有通过斯密的这个理由来推导出生产劳动的规定性，至少不是在《今朝》理解的意义下。**“物质生产部门”**（或许这个表述确实容易造成误解）的实质不在于是否**“物质”**，而在于是否真正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才是定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斯密的第一个解释，它本身没有错误，但问题在于，哪些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呢？不同的社会关系对此产生了不同的判断。

《今朝》转引马克思举的饭店厨师和侍者的例子，来阐明如下观点，“一项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是“生产劳动”，对于消费者来说却是“非生产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呈现出不同的评价。”（《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回应《列宁道路》（三）》（三）马克思对非生产劳动的分析）遗憾的是，它自己却没搞清楚，马克思在阐述对于生产劳动的某个规定时，说的是“在资本家看来”还是“在社会看来”。马克思批驳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观点（妓女、仆役等的劳动是否带来货币）的实质在于：

>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为马克思所加。）

资本家认为，只要雇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大于通过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也就是说，能给自己带来利润，就是生产劳动者，包括妓女、仆役、演员在内。因此，斯密的第一种解释，虽然是政治经济学上正确的解释，但单独来看却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从劳动者角度看来，或从社会整体看来，这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寄生于生产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所以，必须再对**“生产劳动”**加上另一重规定：它确实创造了价值，因此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今朝》当然不至于把马克思明确讨论的丑角、家仆，以及与之性质相当的“高级”劳动者纳入生产劳动，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只是善于出卖或强加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来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但《今朝》仅仅认识到服务与收入交换的劳动者是非生产性的，却忽视了自己想要比《列宁道路》多划进来的无产阶级部分，包括各种从事营销、商业服务或金融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看来”**从事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但**“在社会看来”**是非生产性、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参与转移价值的。例如，资本家显然会认为，雇佣一个网红带货主播或者给自己做账的会计比拧螺丝的产业工人更具有“生产性”！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前者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不寄生在后者的基础上就只能是空转。正如《列宁道路》的这段精彩的评论所说：“非生产劳动者在雇佣他/她的资本家看来是生产性的，能够带来利润；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她是非生产性的，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依靠别人的劳动生存的，他们消耗而非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上）》（三）民主革命的一般含义和小资产阶级问题）

《今朝》低估了这一混淆的理论后果。就是在同一章中，马克思辛辣地嘲讽道，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机器、掌握社会的各部门后，为避免对其非生产性的指控，与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各种“非生产劳动者”互相帮忙，来证明自己是与物质财富生产相联系的“生产劳动者”。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 “他们直接为“非生产劳动者”和明显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为马克思所加。），

正是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依附于资本家。因此，《今朝》在对马克思的这一次误读中也不慎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上。

《今朝》在长篇批驳了《列宁道路》的阶级分析标准后，在正面立论方面却显得相当瘸腿。《今朝》仅仅是在文章结束部分，才简单引用了列宁《伟大的创举》一文对阶级划分标准的论述，并且没有以此来明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特别是在处理小资产阶级这个复杂的过渡带时更需要具体的辨析而非一般的阶级定义。根据上面的讨论，《今朝》至少应该得出一个像《列宁道路》那样明确的结论：无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劳动但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小资产阶级。

此外，《今朝》声称列宁确立了阶级分析的三个标准，也是不恰当的说法。列宁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也就是生产关系，即哪个集团占有了另一集团的劳动。所谓“三个标准”，不过是以“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表现维度（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过程的地位、对劳动产品的分配）来通俗化地阐释基于政治经济学标准（生产关系）的阶级定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清晰地讨论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 “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把生产关系在不同环节的表现说成可分离的若干标准，就会造成一种误解，似乎马克思和列宁在支持“多元”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这样的意图。

不过无论如何，《今朝》的阶级分析仍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虽有错误，但还是比一些左翼简单粗暴的“脑体二分”高出了几个数量级。尽管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工作内容以体力劳动为主，许多脑力劳动者也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不是科学的判断标准：首先，任何人类活动中都包含着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因此体力劳动中也多少包含些脑力劳动；其次，垄断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去技能化”不仅表现在体力劳动，也表现在脑力劳动；再次，技术、管理和监督人员与执行工人之间的鸿沟不在于脑力劳动本身，而在于生产关系中前者代为资本家支配后者从而分得一定剩余价值；最后，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同样要掌握关于生产的全部知识，才能组织起社会化大生产。试图以“体力劳动=无产阶级，脑力劳动=（小）资产阶级”的公式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西埃主义。

马克思本人对于脑体分工的看法比这些左翼要辩证得多：“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

说，就不再适用了。”（《资本论》第1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里的“总体工人”反驳了对于脑体分工的机械划界，但似乎又可以被《今朝》用来支持宽泛的生产劳动定义：马克思将“生产工人”扩大到了超出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的范围，似乎只要参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人都有权自视为工人阶级。所幸马克思及时堵住了这个缺口——对单个成员不适用，紧接着就缩小了生产劳动的概念：“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虽然马克思又“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教员），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不能仅从劳动内部，还要从生产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来进行划界。马克思提示我们去看《剩余价值理论》，这实际上分别对应于上文讨论过的斯密的第二种解释和第一种解释。在“总体工人”中，不仅包含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工人，也包含了《今朝》强调的“商业雇佣工人”，以及《今朝》忽视的技术、管理、监督工人（属于物质生产部门），他们是否属于无产阶级，都需要具体的讨论。《列宁道路》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在于，划定非生产劳动者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不创造价值而参与了对剩余价值的瓜分。至于拥有技术、管理和监督职能的“工人贵族”，即使他们也创造了价值，但同样参与了对“附属”工人剩余价值的瓜分，因而被马克思、列宁视为“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

在《今朝》对阶级分析的探讨中，《不参加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吗？——回应《列宁道路》（一）》一文反而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虽然并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首先，如何将现有的仅根据职业划分的统计数据科学地转化为阶级分类？《今朝》认为《列宁道路》将“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许多农民等等归属到“小资产阶级”是不正确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列宁道路》实际上根据行业数据区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劳动者）、小资产阶级（非生产劳动者和小业主）、私营资产阶级，然而关于每个行业的生产劳动者比例，恐怕只有对行业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得出更好的估计。“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小资产阶级大体不错，但是否属于非生产劳动者则有待商榷，因为其中可能包括了与物质生产部门结合的技术人员，应该视为工人贵族。至于办事人员和许多农民，如果不归入小资产阶级，还能归入什么阶级，还请《今朝》为笔者解答疑难。

其次，划分出这么多小资产阶级的意义何在？《今朝》担心，如果论证了小资产阶级在增加，甚至比无产阶级还多，就会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滑向伯恩施坦主义。但列宁从第二国际蜕变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问题不在于在事实上承认这一点，而在于对此采取鸵鸟态度。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指出，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垄断高额利润能够养活国内更多的非生产人口——除了寄生性的垄断资产阶级，还应包括服务业人员、公务员等“中间阶层”，甚至也包括社民党和工会官僚，还从工人阶级中收买了一批“工人贵族”，这些人构成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的阶级基础。考茨基等社民党领导人正是在空洞地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越发强大，而最终落入了机会主义的陷阱。列宁的这段话完全驳倒了《今朝》的忧虑：

> “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

> 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帝国主义论》第10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小资产阶级比例超过无产阶级并不会成为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正如俄国革命前工人阶级比例明显低于农民没有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马克思主义者是基于现实的乐观主义者，若是选择性地对不利条件避而不谈，反而会栽倒在自己的幻想中。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提出革命任务，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辨析双方的观点。

从中应该衍生出的真正问题在于：按照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的现实中划分出的“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是否具有理论所预期的政治表现差异？按照《列宁道路》的标准，无产阶级的范围相当于生产劳动者，小资产阶级则包括非生产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如果前者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更彻底的革命性，我们就要研究标准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排除工人运动的低落时期和某些部门工人的立场偏移。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生产劳动者组织会支持机会主义者，有的非生产劳动者组织会支持革命派。例如俄国革命中，印刷工人组织（生产劳动者，没有争议的经济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支持孟什维克，管家组织（非生产劳动者，马克思直接指出这个群体属于小资产阶级）支持布尔什维克。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体的分化：俄国工人阶级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少数支持孟什维克，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支持孟什维克，但很少支持布尔什维克。至于当今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光谱上的区别，由于当前阶级斗争相对不开展，还不那么容易辨别。我们将在文章第三部分讨论双方对于当前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估计和判断。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

当我们说“民主革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列宁道路

当我们说“民主革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May 28, 2023

当我们说“民主革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列宁道路

自从《列宁道路》提出“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以来，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些批评和质疑中既有严肃、认真的讨论，同时也存在着对《列宁道路》核心观点和“民主革命”内涵的误解——这导致有些批评看起来像是“隔空喊话”，并没有起到深化讨论、增进共识的作用，反而遮蔽了真问题。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简明扼要的阐述，再次明确一些核心观点和基本主张（虽然这些观点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中，尤其是《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文中已经表达过），以推动讨论的深入。

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前者中的许多措施已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我们也不期望抽象地讨论二者的区别。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是仅仅简单用“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就能准确概括的，真正能全面、准确反映事情本质的是革命纲领。我们希望，愿意严肃考虑理论问题和推动实际工作的同志或派别都能就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纲领展开更加热烈的讨论，因为只有在明确的纲领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回答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只有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并给出回答，找到完成巨大革命任务所应当依靠和必须依靠的力量，关于革命性质的讨论才能通向现实可行的革命道路。

1、推动民主革命的政治落脚点在于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吗？

显然不是。无产阶级推动民主革命的政治落脚点不在于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不在于迎合小资产阶级，而在于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争取掌握当前阶段的革命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警惕和战胜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影响，坚决反对自由派的妥协和背叛。无产阶级支持民主革命并不是天真地要先和自由派推翻专制政府，然后才来反对资产阶级。历史证明，要想推动民主革命往上升路线发展、取得彻底胜利从而走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必须始终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推动民主革命的根本落脚点实际上在于为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政治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为培养足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创造充分的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推动民主革命的政治目标也不是变官僚专制为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专政——这一政权形式才最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政治力量，最有利于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说：

> *“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

> *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在今天同样是适用的。

2、以民主革命为当前阶段的目标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面前失去独立性吗?

正如前面所说，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推动处于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靠拢。那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主张团结小资产阶级并不意味着就要迎合小资产阶级，也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就要把自己的政治要求降低到小资产阶级的水平。“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无产阶级要想在民主革命中真正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就必须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幻想和动摇作斗争，要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实现现阶段的民主革命诉求，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同时，无产阶级丝毫也不隐瞒自身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在进行民主革命宣传的同时也要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揭露小资产阶级试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维持小生产和小私有制的幻想。要让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明确地认识到，民主革命只是社会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不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话，那么民主革命成果也可能会丧失。而且，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民主革命也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

3、推动民主革命的经济落脚点在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在于变官僚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为自由资本主义吗?

显然也不是。无产阶级推动民主革命的经济落脚点不是要抽象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是要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于消除社会上存在的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民主变革的“非民主因素”，其阶段性目标在于建立劳动者专政国家所领导的、劳动者普遍参与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或集体经济），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前阶。依照今日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状况和垄断程度，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盟手中，只要没收了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同时在所有生产单位中实行普遍的劳动者监督，那么中小资本和小生产将无法独立发展，它们势必要依附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就为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国家资本主义

> “在苏维埃政权下则会是3／4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既然你们主张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专政，经济上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专政国家所有，革命的下一步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把这叫做**“民主革命”**呢？

我们之所以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没收垄断资本归劳动者专政国家所有的、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前进方向的革命依然称为民主革命，甚至说它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是因为这场革命所要完成和所能完成的任务并没有完全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也并不具备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政治上并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专政；在经济上并没有完全改变雇佣劳动制度，也没有打击小私有制，小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依然是团结的对象。而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反对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制，意味着要往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发展。在资产阶级已经被打垮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小资产

阶级及其要求将成为主要的斗争对象——这显然不是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

我们无意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之争在左翼内部制造分歧，如果有同志在革命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上与我们一致，并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没收垄断资本归劳动者专政国家所有、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前进方向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未尝不可——虽然我们认为这在理论上是不够严肃的。我们在当下之所以强调“革命性质”这一议题，关键是为了反对“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

“左”的观点从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出发，过于强调当前小资产阶级落后和反动的一面，认为无产阶级单靠自己就能战胜其他所有阶级——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想象，是高估了无产阶级力量、轻视了小资产阶级在当前阶段作为革命辅助力量重要性的“关门主义”，必将在现实中遭到惨痛的教训。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固然能使敌我阵营的划分变得更加清楚和简单，在理论上也能够跳过革命领导权这个复杂的问题，但这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右的观点同样以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结论，但与前一种观点相反，他们过于强调小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走向破产的一面，高估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高估了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同时高估了现实中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热情（即便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占据了人口的多数，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做好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而把许多属于民主革命范畴的、并不必然导致反对资本主义的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运动（如免费医疗、经济性罢工等）划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内。这极有可能会导致在现实工作中忽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细致、艰苦的工作和反复的斗争才能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方向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思想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从而在事实上失去领导权。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虽然强调当前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但它已经不是以往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要内涵我们在上一节已经初步阐述过了）。这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只要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劳动者掌握国家政权，那么革命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那时，无产阶级才会和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而无产阶级将利用上一场革命中建立的有利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推动革命向新的目标前进。

5、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否能够不经过民主革命的锻炼和洗礼而具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能力?

我们的观点是不能。在专制统治和缺乏基本的政治自由（如罢工、游行、集会、言论、出版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能得到充分展开，群众对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无产阶级也缺乏公开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的空间，这导致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组织程度、斗争经验、力量积累等各方面都难以具备直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条件。无产阶级只有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逐步争取和扩大实质性的政治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充分锻炼和凝聚自己的阶级队伍，才有可能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创造条件和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从领导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是不够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具备一般性的民主革命所需的觉悟和组织能力；我们是从锻造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足以承担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在当下不能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和轻视在现实中建立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相反，这正是我们在多篇文章

中反复强调的。

虽然我们极端强调新一轮革命高潮到来前的理论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但指望在出现相对成功的革命实践经验之前让反对者认同我们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欢迎继续就革命性质问题进行真诚、严肃的讨论和批评，同时我们更期待包括我们在内的左翼同志把主要精力投入当前的迫切任务中去，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革命性质问题上暂时存在的分歧并不影响我们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摆脱知识分子和工人相脱离的现状，完成实质性建党的任务。关于革命性质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道路的是非对错只有在将来的社会斗争才能得到真正的回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但前提是我们得有实践——而制定统一的革命纲领、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小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报、对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灌输，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实质性建党的任务，就是当下我们在实践领域迫切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

阶级划分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列宁道路

阶级划分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列宁道路
当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任务是通过建立工人小组、全国政治报和实质建党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推翻专制政府，建立劳动者专政。这是我们始终置于首位的观点。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呼吁左翼通过共同阅读《列宁全集》，反思过去的抗争经验，提高理论修养，为接下来的斗争做更充分的理论准备。革命性质的争论是有助于提高理论修养的，只是出于这一点，我们才和经济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围绕革命性质及其衍生问题进行了半年有余的争论。我们始终认为，判断革命性质的第一标准是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第二标准才是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劳动的生产性只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划分标准。因此，相比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的任务，对于阶级划分标准或革命性质第二标准的争论不具有迫切意义。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不希望这场争论使革命左翼的视线聚焦于次要的问题。

但我们还是决定回应“革命”频道关于阶级划分的最新文章。虽然这篇文章的观点不值一驳，但经济主义者这次找到了不错的文本，即《资本论》“阶级”残篇。该部分及其所在的第七篇恰好是我们所重视的。我们通过这一文本确认，三大阶级的本质区别在于一方占有另一方的剩余劳动，而不在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为资产阶级所占有，而不是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只有用“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核心标准而非别的什么标准，才能跳出庸俗经济学的窠臼，像马克思一样科学地划分阶级。这当然与《今朝》的多元标准不同。在《今朝》的文章所引用的名言[1]中，列宁恰恰认为阶级的本质在于“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多元”是上述引文的误读，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尽管“革命”频道常做《今朝》的应声虫，但它在阶级划分的理论依据上至少前进了一步，没有提什么多元标准，而是认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始终是划分阶级的首要的标准”。至于马克思是怎样批判这种观点的拜物教性质，以及这种观点是怎么把“阶级”这种人对人的压迫关系物化为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的，我们将在后文指出。《今朝》曾质问我们为何不引用列宁，“革命”频道则一口咬定我们的看法在原著中实在找不到依据。尽管这种质疑幼稚到令人发笑，我们在此也满足它们的愿望，把列宁的话放上来：

> *“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30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里列宁对阶级本质的判断同前述引文一致，但意思表达得更明确：阶级的本质在于“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也就是说，压迫阶级占有被压迫阶级的剩余劳动。土地所有权或生产资料所有

权都是实现劳动占有的手段，本质和手段不可颠倒。但在上述两个文本中，列宁都并非系统论述阶级问题，而只是顺带提到。像《今朝》那样只是把革命家的话从这样的文本中摘引出来，强加注解，得出论断，却不对自己的论断展开科学的证明，只破不立，这样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所不取。因此，并非我们无法引用列宁，而是列宁的这些话的科学理解只能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去找，别无他路。“革命”频道关注到了重要的文本，这是值得鼓励的，其局限在于只是摘取残篇中的只言片语（甚至没有把“残篇”放回其所在的第七篇中去理解！），就自认为发现了《列宁道路》的一个“逻辑错误”，却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犯了最基本的理论错误——它竟敢说工资是剩余价值。这种说辞的荒谬性是不难辨识的，稍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做到。但为避免类似错误的有害影响，我们也简单回应，置于文末，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在根据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分析三大阶级之后，我们将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分析非生产劳动者这一小资产阶级。非生产劳动者通过占有生产工人的剩余劳动，在自由时间中从事流通、服务、科学、艺术、战争、国家管理等等。一方面，由于从事非生产劳动，他们相对纯粹的寄生阶级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在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方面又时常同剥削阶级的利益相一致。总之，非生产劳动者具有两面性，属于小资产阶级。

一、依据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划分三大阶级

“阶级”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节，只有800余字，且手稿在此中断，故通称为“阶级”残篇。这一节正是要研究“是什么形成阶级”，也就是“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马克思首先分析了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由于人们占有不同的收入源泉（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所有权），故而以不同的方式获得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进而分属不同的阶级。把这个观点稍作变换，略去“收入”这个中介环节，就是认为不是收入源泉和收入的同一性，而是收入源泉本身划定阶级，也就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阶级划分的首要标准”——这正是“革命”频道的原话。但马克思却批评上述观点只具有“乍一看来，好像就是”的表面意义。这是为何呢？马克思解释说，按照这种收入源泉的阶级划分法，那么仿佛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收入源泉。根据同样的逻辑，由于社会分工导致生产部门无限细分，在三大基本阶级内部似乎也可以分为无数个更小的阶级了。至此手稿中断了，《资本论》画上了句号。似乎马克思并没有明示自己的阶级划分标准，甚至对于收入源泉与收入同一性标准的批判也戛然而止。但“阶级”残篇所在第七篇题目正是“各种收入及其源泉”。马克思反对生产资料所有权标准的原因，列宁为什么说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的本质，都可以在对第七篇的全面掌握中找到科学依据。也只有在原语境中，我们才能得到马克思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阶级理论。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只考虑最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业资产阶级直接强迫无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这是两大基本阶级及其划分标准。第三卷中，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研究了地租这一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考察了土地所有者这个第三大基本阶级。“各种收入及其源泉”这一篇是对整个《资本论》前三卷中的生产关系的综合分析。可以说，本章的理论目的就是批判庸俗经济学在收入及其源泉问题上的错误，指出古典经济学历史性的贡献和缺漏，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最终从理论上揭示阶级的本质。所谓“收入”不过是价值的通俗说法，是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的含混用

词。为了批判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在本章沿用了“收入”从而“收入源泉”的说法，但应该清楚，追问收入源泉就是追问价值源泉。

马克思首先否认的是要素价值论的收入及其源泉理论，这也是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是资本拜物教的虔诚信徒，把“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奉为“三位一体”公式。这个公式从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错误的。首先，公式的右侧三项有统一的本质，利息、地租和工资的本质都是价值。公式左侧三项却不统一。资本是生产资料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形式，土地和劳动则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物质要素，因此资本、土地、劳动三者是任何有历史观念的人都不应并列在一起的事物。然而，庸俗经济学不仅把它们综合在一起，而且进一步认为它们各自创造了对应的收入，创造了公式右侧的产品和价值。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由这个收入源泉而划分出的阶级也是像土地和劳动一样永恒的事物。理论上的庸俗反映了其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 *“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4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进行了修正，得到了新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息；土地所有权—地租；雇佣劳动—工资”。新公式处理了公式左边的量没有统一的社会历史形式的问题，将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源泉。这是一组可通约的项，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生产要素的社会形式。因此，新公式避免了直接把资本打扮成物质生产的永恒条件。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公式仍然是错误的，或至少是非本质的、需要批判的。

对修正公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把它理解为收入源泉—收入，这就意味着把土地所有权、资本和雇佣劳动视作产生出产品价值本身的最后源泉：

> “*因此，土地所有权、资本和雇佣劳动，就……转化成了真正的源泉，*这个源泉本身产生出这几个价值部分*和这几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或可以转化成的各相关产品部分，因而是*产生出产品价值本身的最后源泉*”。（同上，936页，黑体是我们加的）*

这样的话，修正公式不过是一种变形的要素价值论。人对物的所有权创造价值，这种观点一不留神就倒退到物本身创造价值的泥潭中去。把真正的社会关系固化为物权和物本身，修正公式和旧公式的区别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第二种理解是只把左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视作获得右侧价值的手段，所有权只在这个意义上是收入源泉（价值源泉）（同上，931页）[2]。如此一来，修正公式在上述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非本质的，因为新公式没有揭示出收入的真正源泉。如果要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混淆控制收入源泉的手段和真正的收入源泉，就必须给出一个真正揭示出创造收入（即价值）源泉的公式，应该用正确的公式替换掉修正公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完成这个任务曾作了突出的贡献。斯密和李嘉图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物权，而是把一切收入最终归结为劳动。

> “*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做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

> *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同上，940页，黑体是我们加的）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唯一正确的公式：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放在公式左边作为收入源泉的只能是劳动，而不是任何物或者物权。不过，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分子也常表现出不彻底性和前后矛盾。这种不彻底性就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劳动价值论，没有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始终作为分析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概念，所以他们只能偶尔模糊地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抗，却无法科学说明二者间的压迫关系。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是力图将物的关系还原为人的关系，还原为强制生产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从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因此，对无产阶级而言的结论只能是：劳动是唯一的收入源泉（价值源泉），阶级形成的根源也只能从生产过程中寻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源泉和收入的同一性”的正确表述是“劳动和价值的同一性”，更确切地说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同一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就在于资本家强制工人进行剩余劳动以生产剩余价值，这里一切神秘的因素都散去了，小资产阶级的脉脉温情也破碎了，只剩下赤裸裸的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且仅在它作为压迫阶级榨取和吸取剩余价值的物质媒介这一意义上，才能被称作“收入源泉”。离开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成为虚幻的、颠倒的收入源泉，相关分析就必然偏离劳动价值论而走向庸俗化。结合《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工人的必要劳动创造其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即劳动力价值）的结论，我们可以得到科学的“收入及其源泉”公式：必要劳动——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阶级”残篇了。

> 马克思设问：“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

> 他自己答道：“乍一看来，好象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三大社会集团的成员，即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

“革命”频道由第一句话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反对从收入源泉出发划分阶级，支持“从生产资料的关系出发”划分阶级。但这个频道仿佛看不到马克思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正是表达按生产资料所有权划分阶级的观点，正是用修正了的“三位一体”公式来定义三大阶级。把这一阶级划分标准用公式来表达就是：资本—利润—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地租—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工资—无产阶级。而“革命”频道主张按照生产资料所有权划分阶级，也无非是上述公式略去“收入”这一中间环节的简化版：资本—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者阶级；雇佣劳动—无产阶级。总之，第二句话正是“革命”频道的观点。

但马克思是否支持这个观点呢？当然不支持，否则他不会将其称作“乍一看来，好像就是”的观点。而“革命”频道却试图把收入源泉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二者对立起来，否定前者，拥护后者，还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实在可笑。事实上，马克思不是抽象地反对用收入源泉（及其与收入的同一性）分析阶级成因

（第一句话），而是具体地反对理解收入源泉的特定方式（第二句话）——因为，哪怕是这个经过了修正的“三位一体”公式，也只是掩盖而非揭示了收入的真正源泉。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是虚假的、在生产当事人面前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收入源泉”，在这种基础上判定的阶级也是被物化了的社会关系。社会分工导致了生产资料种类的不断细分，那么似乎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可以根据他们把握的生产资料种类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只有劳动，只有把一切收入归为它们的真正的、唯一的源泉——劳动，才能脱离具体的物，按照抽象劳动在时间上的界限直接划分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以及其他阶级。总之，对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或其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才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如果马克思可以把这里续写下去，他会说，实质上，阶级形成是由于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真正形成三大阶级的只能是下面的公式：必要劳动—劳动力价值—无产阶级，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

二、因占有剩余劳动而享有自由时间的非生产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

上一节中，我们分析了剩余劳动的占有构成了三大基本阶级。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进行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剥削者是资产阶级，被剥削者是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由资产阶级再分配给土地所有者，后者是现代社会的第三大阶级。那么如何看待与生产过程不直接相关的人呢，他们是否属于不同于三大阶级的另外的阶级？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对自己研究的构想中看到非生产阶级的存在。

> “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制。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现在是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来看的生产。然后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 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2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在整体结构上，马克思希望先后研究资本、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分析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三大阶级，然后引入对国家和非生产阶级的分析。那么怎么分析这个非生产阶级呢？马克思以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为核心，论述了非生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

> *“剩余劳动在一方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 （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创造出来。不言而喻，这首先适用于资本，其次也适用于*同资本分享［剩余价值］的其他阶级，*因而适用于靠剩余产品过活的需要救济的贫民、侍从、食客等等，总之，一整批仆从；适用于不是靠资本生活，而是靠收入生活的那部分仆役阶级。*这种仆役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社会的发展进程决不在于：因为一个人满足了自己的迫切需要，所以才创造自己的剩余额；而是在于：因为一个人或由许多个人形成的阶级被迫去从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以外的更多的劳动，也就是因为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造出非劳动和剩余财富。”*（同上，379-380页，黑体是我们加的）*

很清楚，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首先被资产阶级占有，资产阶级将剩余价值同土地所有者和非生产阶级（仆役阶级等）分享，非生产阶级因此免于生产劳动而享有相对的自由时间。这些自由时间被用于非生

产劳动，从事流通、服务、科学、艺术、战争、国家管理等等[3]。马克思又明确说过，仆役属于小资产阶级[4]。因此，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而获得自由时间的非生产劳动者应属于小资产阶级。剩余劳动的反面是相对的懒惰，而非生产劳动只是一种比较好的 “非劳动”。马克思有时将他们称作“不劳动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进行任何体力或脑力的活动，甚至不是说他们免于任何剥削和压迫。相反，马克思认为他们但凡“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或“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5]，那就不是真正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即直接的物质生产。所以，揭露投行员工或大学教师过劳，鼓励他们抗争，这些都只具有民主主义的意义，而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意义。因为他们受到的压迫与“生产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再怎么“过劳”，也无法在物质上养活自己，也谈不上被别人占有剩余价值。就像残留的父权制与家长制对女性及其子女的压迫不属于阶级压迫的范畴，非生产劳动者受到的压迫再难以忍受，也并不能因此成为生产工人或无产阶级（这里二者有同一外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上面的引文中认为，仆役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在另一处地方他更是指出，非生产劳动者在剥削工人方面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同剥削阶级相一致：

> *“由于纯产品增加，为非生产劳动开辟了更多的活动领域，这些领域要靠工人的产品来维持，并且*它们在剥削工人方面的利益和直接从事剥削的阶级在这方面的利益或多或少一致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644-645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可见，把这种小资产阶级混入无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下面分析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劳动的几个代表领域：流通、服务、科学、艺术、战争、国家管理等。商业工人的非生产性我们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论述过了，马克思也直接说过，流通（贸易、金融业务）和服务业的非生产劳动者都属于“与工人阶级本身相分离的人”[6]。此外，马克思还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层”乃至“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指称一切通过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分享剩余价值的人。

>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4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这里阐述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生产劳动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连胡锡进都知道，全国公务员的大约三分之一是警察。然而《今朝》却指责我们“将其他雇佣劳动者（如服务业无产者、体制内底层办事员等等）剔除无产阶级的行列，即便他们也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底层劳动者”。把国家机器，乃至暴力国家机器的大部分成员视作革命阶级，理论上的倒退到这种程度实在让人震惊，这甚至不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该有的理论水平！这让英勇对抗警察的富士康工人作何感想？难道去年11月的富士康斗争不是工人阶级反抗黑帮统治阶级的英勇抗争，而是工人阶级的内讧吗？即使除去200万警察，所谓的体制内底层办事员所从事的工作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有一般的社会管理职能，另一方面是黑帮统治的现实力量。只要无产阶级没有把旧的国家机器进行彻底的改造，这两方面中后者就总是主要的。所谓的“体制内底层办事员”是国家机器的人格化，他们只是处于黑帮官僚体制内部的“底层”，与真正的底层无产者完全不同。如果无产阶级同情这些“底层”，把借由黑帮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人视为本阶级的同盟者，那一定会使农夫与蛇的悲剧再上演一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学校、官媒、娱乐节目等）也同

暴力国家机器一样，由社会中的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构成。他们享受着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也享受着脱离劳动而获得的自由时间。他们在这些时间中创造出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精神产品，保证统治阶级的思想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意识形态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对立，也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对立。把意识形态阶层混入无产阶级的企图，把一切拿货币报酬者说成生产工人的企图，和把上层建筑说成经济基础的企图在逻辑上是一贯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坚持要完整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剩余劳动）的时候忘记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讨论科学社会主义（自在的阶级与革命性质）的时候忘记政治经济学（剩余劳动），这就是《今朝》和“革命”频道等在思考理论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割裂。毫无疑问，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今朝》为代表的左派却只是抽象地承认这一点，一碰到具体问题就忘记。在考察体制内底层办事员这种具体的执行国家职能的人时，只看到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却忘记他们是国家机器的人格化，是阶级压迫的执行人，甚至要把这些人也划到无产阶级中去。要知道，体制内底层办事员和意识形态阶层正是国家机器的肉身存在。

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绝对增加而又相对减少，非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绝对增加的同时也相对增加，这是马克思多次作为规律来阐述的。

> “一方面可以说，一个国家越富，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人数就越多，财富的增长通过贫穷的增长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尽管工人人数绝对增加了，但相对来说减少了，不仅同吸收工人劳动的不变资本相比而言相对减少了，而且同社会中与物质生产不发生直接关系或者根本不从事任何生产的部分相比也相对减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45-34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增加了，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加重了，同时为整个其他阶级创造的自由时间也增加了。这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雇佣了更多仆役为他们的奢侈享受服务，更加贪婪和腐朽，表现为非生产劳动者的相对增加。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论断。但有些人不能理解这一点，反而把这一论断解读为无产阶级没落论。这种歪曲和不安源于《今朝》、“革命”频道以及冒险主义者都把判定革命胜利的基础置于工人阶级人数的绝对优势上。他们只谈自在的（即自发的，也就是犯了崇拜自发性的错误）阶级，而不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需要首先通过工人小组、政治报和实质建党对工人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从而把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创造出来。只需要看看历史也能知道，无产阶级从来都不是靠绝对人数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俄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只占全国人口的2%，而我们不用再去回顾中国等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人数占比了。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收入源泉—收入—阶级公式，一个更全面的劳动—价值—阶级公式：必要劳动——劳动力价值——无产阶级，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地租，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小资产阶级（非生产劳动者）。

三、“革命”频道的错误

“革命”频道在《<列宁道路>的一个逻辑错误》一文中认为，《列宁道路》的逻辑是“寻找构成工资、资本的价值的根本来源，并认为这个根本来源才是区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标准”。它认为这是错误

的，因为资本的根本来源也是剩余价值，工资是一种可变资本，因此工资在本质上也是剩余价值，生产工人会占有其他生产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构成无产阶级的相互剥削。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不能通过寻找构成工资和资本价值的根本来源来判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我们在上文已经知道，马克思不是抽象地反对从收入源泉和收入的同一性入手划分阶级，而是反对虚假的、颠倒的收入源泉。问题不在于收入源泉是否应该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而在于找到价值或收入的真正源泉，在于彻底地确认“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在划分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马克思首先划分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而划分出土地所有者和非生产劳动者。

接下来的问题是：工资的本质是什么？“革命”频道在试图证明我们错误的过程中，在这个看似非常基础的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混乱。首先，它认为一切“资本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这纯粹是对资本积累理论的误解和滥用。在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资本家不是挥霍掉全部剩余价值，而是将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以购买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只有这一部分追加资本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全部资本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那就是忘记资本的原始积累，忘记资本掠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血腥和暴力的历史，混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掠夺者创造出了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使得生产资料成为不变资本，这些生产资料当然是过去劳动的对象化，具有价值，但这里还谈不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该频道接下来的话更加让人震惊。它说，“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所领到的工资也是由可变资本转化而来，从而仍旧不过是以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生产工人工资的根本来源是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居然可以说出这种话！这里“革命”频道暴露出它不但分不清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而且连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分都不知道！它不知道，可变资本虽然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但其本质是工人为自己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是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工人为自己的生活进行的这部分劳动叫做必要劳动，超出必要劳动的才是无偿为资本家进行的剩余劳动。我们不得不在这里重复政治经济学的ABC，实在是替“革命”频道感到惭愧。总而言之，这个频道从“资本的根本来源是剩余价值”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只追求逻辑上的正确，而不追求理论上的彻底，公然走向了生产工人的工资来源是剩余价值这样“不革命”的结论。可见如果缺乏理论修养，从错误的起点出发，逻辑再正确也只能是无意义的诡辩[7]。

“革命”频道对于生产劳动问题也缺乏研究的态度，开篇第二句话就犯了错误。“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来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情况，这种非生产劳动者一般认为是小生产者，将其界定为小资产阶级，基本没有争议。”这表明革命频道完全不理解生产劳动中的生产是什么意思，认为参与了社会的经济过程就可以叫做生产了，因此小业主也可以适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这个频道不知道，所谓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从是否在物质生产领域直接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因此尽管小生产者也在物质生产领域劳动，但他们不生产剩余价值，不适用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概念。

> *“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26卷第一册，43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革命”频道认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经典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也是一种非生产劳动者，这个错误贯穿了该频道文章的始终。

尾注：

[1]

>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第37卷，1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

> “对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来说，表现为他们各自特有的收入，即利润、地租和工资的三个不同的源泉。它们从下述意义上讲确实是收入的源泉: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汲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资的名义下取得他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取得社会产品中由这部分价值来计量的一个部分，即必要生活资料。其次，它们从下述意义上讲是收入的源泉:资本会把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把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固定在利润的形式上，土地所有权会把另一部分固定在地租的形式上，雇佣劳动会把第三部分固定在工资的形式上，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转化，使它们变成了资本家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但是并没有创造转化为这几个不同范畴的实体本身。相反，这种分配是以这种实体已经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年产品的总价值为前提的，而这个总价值不外就是对象化的社会劳动。”

[3]

文中罗列的非生产领域马克思均提到过。

> “因此，一方面可以说（见科兰等人），一个国家越富，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人数就越多[252]，财富的增长通过贫穷的增长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不依赖于手工劳动的人数相对增加了，尽管工人人数增加了，但是物质上要靠工人的劳动来养活的社会阶层的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增加了（见科兰、西斯蒙第(13)等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生产率直接表现为资本所占有的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或者说，表现为日益增加的利润量，后者是一个价值量。这个价值量不仅是日益增加的量，而且同一价值量体现为大得多的使用价值量。因此，社会收入增加了（撇开工资不说），即社会收入中不再［V—178］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增加了，从而也就是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社会阶层借以维持生活的物质财富增加了。于是社会中从事科学的部分也增加了；同样，从事流通（贸易、金融业务）的人数以及只从事消费的游手好闲的人也增加了；居民中从事服务的部分也是这样。例如，这部分人在英国达到一百万，也就是说，比直接在纺纱厂和织布厂就业的全部工人的人数还要多[253]。在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社会中脱

胎出来时，这部分人口小得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比较发展的阶段上，这种自愿的奴隶制（见魁奈关于仆人的论述[254]）又随着奢侈，财富和炫耀财富的现象的出现而空前地增多起来。工人阶级必须养活这批与工人阶级本身相分离的人，为他们劳动，因为他们自己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军队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4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同上，214页，黑体是我们加的）

[4]

这一点我们在《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文中已经论述过，这里摘引过来：

马克思对家仆的阶级属性这样写道：

“事实上，没有一个阶级会给小资产阶级提供更为卑贱的分子。”（《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马克思看来，受雇于人的家仆是非生产劳动者，是小资产阶级中最为卑贱的部分。其他的非生产劳动者，则是小资产阶级中不那么卑贱的部分：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黑体是我们加的）

不管是否卑贱，非生产劳动者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并且不是小业主那样自食其力的小资产阶级，而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小资产阶级。

[5]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

> 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 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7卷，215页，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6]

> “工人阶级必须养活这批与工人阶级本身相分离的人，为他们劳动，因为他们自己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军队也是这样）。”（*同上，346页*）

[7]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具体看看“革命”频道在文章中是怎么循着“逻辑正确”走向“不革命”的。首先，它断言生产工人的工资根本来源是剩余价值，随后也未对这一点加论证，而我们已经在前面指出这个观点犯了怎样令人震惊的基础性错误。接下来，该频道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用他们所不知道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来叙述，这种引入就是从简单再生产的角度应用这一论断，认为去年的某一生产工人B的工资来自于上一年另一工人C生产的剩余价值。这同样是荒谬的。正确的说法是，当年全体生产工人的工资来自于前一年全体生产工人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价值。这里可以看到，当谈到“生产”尤其是劳动者生活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完全没有资本家什么事，有的只是劳动者的自食其力，这才是无产阶级该说的话。该频道惑于工人的工资是由资本家发给的这一表象，局限于工资这一货币形式，甚至连“劳动力价值”或工人阶级生活资料这样的科学概念都不知使用。它说：“在雇佣工人看来，他受资本的雇佣，并获得工资。”这是在觉悟的雇佣工人看来的吗？这分明是在资本家和站在资本家立场的工人看来的。我们只能说，在雇佣工人看来，他除了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还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在上述理论假设中，“革命”竟然试图用个体工人来代替工人阶级进行分析。“非生产工人A在今年领到的工资来源于生产工人B在去年生产的剩余价值”，尽管措辞不准确，但这是大致正确的，这里A和B分别是各自分属的阶级代表。但是需要指出，非生产工人之所以是非生产工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进行了劳动但又不生产剩余价值。“而生产工人B去年领到的工资实际上来自于生产工人C前年生产的剩余价值”，这里就是无稽之谈了。首先，生产工人B去年的“工资”是前年生产工人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价值，而非剩余价值。其次，所谓去年的工人剥削了前年工人实在是一种不值一驳的论调。工人阶级在不同物质生产部门的分工构成社会劳动的交换，这是一种劳动的等价交换。这种分工决定了不同部门的无产阶级只是交换自己生产的一部分产品而非全部，哪怕是B真的只用了C前一年生产的生活资料，那么C也必定用了B所生产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剥削”。但我们还是可以为“革命”频道提供一个它自己并不知道的理论参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简单在生产的时候谈到了奢侈品的生产。哪怕生产工人B是一个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所生产的产品并不进入自己的生活资料，也可以通过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交换而获得生活资料。这里并不是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的工人C交换，而是同资本家占有的C的剩余价值交换。“革命”频道可以为自己辩护，说生产工人B在这种意义上也占有了工人C生产的剩余价值。我们要回答：是的，但这绝

不会导致两个工人因此划分为两个阶级，因为决定他们阶级划分的不是他们最终用什么方式取得生活资料或者说收入源泉，而是他们本人究竟是否生产剩余价值。《革命》企图从收入源泉的角度对我们的从生产出发的观点进行曲解，而上述例子则恰恰说明了这一企图的破产。从物质上看，代表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产品也是来自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工人的剩余劳动的产物，但前者也生产剩余价值，因此也是生产工人。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

论与《列宁道路》“理论争鸣”的两种声音：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2）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论与《列宁道路》“理论争鸣”的两种声音：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2）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作者按：这篇文章是“论《今朝》与《列宁道路》的‘理论争鸣’（1）”一文的延续。因为加入了关于冒险主义者的讨论，所以修改了标题。

二、革命阶段问题：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列宁道路》竟然在社会性质为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支持“二次革命论”！这使诸多革命左翼大为震惊，并很快在历史中找到了“孟什维克”这个对应物。实际上，“一次革命论”确实符合大多数革命左翼的本能直觉，且笔者之前也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中国已经实现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比百年前远为壮大的“今朝”，中国为什么还得重新经历一遍民主革命才能继续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于情于理，这种假设似乎都不可接受。

直觉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在重新厘清“民主革命”的概念以及分析中国的阶级矛盾形势后，笔者倾向于《列宁道路》的整体判断，尽管对此有局部的保留意见。

首先需要指出，本部分讨论的关于当前革命阶段及其任务的分歧，是奠基于第一部分讨论的阶级分析方法及其结论上的。只要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无论基于数量还是力量，自然会得出无产阶级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基于无产阶级还面临着众多的革命“同路人”——小资产阶级，则会推出革命分阶段进行的结论，无产阶级先领导小资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不过，细究“一次革命论”支持者对《列宁道路》的批评，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出于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理由。《列宁道路》区分了来自“左”面的批评和来自右面的批评：前者的代表是“冒险主义者”（中毛共），认为小资产阶级无关紧要，无产阶级可以抛开他们实现自身的最高纲领；后者的代表则是《今朝》，一方面将相当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即“新小资产阶级”）划入无产阶级范围，另一方面则将许多并没有超出民主革命限度的任务视为社会主义纲领，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二者共同的错误在于以机械的、非本质的标准来理解“民主革命”的意涵。《列宁道路》在《当我们说“民主革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一文中已经对若干要点进行了清晰的回应，但是，仍然有一系列基本概念的混淆或误读导致了批评声音对《列宁道路》主张的不当推论。因此，有必要首先澄清这些问题，使得中国革命左派在基本问题上尽可能达成共识，避免那些无谓的、鸡同鸭讲般的争论。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如下问题：（1）民主革命产生于什么历史阶段？它反对的是什么？（2）民主革命的阶级动力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有何区别？（3）哪些革命任务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4）无

产阶级的主观力量（组织程度、阶级意识）与革命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如何?

1、民主革命产生的历史阶段

在我们讨论“民主革命”时，首先要注意到，它是通过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来讨论的。民主革命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高度，或者说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界限，却能够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组织和思想准备的有利条件，使资本主义从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相对不利的形式转化为相对有利的形式。概而言之，从经济基础来看，民主革命意味着资本主义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受到了保守的统治阶级或集团之垄断的限制；从上层建筑来看，“不民主”的国家机器更加阻碍了被压迫阶级自我组织的合法性，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相比更难开展活动，从而相对滞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矛盾发展水平所预期的阶级斗争水平。

但是，由于历史总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交错中发展，阶段性的关系不等于时间性顺序，即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某个时期。认为民主革命仅仅属于早期资本主义，实际上暗含了一种线性历史发展的假设：从“前资本主义”的专制走向资产阶级民主。例如，《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下文简称《斗争报》）转载的文章《为什么机会主义者要把资产阶级的白纸说成红旗》最为清晰地暴露了这样的倾向：

> “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指出工人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展，主张首先以民主革命扫清封建残余。‘列宁道路’则处处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今天实行‘清零’政策的中国专制政府，等同于俄国民主革命中的沙皇政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主买办。……他们将防疫政策、专制制度归因于竭泽而渔式的经济动机，并说这是‘非资本主义的’，是‘前资本主义残余’。”

文章还发出连珠炮式的质问：

> “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自它一百多年前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后，从1919年到1949年，有没有经历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有没有用彻底的民主革命扫清过封建的生产关系？文革失败后，复辟的生产关系究竟是封建性质（也就是‘列宁道路’含糊其词的‘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今日中国的专制和垄断，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列宁道路’不敢去深究这些问题，因为维持并散布‘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专制就等于二月革命前的俄国农奴主专制’这样一个模糊的错误印象最有利于他们的主张！”

如此炮制别人观点的能力让人惊叹。笔者翻遍《列宁道路》的文章，没有找到它声称特色专制政府具有“前资本主义”的残余或封建性质的证据。《列宁道路》显然认为当前中国是帝国主义（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含糊其辞”。反而那些冒险主义者凭借机械的阶段论框架对列宁道路进行“投射”——看到民主就想到资本主义，看到专制就想到前资本主义。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粗暴歪曲。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来看，这种“残余”都并不专属于“前资本主义”。

《列宁道路》将当前的中国与列宁年代的俄国类比，其共同点在于“专制的帝国主义”。显然，二者在经济基础或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不可同日而语，“专制”的国家机器的精密程度也是今非昔比。但是，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发展的阶段，还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有可能与专制制度结合，只不过掌控整个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有所不同。二者真正的相似性，即民主革命作为

通向社会主义革命之预备阶段的理由，在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关系：通过政治革命解除上层建筑的额外阻碍才能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创造空间。

（1）专制制度产生的不同历史条件

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形势，以及特定地区的社会在其中所处的结构位置，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方面可以采取非常多不同的形式。议会民主虽然是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但绝不是唯一的类型。我们先预支一些后文的结论。首先，资本主义可以在专制或半专制的国家机器保护下实现早期的发展。既可能是没有发生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可能是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复辟。例如，法国大革命后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经历了几次复辟，德国则在俾斯麦政体的庇护下成长为帝国主义。其次，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民主也不一定稳定，可能转化为新的“专制”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明证。对于起步较晚、发展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包括比较落后的帝国主义（俄国），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变动会更加复杂，可能是君主专制、政教合一、威权式新自由主义或一党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对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而言反而更是常态。资本主义可以渗透到古老的专制政权，例如沙俄。在经历了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其成果可能被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攫取，形成了新的专制政权，例如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印尼、智利、韩国的军事独裁政权，或者法农笔下描述过的非洲后殖民国家。还有目前的中、俄这样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后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盗用无产阶级专政所需的全套国家机器的新式“黑帮专制政府”。《斗争报》对此正确地指出：“能够维持民主制是统治阶级强大的表现，这意味着他们已在被统治者中收买了足够的人，国内阶级矛盾已极大转移，无产阶级的反抗已撼动不了资本主义。专制则是统治阶级无能、阶级矛盾激烈的表现”。

因此，说专制制度属于“前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它等于“封建主义”更是大谬（后文会展开这个问题）。“非资本主义”这一说法也只是消极地表明了（专制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结合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在具体的阶级矛盾形势中寻找专制与民主之变动的根源，而不是像《斗争报》与《今朝》那样急于将“专制制度”打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

专制的上层建筑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这使民主革命的目标不仅具有政治内容，也具有经济内容。例如，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是农奴主—地主阶级，德意志帝国的是容克地主阶级，纳粹德国的是金融资产阶级，中华民国和许多（后）殖民国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的统治阶级是特色党的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它们处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从不发达到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同位置（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着不同的起源（由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转型而来，在资本主义向垄断发展中产生，或从社会主义官僚中蜕变而来），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共性。首先，这些统治阶级是非生产性的食利者阶级，其利润可以来源于地租、赋税、剪息票、核心产业垄断（例如石油、电力、金属、铁路）等不同形式，从生产部门转移剩余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中细分出黑帮统治者和它的拥护者大资产阶级。二者的差异在于，黑帮具有更高的非生产属性和垄断地位，形式上借助经济垄断，实际上通过国家机器直接保障以进行强制，拥有地租、赋税、金融、核心产业等向全社会掠夺财富的手段。因此，它们不等于（工商业）资产阶级，而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保守的部分。这些非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虽然会从资本主义中不断生长出来，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部分，有可能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民主革命大为减轻。最后，它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使无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小资产阶级乃至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处境恶化，从而使得阶级矛盾特别尖锐。

既然同一类统治阶级既有可能采取民主也可能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专制制度：它不等于某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表明了统治基础的狭隘性。正如列宁所说，旧沙皇政权“仅仅代表一小撮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的农奴主－地主”（《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50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从专制、半专制到形式民主的资本主义政体，例如从沙皇黑帮专制到“六三政体”再到临时政府，统治阶级的内核可能没有实质改变，但其外延发生了扩展，也就是说，政治权利从资产阶级社会最保守部分的特权逐渐向一般的资产阶级开放。之所以形式民主可以不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是因为这些阶级的实际政治权力是逐级递减的。值得提一句的是，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通过国家机器的保障来使被统治者消极地服从，专制制度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更积极的“群众基础”，从资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甚至流氓无产阶级。例如，衰落的小农是路易·波拿巴夺权的主要支持者，不开化的农民曾经是沙皇统治的基础，破落的小资产阶级成为了冲锋队、黑衫军的主力，成为了法西斯主义上台的推手——尽管在法西斯政党与原来的垄断资产阶级妥协后被抛弃了。

那么，专制和民主的资本主义环境对于无产阶级是否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诚然，资产阶级民主并不能改善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处境，但相比于专制国家，无产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空间扩大了。在专制制度下，无产阶级被剥夺了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等政治自由，只能在非法条件或极其不利的合法条件（例如地方自治机关、国家杜马）下斗争，因国家机器的频繁镇压，即使是超越手工业水平的先锋队政党也很难扩大其基层组织和影响。推翻政治上的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打碎旧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的初步准备。

对此，《斗争报》认为：“立宪制相对封建专制的进步，只在于它让资本主义能自由发展。而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在立宪国家所能获得的一切发展条件，在资产阶级专制国家同样存在，二者根本无所谓谁在‘历史上更进步’。”这个判断对于考察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组织发展的条件而言，实在是太抽象。然后这位作者突然想起，除了封建专制以外还有资产阶级专制，于是把《列宁道路》的罪名，从胡说中特政府具有封建专制残余，又改换成“把列宁所特指的沙俄农奴主专制，偷换成性质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专制”，把“专制/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斗争开展条件而言具体的先进与落后抽象掉了。

（2）民主革命“扫除”专制制度的不同历史意义

所以，我们不能像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那样，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民主革命扫除阻碍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的障碍”这一公式。首先，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东西不仅是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地主阶级），也可以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垄断资产阶级）或只与部分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东西（殖民主义）。其次，如果仅从生产力的层面来看，专制制度在一定阶段内可能促进其发展，之后又成为发展的阻碍。最后，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言有意义的“发展”不是进步主义空洞的发展，而是工人阶级革命意识及其组织的历史性发展，矛盾的爆发首先导向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其结果才是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就有三类专制制度发生的情形，相应的民主革命包含不同的内容，对于“发展”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

第一种情况是不发达、不开展的资本主义，这个时候已经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力量，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制约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这里，“前资本主义”的残余，即《今朝》所指出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土地问题），在先发和后发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参见《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驳《列宁道路》的民主革命论》。）实际上，我们一般是在广义上使用“封建制度”一词，指代各种依靠土地所有权剥削依附农民的劳动的生产方式。对于欧洲国家以及日本而言，专制制度的巅峰出现在狭义的封建主义（领主土地所有制）垂死挣扎的阶段，一般称为“绝对主义”。但对于除日本外的东方国家（例如中国）而言，不存在狭义的封建主义，只是有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专制国家往往正是最大的地主。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则兼具领土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征，按列宁的说法，是“半亚细亚的”，统治阶级被称为“农奴主—地主”。从西到东，前资本主义残余的顽固性总体上是增加的。

在这个阶段，民主革命确实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具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民主革命失败或半失败的情况下，不是说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相比于民主革命而言更迟缓、不充分、痛苦。正如列宁对于“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的对比：

>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我们应该支持的不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而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前一种演进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保留盘剥制和农奴制（按照资产阶级方式加以改造了的农奴制），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缓慢、资本主义的发展放慢速度，意味着广大农民群众，自然还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痛苦、剥削和压迫。后一种演进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最为迅速，意味着农民群众获得最好的（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可能的范围内）生活条件。”（《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反过来，“美国式道路”也意味着更快地耗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革命性，革命窗口期会随着农业转型而衰减。当大量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就会进入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介于不发达与发达之间的资本主义，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残余，或者至少得到了形式上的、不彻底的解决，工业在另一种专制制度庇护下迅速发展（除非因战乱等原因不发展，例如从独立运动到二战期间的巴尔干半岛、后殖民的非洲），它同时在政治领域和生产领域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夺和控制。无论是在专制制度下还是在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选举、结社、罢工等）都处于被剥夺的状态。早期的工业快速发展阶段也正是无产阶级受到最野蛮剥削压迫的阶段——恰恰是“血汗工厂”制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在生产领域存在两种对无产阶级进行专制的方式：既可能通过国家对市场运作的放任，通过“失业=饿死”的经济必然性，也可能通过国家官僚对生产机构的控制，迫使工人屈服于资本家的无限权力、接受严酷的工作条件。因此，工人反抗资本，不仅反对经济剥削，也反对政治压迫。

“市场专制主义”可以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民主政体并存，这一般出现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19世纪英国纺织业就是典型案例。马克思指出：

>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当然，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利的内外条件导致专制政府相比于议会民主，在某些时期内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强劲的动力（“赶超型经济”）——它可以与“市场专制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或“官僚专制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政体相配合。这可能发生在二三流的帝国主义（例如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斯托雷平时期的俄国、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萨拉查时期的葡萄牙），也可能发生在殖民和后殖民状态下的新兴资本主义（例如被瓜分后的波兰、二战后的“反共堡垒”——韩国、台湾、印尼、南非、拉美国家），还可能发生在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早期资本主义（东欧、中国、越南）。《今朝》和《斗争报》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与沙皇专制相反，非但没有阻碍，反而主动促进、引导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的限度内发展。这种判断直至2010年左右确实成立，但其合理性已经随着中国步入帝国主义、经济增长放缓、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逐渐消解。

这个时期爆发的民主革命往往实际上有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的推动，工人运动的要求以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的经济诉求与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诉求（工联主义）为代表，试图打破资产阶级社会将无产阶级排除在市民社会外的“专制”。从英国的宪章运动、韩国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系列工人运动，都属这一性质。阶级斗争形势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十字路口：如果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基本的民主诉求暂时得到满足，可能走向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尽管其中也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当矛盾无法在议会民主框架内解决时，可能急剧左转（社会主义革命）或右转（法团主义的军事独裁）。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往往称为“民主化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从“粗放积累”阶段向“密集积累”阶段转化，也就是向垄断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转化。从阶级构成来看，这意味着农业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产业工人的比例不再上升，来自服务业、职员等新小资产阶级在这一阶段的革命性会随着向帝国主义转化而衰减，进入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不在于其它因素导致的“不充分”，而在于它自身矛盾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同时也引发了政治合法性危机。我们知道，帝国主义会通过资本输出来转移和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特别是通过超额利润来收买国内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职员等新小资产阶级）和一小部分工人阶级（即“工人贵族”）。但是，资本主义的密集积累仍然会加深对多数工人阶级的剥削，恶化殖民地人民和国内小资产阶级的处境。特别是在殖民地瓜分殆尽而不得不重新瓜分、利润率下降乃至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向专制转化、强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乃至直接诉诸暴力镇压是统治阶级应对危机的饮鸠止渴式的回应。德意日法西斯政权、“苏修”政权和当前的中俄专制政府皆是如此。

在这里，民主革命的目的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是终结它的畸形发展，也就是说剥夺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但并没能消灭资本主义）。正如前文所指出，垄断资产阶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成分，有可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对象。包括非生产劳动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必然支持民主革命，必然反对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只能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起来，这都是只有通过领导民主革命才能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原因。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中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就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和部分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从实践来看，包含资产阶级的“阵线”显然是不稳定的，但“人民阵线”的教训在于在资产阶级面前放弃领导权，而不在于参加民主革命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城乡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三种情况可能同时发生。例如沙皇时期的俄

国，既有着深重的前资本主义残余（农奴制）和民族压迫，又依靠国家投资和国外贷款进行快速工业化，跻身帝国主义行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的复杂社会结构与具有封建农奴制基础的绝对主义国家，导致俄国的民主革命同时具有前两类情况的特征——一方面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工人运动。

（3）专制制度与民主革命的其它内容

殖民主义的历史贯穿了资本主义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各阶段，也使民主革命的内容更加丰富。一种情况是，殖民者的力量不足以摧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原有的政治组织（从国家到部落），仍需要借助当地的代理人来间接统治，或者殖民者建立了不稳定的直接统治，并在二战后纷纷从殖民帝国中独立。对于这些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是民族自决权问题，即殖民地独立；革命的对象除了“前资本主义”残余以外还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甚至在殖民地独立后，殖民主义的残余仍然以各种“后殖民”的变形而存在：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帝国主义，从殖民者手中收归“国有”的资产则装入了“国族资产阶级”的腰包，后者取代了前者继续在国内进行专制统治，在极端情形下（例如马西埃统治的赤道几内亚、杜瓦利埃统治的海地），专制统治者几乎支配了全国所有的财产，并且能任意杀死反对者。

另一种情况发生在殖民者在海外新建的国家，它们夷平了殖民地原有的政治组织甚至消灭了原有的居民，使得他们难以在赶走殖民者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这些国家基本不存在“前资本主义”残余，社会构成非常复杂，又根据种族主义形成了清晰的等级序列。处于统治地位的是欧洲殖民者，“欧洲人”又比“土生崽”（即早期殖民者在殖民地上的后代）更高级。美国、拉美、南非的“独立运动”实际上是后者对前者的胜利。这些“独立运动”对殖民地民主革命的真正力量采取了一致的反革命态度。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从高到低依次有三类群体：混血儿，根据血统成分来区分高低；殖民者从异地引来的奴工，最典型的就是黑奴；最后是原住民，遭到大规模屠杀、驱逐或同化。由这些被压迫群体发动的民主革命主要针对两类问题：种族隔离问题、原住民问题。种族隔离问题在美国南部、南非和当今的以色列非常突出，非白人族裔在空间上被分隔管理，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遭受歧视性待遇；相比之下，在混血程度非常高的拉美，实质上的不平等并不会通过种族隔离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废除种族隔离、实现种族平权，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黑人运动，南非的非国大，仍然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属性。只不过这些运动最终被白人资产阶级所镇压或与之妥协，只是赢得了形式平等的政治权利，实质上的种族压迫仍然存在。原住民问题与种族隔离问题有所交叉，但也有独特的内容。原住民的斗争目标包括“收复失地”、拒绝强制同化和“保留地”政策，更不用说反对种族灭绝了。在澳洲、拉美、北美都有这样的运动。由于这些受种族主义压迫的群体中大多数是无产阶级或失地农民，种族平等的诉求又与土地或劳工方面的诉求联系在一起，并具有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潜力（例如黑豹党）。在当代，还有一个特殊的殖民案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在以色列境内是半种族隔离，在约旦河西岸是殖民统治，在加沙地带则是种族灭绝。尽管我们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解决方案，但哈马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革命诉求，至少远胜于已沦为汪伪政权性质的巴解组织。

除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海外殖民帝国外，还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帝国，包括俄国、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如果内部的民族关系紧张，被压迫的民族也会产生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分别将其表达为沙文主义和分离主义，强调民族矛盾而淡化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则要求在消除民

族压迫的基础上实现各国无产阶级的联邦。然而，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难以向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证明自己克服了沙文主义，后者可能会在民族问题上追随本国资产阶级，例如在波兰；前者只有通过帮助后者消灭资产阶级或“前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才能赢得后者的信任。因此，民族问题并没有随着旧帝国解体而消失，而是延续到新建的资产阶级政权（包括复辟政权），例如苏联/俄罗斯对加盟共和国，中特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在中俄两国，修正主义复辟意味着不再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将不同民族的劳动者平等地团结起来，主体民族的统治阶级就会转向以沙文主义的方式来对抗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趋势，而后者往往从敌对的帝国主义势力处寻求支持，这给这些民族的民主革命设下了两难困境。此外，沙文主义的迷惑性在于，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政治控制（陈全国式“警察国家”）与文化同化（禁止教学民族语言）的同时，重金支持这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如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营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与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南方政策之间的虚假连续性。沙文主义甚至感染了一大批所谓的“左派人士”，他们片面地强调“西方”的帝国主义挑动少数民族分离运动，而有意遮掩了本国专制政府的民族压迫。有一位在斗争坚定性上无可挑剔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甚至表示反对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因为苏联曾使外蒙古独立！对此应该回答：错的不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而是“左派人士”所感染的沙文主义。

我们还必须指出，由于妇女同时受到政治领域（受限的政治权利和代表性）、生产领域（就业和收入歧视）和家庭再生产领域（无偿的再生产劳动）以及其它形式（性侵犯和暴力）的专制，民主革命也具有鲜明的性别内容。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转引傅立叶的著名论断：“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且她们在革命下行过程中首先被打击，以至还要重新争取她们最基本的权利。在中世纪晚期的反封建斗争中，妇女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激起了统治阶级的“猎巫”运动。把底层女性禁锢于家庭、收买底层男性，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环节。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人人生而平等”的法律最初也不包括妇女（以及有色人种），她们还得重新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妇女在政治和工作领域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地位，她们仍然受困于家庭再生产。正如列宁所说：

> “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家务都压在她们肩上。这种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事实上，男性党员往往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消极、倒退的态度，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因此，资本主义并非与性别平等在理论上不相容，只是资产阶级能够利用父权制来保持私有制的统治地位，所以与之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未能解除妇女的双重奴役地位，也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妇女运动具有的民主革命属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无关，只取决于性别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实现。

总之，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来看，民主革命可以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也包含着不同的革命内容，并像《今朝》那样认为仅限于土地革命。既然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同样不能如此僵化地理解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阶段性意涵在于，它处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保守、狭隘形式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彻底的但却是必要的过渡性位置。正如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

家机器是为了改造生产关系（消灭私有制），民主革命打破专制的上层建筑是为生产关系的初步变革创造空间——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资产主义生产关系，却为壮大无产阶级力量、以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做了准备。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

论与《列宁道路》“理论争鸣”的两种声音：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3）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论与《列宁道路》“理论争鸣”的两种声音：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3）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编者按：这篇读者来稿讨论了民主革命的阶级力量构成，指出民主革命会不会达到广大的规模和彻底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小资产阶级能否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而资产阶级必然退出这样激进化的民主革命。我们同意这样的分析，并且认为熟悉《两种策略》等著作的同志应该都同意这样的分析。那种将民主革命与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和《两种策略》所批评的孟什维克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孟什维克也认为民主革命等于支持自由派，但由于看到了民主革命本身客观上难以否定，因此只能否定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认为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自由派资产阶级来领导；那种认为在今天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等于支持自由派的思维方式，从不能支持自由派出发，否定了民主革命本身。我们肯定作者的如下结论：民主革命和支持自由派没有关系，反而意味着与自由派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列宁还曾指出，为了争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并提出彻底民主主义的纲领去激发小资产阶级以暴力方式实现自身诉求——组织起来正是今天觉悟者应该做的事，要与工人接近并互相接近。

这篇读者来稿为了说明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民主革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区分了狭义的与广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见“（2）告别革命：资产阶级的角色”第二自然段）。作者提出狭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革命，广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于民主革命，即不超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界限的革命——因此必然存在着狭义范围之外、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认为，或许这样的划分是不必要的，无须为了说服那种将民主革命等同于支持自由派的思维方式而费这样的周折。经典意义上，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即不超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的革命，和作者解释的广义资产阶级革命的含义一致。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民主革命；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哪怕资产阶级退出了这个革命也仍然如此。

这篇读者来稿还分析了一个常被谈及的问题：是不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在内，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也必然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美、英等国是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作者在“（3）小资产阶级与‘革命民主专政’的关联”一节的第四段中作了如下回答：“但在某些例外中，使得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的金融危机也可能造成民主革命的条件，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在我们看来，作者指出的例外情况其实是多数情况。“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是近二十年美国阶级斗争的低谷，而是斗争的高潮，而在这样的高潮中，得到广泛支持的“99%反对1%”的口号也显然是民主主义的。即便是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高潮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在美国，和在今日中国一样，也需要觉悟者和工人接近并互相接近，形成有组织的

工人力量去领导小资产阶级用暴力方式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这样才能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门。而这一切的起点，在列宁看来，是创办一份能够稳定送达工人手中的报纸。概括来讲，我们认为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主观力量有待发展的国家的一般道路，即使中、美这样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今天也是这样；在主观力量已有较好准备的情况下，哪怕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例如在1956年的中国就是如此；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发展程度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讨论民主革命问题的现实意义何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一般的历史时期都掌握着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要夺取这一领导权，就需要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并提出科学精确的纲领。在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的过程中，需要工人小组、各革命派别的互相接近、能够送达工人积极分子的政治报、实质建党、对工人进行工业化的政治教育和组织等工作。在1905年与孟什维克进行关于是否领导民主革命的争论时，列宁曾指出：工人阶级有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两种策略”的争论是要不要使用这种力量的争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力量，而关于民主革命的讨论应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组织起这种力量的迫切性。

我们收到这篇稿件的日期是2024年3月28日，作者因此无从得知近日读者群里的讨论。

作者按：这篇文章是“论《今朝》与《列宁道路》的‘理论争鸣’（1）”和“论与《列宁道路》‘理论争鸣’的两种声音：冒险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2）”两文的延续。因为加入了关于冒险主义者的讨论，所以修改了标题。

二、革命阶段问题：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2、民主革命的力量构成

如果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序从绝对化到相对化，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确定接下来将爆发的革命的性质？革命必须有特定的阶级主体。因此，革命性质首先取决于阶级结构，更具体地说，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情况——谁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哪些力量在特定阶段能够成为同盟军，谁是不可靠的“骑墙派”或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它们的力量如何随着阶级矛盾运动此消彼长。

（1）民主革命中的主要阶级力量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而言，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显然的。资产阶级革命意味着（工商业）资产阶级推翻了比它更保守的阶级，例如封建地主、专制官僚或垄断资产阶级，自身成为统治阶级，此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所以小资产阶级只能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走，尽管后者只能有限地满足前者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迫使小资产阶级跟在自己后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尽管这必然会触及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利益。

那么，“民主革命”呢？从这个表述本身，我们应该意识到它的模糊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追求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尽管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程度的彻底性。按理来说，民主制度最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能够单纯凭借数量占据优势，而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民主”都必须配套对其阶级敌人的“专政”。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

的光谱，以至于无法照猫画虎地认为它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为处在资本和劳动两极过渡带的小资产阶级很难具备独立领导革命的能力。这不是说没有建立过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而是说这些政权很难稳定存在，很容易向其中一端滑移，要么回落到中等资产阶级乃至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要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垫脚石。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专政是小资产阶级性质，是很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式，但由于后期丧失了无套裤汉（城市贫民，属底层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支持而很快崩溃，逐步被工商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攫取革命成果。在中国，民主革命最初的领导者，即孙中山的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它取得的成果非常不彻底、不稳定，不久就落入官僚资产阶级囊中，直到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毛主席的共产党争取到对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战胜了堕落为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才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前进。

根据上述讨论，并结合上一篇文章中对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界定，我们可以区分出民主革命中的主要阶级力量：1、极少数的黑帮统治者（封建地主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等），以国家机器进行超经济强制为主要手段来掠夺全社会的剩余价值；2、作为专制制度拥护者的大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等），以非生产的方式从生产部门转移剩余价值；3、作为专制统治者“御用反对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生产部门直接剥削剩余价值；4、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小业主这样的小生产者，和非生产性雇佣劳动者这样的“新小资产阶级”，劳动但不创造剩余价值；5、作为最彻底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是唯一生产剩余价值的阶级。

《列宁道路》之所以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革命与当今中国可能爆发的革命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相提并论，不是因为两种形势下上述力量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或阶级矛盾，而是因为这些矛盾具有相似的关系模式。在沙俄，它们的代表分别是封建地主阶级（沙皇黑帮）、十月党、立宪民主党、以农民为主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劳动派）、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在当前的中国，则可以划分为中特黑帮（包括国家机器和国企）、垄断性的民营企业主、中小企业主、小资产阶级（传统的小业主和新兴的非生产劳动者）、无产阶级。相比于存在“前资本主义残余”或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的阶级关系是相对简化的。以1848年时期的法国为例：封建地主阶级在大革命中被打倒，正统派（地主资产阶级）和奥尔良派（金融资产阶级）相当于俄国的十月党，共和派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山岳党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的组织还在形成当中。由于专制统治者倒台、小资产阶级青黄不接，阶级斗争才会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各阶级的关系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反动的力量更加强大，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它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三座大山”，无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弱小，陷入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不过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革命动力比非殖民地国家更强，甚至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可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这几个阶级希望使民主革命的结果停留在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水平。首先，专制制度，也就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失败，符合各种黑帮统治者的利益。这是1905年前沙俄的情形。其次，“半专制”或民主革命“半失败”的结果，最符合大资产阶级即比自由派更右的保守派的利益。这是斯托雷平时期的情形，在“六三政体”下存在黑帮—十月党和十月党—立宪民主党两个多数。第三，议会民主，也就是民主革命终结为资产阶级革命，最符合一般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即自由派的利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正

是这种情形。第四，民主革命本身最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彻底形式“革命民主专政”则与半无产化的小资产阶级相应。其典型是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中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最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根本地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以最终消灭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仅仅在城市初步实现，处于民主革命中的农村还要更长时间才能开始社会主义改造。

可见，在民主革命涉及的各阶级力量中间，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及反动的黑帮和保守派，大家异议不大。而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有一定的历史可变性，在左翼内部存在很多争议。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分析这两个阶级扮演的角色。

（2）告别革命：资产阶级的角色

资产阶级之所以在最低限度上允许民主革命的发生，是因为还存在更保守的力量——专制制度，使黑帮集团凭借超经济强制获得超额利润。也就是说，一般资产阶级要求分享仅仅由只构成资产阶级一小部分上层的黑帮所独占的利益。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追求的目标是停留在能实现自身利益的“自由”（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的自由，根据资本占有量换取统治资格的自由）的程度，而不让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享或挑战这种自由。如果没有专制制度的阻碍，垄断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与一般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表现上的质的区别就降为量的差异。例如，1848年法国革命后，原来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都一时间成为了“共和主义者”。资产阶级实现这种自私的“自由”，意味着他们彻底退出民主革命，转向反革命。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不等于民主革命，我们必须澄清这样的混淆。混淆的原因在于人们在两种意义上谈论资产阶级革命。广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意味着革命达到的成果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畴，它大体上相当于本文所界定的“民主革命”，包含了各种从资本主义统治的狭隘形式扩展到广泛形式的运动。狭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意味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或者说革命的结果停留在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程度。这样看来，狭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是民主革命被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而下行的结果，彻底的民主革命（即“人民民主专政”）是广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上限。

但现实中的资产阶级并非始终希望“借力”民主革命达到（狭义）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有时甚至希望停留在更低的半专制水平，这取决于资产阶级力量和构成的差异，也就是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大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比例。从历史渊源来看，在“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有着较强的“市民社会”传统，即城镇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更有可能使民主革命在相当时期内稳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议会民主）；相反，如果“市民社会”弱小，淹没在分散孤立的农民的汪洋大海中，资产阶级更可能转向地产或金融等非生产属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的庇护下发展，导致民主革命的失败或半失败。从地域来看，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的纲领所指出，“越往东，资产阶级越软弱”。在这里，“越往东”意味着国家越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例如从德国、俄国到中国再到非洲。由于不具备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争夺中的优势，落后国家的阶级矛盾也特别尖锐，不仅无处转移，反而成为前者的转移对象。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很难独立统治，在议会民主政体中非但不能取得实质的支配地位，反而会使“民主”成为阶级斗争的火药桶，因而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官僚的力量，依附于专制制度。国家一方面能提供投资资金、贸易保护等经济支持，另一方面能够履行维稳职能，镇压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可以说，“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中制成为了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性发展动力。

当然，上文也指出，在介于不发达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不利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也可能为专制制度招魂，以寻求贸易保护和镇压群众运动。

尽管专制制度确实会给资产阶级的“自由”造成一定限制，由于害怕失去国家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更不敢坚决地推动民主革命，更早转向反动。民主革命在初期带来了一些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成果，使他们默许了革命的发生，但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希望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就开始了他们阳奉阴违的表演，正如列宁在一系列评论中揭露的那样，一边把自己打造成民主派来吸引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做自己的尾巴，另一方面则与专制制度媾和，严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力量。在自身权力无忧的理想情况下，他们希望民主革命终结于资产阶级革命，即议会民主，不希望再推进到“人民民主专政”。但“半失败”的结局也是他们能够接受，在不利条件下甚至更愿意接受的，例如，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终结为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波拿巴政体，德国终结为容克地主主导的俾斯麦政体，在沙俄终结为地主—资本家主导的斯托雷平政体，在中国终结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非洲殖民地国家终结为国族资产阶级主导的后殖民政体。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统治的纯粹形式，例如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魏玛共和国、临时政府或“联合政府”，都是不稳定的。

这些规律不仅对于19-20世纪的民主革命成立，对于自中世纪晚期起“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反封建斗争而言同样如此。我们可以参见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精彩论述。中世纪城市主要分为三个集团：城市贵族、市民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恩格斯指出，市民反对派起到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立宪派”（即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叛卖性作用。由于无产阶级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摆脱封建行会的束缚，平民反对派往往只能做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是当时最受剥削、数量也最庞大的阶级，只有在农民战争的感染下，平民反对派才成为党派。农民和平民团结在革命派中，在其政治代表闵采尔的理论中已表达出共产主义思想，不顾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温和派的动摇倒戈，向保守的天主教阵营发起了相当彻底的民主革命攻势。因此恩格斯指出：

> “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发现平民和农民的革命性比自己委身于贵族、放弃政治自治权更加危险。另外我们还应指出，妇女在这些民主革命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也因此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沦为形同家奴的地位。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反封建斗争的唯一可能性，而是更激进的民主革命，即**“农民战争”**、**“平民革命”**以及**“妇女革命”**被镇压的结果，是市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合谋的结果，这些失败者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耗材。

这就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资产阶级不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最多只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内接受（更精确地说，窃取）民主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革命的威胁倒逼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甚至连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都未必能达到。因此，资产阶级**“领导”**的从来不是革命，而是**“告别革命”**。小资产阶级可能积极参与民主革命，但不能领导它。只有受到最深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取代资产阶级来“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

（3）小资产阶级与“革命民主专政”的关联

资产阶级的参与与否最多只能影响民主革命的阻力大小，并不决定它的动力。正如列宁所说：

>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今天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主体不再是农民，而是非生产劳动者和小业主——引者注）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谁就不会说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12节“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8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在专制制度下，资产阶级在“告别革命”前多少能迈出一步或半步；在议会民主下，资产阶级或者寸步难行，或者开起倒车。但两种情况下，只要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民主革命动力，并且愿意跟随无产阶级一同前进，民主革命仍然能够推进下去，甚至更快、更彻底地推进。

需要指出，没有专制制度不等于没有民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下的阶级矛盾也有很大差异，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革命以外，也可能存在民主革命的条件。只有在那些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占据稳定优势的帝国主义，例如美国、英国，才能长期通过超额利润收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维持稳定的议会民主政体。这种条件下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反无产阶级的“神圣同盟”，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独立完成革命来推翻它。但在某些例外中，使得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的金融危机也可能造成民主革命的条件，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具有这样的性质。而在那些介于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资本输出严重受阻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更难以实现上述收买，阶级矛盾尤为激烈。这种情况下的议会民主往往是不久前的民主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压力下不得不抬出议会民主作为减压阀，但随时又准备依附更保守的力量，以将他们从议会中赶出去，甚至取消议会民主。从纳粹党掌权、西班牙内战、奥地利内战，到东南亚、拉美国家的一系列军事政变，都源于这种不稳定的议会民主。这些事件中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保卫民主”、反法西斯主义或反独裁的防御性斗争，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性质。如果某些议会民主的国家并没有消除“前资本主义”残余，在社会主义革命前也需要经过民主革命阶段。例如在印度，至今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成为了印共毛发动农民战争的主要阶级动力。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专制制度是民主革命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鉴于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复杂流变，他们的革命程度可能有着较大不确定性，取决于具体的受压迫程度和自身的兴衰。对于农民而言，民主革命的动力与土地问题直接相关。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影响下来反对“前资本主义”残余，他们往往会把对土地的诉求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在俄国是社会革命党，在格鲁吉亚则是孟什维克。但如果土地革命早于工人运动而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就更倾向于反对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倒向新的半专制制度：既要共和国，也要皇帝，也就是说，选出一个垂直支配他们的主子。在法国大革命打倒封建贵族后，农民成为了两个波拿巴政体的支柱；在巴尔干独立运动赶走奥斯曼地主后，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的农民政党在君主立宪制下蓬勃发展，甚至发起了与共产国际对垒的“绿色国际”。不过，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下，农民即使不倾向于社会主义，也具有更高的民主革命动力。随着多数农民在资本主义排挤下半无产化乃至无产化，他们也会重新表达出民主革命的诉求，例如失地农民运动、反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生态运动。城市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业主，除了在“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城市以外，很少能够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小资产阶级会

成为数量上不亚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他们作为非生产性的雇佣劳动者，虽然从生产部门分享到少量剩余价值，但自身处境也因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而恶化，其中不少人会自我认同为“工人阶级”，倾向于社会主义，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分子。新小资产阶级正是《今朝》之论断的阶级基础。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会将无产阶级的利益限制在民主主义的水平。但他们仍然可能参加民主革命，例如德国工会领袖卡尔·列金曾领导反对卡普暴动的总罢工。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诉求，毕竟和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一般只有在存在专制制度压迫或复辟威胁、或者面临生计危机时，小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才能和无产阶级形成合力，使民主革命通向更为彻底的形式，也就是“革命民主专政”。这意味着什么样的阶级关系？

第一，这表明了民主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无产阶级还不能独自夺取政权，还需要借助小资产阶级同盟的力量，这有助于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无产阶级在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单独夺取政权，会面临着其他一切阶级的反对或孤立而失败：1848年法国的六月起义、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左”倾路线就是明证。革命民主专政意味着得到数量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支持，从而在消灭专制制度的同时也可以孤立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丧失权力后，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大为削弱。当社会主义革命触及小资产阶级利益时，由于没有资产阶级作为靠山，对他们的改造带来的反革命风险是较小的。

第二，这表明了小资产阶级有条件的革命性：民主革命也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站在革命的一方。《列宁道路》和冒险主义者都指出了《今朝》的错误——把多数小资产阶级划入“社会主义派”的行列（《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民主专政的实现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利益实现的顶点，也是他们革命性的顶点。而且，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激发”下，才成为彻底的、有组织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就像德国农民战争激发的平民反对派），推动革命上行到这一水平。此时小资产阶级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帜，但他们对此的理解并不能超出自身的阶级局限。

《斗争报》则倾向于贬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动力。该作者将民主主义斗争视为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认为应该“支持他们反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斗争，同时既指出民主主义的幻想必然破产，又不指望他们能够转到我们这边”。他们反抗的首先是专制制度，在这方面可以相当彻底，其次才是反对资产阶级，这方面是不彻底的。无产阶级当然不指望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能像《今朝》设想的那样“转到我们这边”，只是希望充分利用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性。

第三，这说明了民主革命与狭义资产阶级革命的鸿沟：资产阶级已经退出革命，他们和专制制度的统治者一样，也要成为专政对象。无产阶级应该参与（并且领导）革命民主政权，但不应该参与资产阶级政权。正如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与米勒兰、屠拉梯等人的“入阁”是完全不同的。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提供的合法政治舞台，即使小资产阶级政党成功组阁，无产阶级政党加入其中也只能实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政客也终究逃不出资产阶级利益设定的范围。只有割断了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有机联系，前者才能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军。

这一部分揭示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与其可能结果之间的关联。民主革命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目标出发，通向不同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三种主要力量意味着三个基本阶段：第一级台阶是资产阶级革命，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获胜，或资产阶级与专

制制度妥协媾和的结局相当于半级台阶）；第二级台阶是劳动人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消灭专制制度、限制资产阶级以满足小资产阶级；第三级台阶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限制小资产阶级以满足无产阶级。它的发展趋势——上行或下行，取决于“很不彻底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和“彻底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谁更能取得对“比较彻底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民主革命在具体的政治诉求表现上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